

目 录

	自序	1
一、	我的企业家朋友们	
	宁做憨商 不做奸商——民营企业家金樟 溪创业记	2
	陈萍的魅力	7
	大陈镇里的陈溪见	11
	王福元记	19
	金根清与他的品牌	28
	从文学起飞的总经理	30
二、	我的作家、艺术家朋友们	
	老鬼不“鬼”——京城与老鬼一席谈.....	38
	俞天白的厚实 :《世纪寓言》	41
	有关张子恩	47
	《冰糖葫芦》串起十家庭戏——拍摄现场 巧遇翟俊杰、吕中、龚应恬	63
	莫言与他的“红色作品”.....	70
	从《一代才女林徽因》到《林徽因传》 ...	78
	苏双碧谈新版《吴晗传》.....	82
	蒋星煜的《海瑞》与吴晗的《海瑞罢官》...	87

龚应恬的《认识马俊仁》.....	92
梁文茜谈梁实秋	97
近访王西彦	102
丁玲、艾青话义乌	106

三、我推崇的社会学家和文物专家

费孝通近况	112
走近张鹤镛	115
夜访吴良镛	118
忘记生日的罗哲文	125
文物名医胡继高	131
谢凝高与泰山的 11 根烟囱	134
美在自然弦外音——郑孝燮的城市建筑 美学观	137
阮仪三的挚爱	140
园林城市 21 世纪老百姓的享受——园 林专家王秉洛、鲍世行杭州、东阳行...	145
京城近访张文彬	152
与廖沫沙在一起的日子	157
新发现吴晗有关文物的信件及其他 ..	165

四、我心中的画家

艾青与画	174
记鲁光“淘金”	180
与杜世禄对话 城市建设与文化	184

自序

在采访本书的人物时,我总感觉是这些人物的力量、魅力和韧力,在改写着我。像大河和小溪,往往是由于不可抑止的波涛,形成了河道或者改写着河道,而成为壮观。在这里,奔流的波涛无疑是第一位的。

我试图让这些人物不平凡的历程与我的表述融为一体,成为打动和震撼人的文体,如果加以过多的雕琢,过多的提炼,往往会减弱其中的感染力,因为我笔下的人物,近看远看、粗写细写,都有许多不可抗拒的人格魅力,使他们闪光在这个时代。每次我写作时,总是首先被感动了、提升了,这时,文字的技巧仿佛不是那么重要。

我在文物部门干过7年,是领导、专家和同事,非常信任我的7年,在那里我懂得了最珍贵的是“原汁原味”4个字。对文物保护、历史街区、历史信息等等,都要讲究“原汁原味”。我因此触类旁通,认为在表述这些人物的思想、经历、性格、幽默与语言时,最珍贵的也正是“原汁原味”,他们本身就是力量、就是闪光。我作原汁原味的实录实纪,往往就保留了他们品格与个性的真实,震撼力和渗透力的拙朴,往往可以从中得到“天然去雕琢”的升华。同

时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一切也会显示出存事存史的价值。

文学从根本上说是“人学” ,而“人学”最重要的在于拙朴和真实 ,而且是近乎无技巧的拙朴和真实。

本书的出版 ,使这些让我感动和敬佩的人物 ,可以集中地原汁原味地与读者近看远看 ,与读者交谈交流 ,这对于作者来说 ,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 !

方竟成

2002年6月12日



我的企业家朋友们

宁做憨商 不做奸商

——民营企业金樟溪创业记

当假冒伪劣的炮制者纷纷落马时,浙江却有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企业家,以他的红木家具“年年红”崛起于万商林立的上海滩,成为名利双收的风云人物……优势何在?人们说,他有过人的聪明,他自己却认为,他凭的是一股憨劲……

1998年7月8日,泰国副总理披猜在首都曼谷破例会见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37岁的憨厚的中国农民。他的创业史使这位友邦的国家领导人深感惊讶:凭什么力量,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竟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将一个作坊式的加工厂,发展成占地210亩、拥有从意大利进口的成套先进设备、年烘干处理木材能力在3万立方以上,并常年保持有1万套各式家具在流水线上进行组合的现代化大型红木家具生产企业?为促成中泰企业家能在红木家具制作上密切合作,披猜还特意将他介绍给泰国的木材大王郑俊毅。

他,就是浙江“年年红”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金樟溪。其公司制作的家具,在上海市场2000多家同行的激烈竞争中,已脱颖而出,经上海市消协评审,定为十大品牌之一。2001年初,“年年红”又获得浙江省知名商标称号,并且成为全国红木行业首批通过ISO9002认证系统鉴定的品牌之一。

成就是辉煌的,但走向辉煌的道路却历尽艰辛

1993年,金樟溪率“年年红”,首战上海滩,但结果却很悲惨,被无情的市场毫不客气地赶了出来。这是不难理解的:一家小小的农村作坊的产品,怎么能轻易打进大上海?金樟溪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义乌江湾,面对着家乡那条缓缓流淌的义乌江,反思着他少年时代走过的路。

他从小就喜欢与红字有缘的东西,对纹理精致色泽美丽的红木,更是情有独钟。他说:“红木中有种花梨木,也叫海南檀,生在低丘陵,心地红褐色,永不改变,我最喜欢。”其实金樟溪也像他喜爱的花梨木一样,有一颗永不改变的红心,目标确定之后,百折不回。于是,面对“年年红”在上海的失败,他不是见难而退,而是知难而进。他仔细分析了失败的内在因与外因,认定关键在于一个字:“红”!只要红够红足,必定可以转败为胜。他以为,首先,内心要“红”,为此,必须克服素质、技术、管理、设计上的苍白。方向明确之后,立即筹足1500万元巨资从意大利进口了一整套设备,又拨出一笔400万元的款子用来培训中层骨干。

其次,形象、策略也要“红”,这就是说,对顾客要诚心诚意,火一般热忱。为此他在上海作了大量的调查,了解到顾客最关心的是红木家具如何保值。针对这一点,他做出以下规定:1. 工艺要好。2. 不谋暴利。3. 杜绝假货。4. 通过吸收顾客参与设计的办法使顾客将“年年红”家具当成自己的作品。5. 将广告、房租等支出尽最大限度减省节约下来让利给顾客。与上海市场一般的红木家具相比,“年年红”每套

要便宜 1500 元左右。6. 为确保货真价实 ,白胚看货 ,现场定货。

就这样“年年红”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 ,一个个“年年红”的顾客都成了“年年红”特殊的广告媒体 ,“年年红”终于在上海红火起来。

作为一个老板 ,金樟溪的魅力是从他的人格魅力开始的。

16 岁时他在金华一个建筑工地做小工 ,拼命干活 ,得到包工头信任 ,让他晚上去“偷”水泥 ,他老老实实地去干了。人家看他太憨 ,便冒了他的名字 ,写信告包工头。结果 ,他被砸了饭碗 ,但“吃一堑 ,长一智” ,坏事变成好事 ,他由此明白了憨厚也得讲原则 ,知善恶 ,明是非。

他在义乌市江湾镇下金村 ,爷爷造的木结构老房子里住了 25 年。很旧很潮很暗的房子给他留下的记忆 ,是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雨 ,躺在床上 ,雪从瓦片缝里钻进来 ,掉在眼角 ,溶入冰凉的泪水里……

年少志高 ,他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做起了生意。亲戚、朋友中有建新房的 ,他帮助他们拆了 6 幢老房子 ,贩卖其中木材 ,赚了万把块钱。他到新安江、桐庐、金华了解市场行情 ,发现金华市区广场摆设的康乐球桌 ,热闹非凡。回来后 ,自己动手做了一张 ,放在义乌电影院前免费试用。一周后却被退了回来。他不死心 ,到一家专门生产康乐球桌的企业取经 ,然后不惜血本改进工艺 ,获得了成功。

但最令他向往的却是建筑、房子 ,以及与之相关的事情。老房子与新建筑 ,总在脑海中对比出现。结婚那一年 ,他自己设计 ,请木匠制作的组合家具 ,轰动了邻村及周围村镇亲友。他想轰轰烈烈搞一番建筑 ,经济实力却不够。他想到了从家

具起步。他心很高,要搞就搞一流的,筹划从广州购买红木家具样品。

不料,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2.5万元钱,在义乌火车站买桃子时,被小偷盗走。广州去不成了,爱人大哭。金樟溪斩钉截铁地说:“没关系,明年我赚5万元回来!”

三个月后,金樟溪靠亲友支持,又筹了2.5万元钱。这次做梦也记着这2.5万元的安全,一路提心吊胆到了广州,买进了一套流行的红木家具、三立方红木、三台机器。回到义乌,正好有一个家具展销会,他便将这套餐品运去展销,当场订出5套。

由此开始,金樟溪的事业步入坦途。提到这段经历时,金樟溪说,他得力于自己的那股“不达目标决不罢手”的“憨”劲。是的,坚强的意志,确实起了作用,但同样重要的是,他那善于发现的敏锐的目光,和那种看准就干的闪电式实践。这一切合在一起,体现了中国农民“大巧若憨,大智若憨,大勇若憨”的独具的气质与魅力。

“胡雪岩的戒欺”我认准了!

如今,金樟溪既是浙江经济界的风云人物,又是义乌市政协委员,但依旧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将他的新居建在他热爱的企业与员工宿舍之中。他对我说:“我们‘年年红’的员工,大多有10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条件都不错,有的比我还好。请看,那是刚刚建起的员工宿舍……”他指指阳光下几幢已封顶的新建楼房,目光里流露出踌躇满志的神采。

“要使‘年年红’红木家具红到永远,必须以具有特色的

‘年年红’企业文化作为支柱。”金樟溪以沉稳的语调说：“‘年年红’的口号是让红木家具走进平常百姓家。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敢于和有实力的企业打质量、款式、价格战。若低于对方的成本还有微利，就必胜无疑。我宁可做憨商，也不做奸商。胡雪岩的戒欺，我认准了！”

金樟溪的成功还得力于热爱学习，善于学习。在当泥工时，自学过吴良镛的《广义建筑学》，能绘制建筑图纸。现在又在自学经营管理学。金樟溪说：“我买了一辆别克，自己开，但到远的地方，我喜欢坐火车，听那车轮声，就想起了初闯广州的艰辛，它提醒我激励我。我经常利用这一间隙，读一点新书。读书已成为我生活必需的一部分。”

这位民营企业家的一番话，在有些人听来，也许会觉得未免迂阔，但我却深信不疑。在我们这个时代，先进文化是与经济上的起飞密切相连的。

陈萍的魅力

陈萍的魅力,不仅仅在他身材魁梧,一副 50 多岁成熟男人的从容大度,而且在于他总是具有“领先一步”的个性。

他的老家浙江义乌市大陈镇,30 年前,不过是浙赣线上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站。如今,这里已成为闻名遐迩的中国衬衫之乡,有 360 多个董事长,包括著名品牌能达利集团,日产衬衫最多时可达 5 万件。陈萍创办的曙光衬衫厂,是这里最早的衬衫品牌——丘比特牌衬衫的母体,有人称陈萍是义乌衬衫之父,也不为过。

“那时,我还没有营业执照”

陈萍一边温文尔雅地微笑,一边回忆着往事:“1977 年 10 月 1 日开始办衬衫厂,一直搞了 5 年。那 5 年发展很快,生意比较好做,利润成倍增长。在整个义乌的国有、二轻、乡镇企业中,我的利润是第三,税收是第一。不过那时,我还没有营业执照。1982 年,谢高华到义乌担任县委书记以后,才开始发营业执照。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送来的是一个临时的执照。那次,我发脾气了,把临时执照退回去了。要发就要正式的,否则就不干了。当时,我敢把临时执照退回去,也因为

谢高华这个后台,否则,我也不敢退回去。得罪工商局还了得!”陈萍发出了深沉的笑声,充满了一种自信和坦诚的魅力。

“1989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到了深圳。那时,市场比较萧条,我要寻找新的市场。浙江服装进出口公司和北京中国纺织进出口总公司,想在深圳开一个窗口,在浙江众多服装厂厂长中选一个总经理,我是其中一个。他们综合下来,认为我的素质比较全面,想叫我去。当时,我有一个想法,内销市场不好,为打开外销市场,我愿意去。省公司和北京总公司非常器重我,一是给我30%股份,二是将所有经营权都给我,我认为这个条件是比较好的。但是,义乌市政府不肯,担心我走后,义乌这个厂怎么办?结果围绕我去不去深圳,义乌市委书记郑尚金亲自主持会议,30多个部委办局负责人参加论证会专门研究。工商局、财税局、外贸局等单位反对。之后,郑尚金与严智满(市政协主席,我当时已是义乌市政协常委)两人拍板,要我立下军令状:‘义乌的厂只能比现在更好,如果义乌厂比原来差了,我就得回来。’”

“第一年我就交了1000万”

陈萍就这样传奇式地到了深圳,开始了他新的一段传奇。

“到深圳先搞真丝服装,那时机很好,一是省公司、总公司有一个庞大的销售网络,他们会带客户来,深圳成为义乌这个工厂的一个窗口。我与省公司约定条件:第一,要有股份,搞合资,我们是平等的;第二,这个企业必须承包经营。承包经营后,我这个单怎么发,就没有什么非议,因为我义乌有

工厂。我的目的,是为了把单发过来,拉动义乌的工厂。发单价格有高有低,如果不是承包经营,他可以说你的单高了,我就难办。当时这个厂投资很少,350万港币,1元港币等于7角左右人民币,等于240万左右人民币的投资。承包合同的标价是每年净交200万人民币,约等于1:1的返回。”

“当时,这个200万,是有人开玩笑提出的,他以为我会讨价还价,但我说:可以。他说,你这么傻,200万也同意了。我说:你们不要懊悔,我是不会懊悔的。”

第一年我就交了1000万,不包括我在义乌厂赚的钱。我从深圳把单发给义乌,再由义乌发给其他厂,一共几十个厂为他们生产,生意多得不得了,这都得益于省公司和总公司的网络。

那时,我们资金有实力,管理有能力,加上在整个服装行业,我是比较有号召力的,在深圳我们的威达服装有限公司做得最好。

那一段时间非常精彩,大家都鼓掌了,认为陈萍去深圳对了!郑尚金拍胸脯了,幽默地说:“你看,我的决策英明!”

“每一个阳台都充分享受阳光”

领先就是生产力,领先就是义乌人的特点。陈萍对此深信不疑。1977年就敢没有营业执照大搞民营衬衫的企业,全国不多,在衬衫业方兴未艾之际,他抢先到深圳打开国际、国内两大市场,确有点捷足先登。1996年,一个偶然的机,陈萍又在上海抓住了改变他经营方向的一个机遇。

一个服装厂,多年来与陈萍有业务关系。到这一年,这个

厂的衬衫生产已滑坡 , 亏了 800 多万。陈萍请来专家 , 几经论证 毅然收购了这个企业和地产 , 将它建成了曲阳公园 , 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房地产的经营。

陈萍认为 , 房地产业和服装业一样要追求品牌。蓝天、绿地、阳光、现代化以及东西方文化交融 , 是我追求的住宅品位。

“我在向市民免费开放曲阳公园的基础上 , 建造了曲阳豪庭 , 是请美国人设计的 , 每一个阳台都充分享受阳光。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结合 , 公园与住宅相结合 , 自然与人相融合 , 这块地没有一寸土地浪费掉。5 万多平方米建筑 , 最高 29 层 , 两个 12 层楼 , 中间是 8 层楼。站在阳台上 , 户户可以看见公园。总投资为 5000 多万。”

陈萍对下一步怎样“领先一步” , 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他只是用带有磁性魅力的男低音缓缓地说 : “我不喜欢吹牛 , 只是喝酒吹过牛。人家问我 , 能不能喝酒 , 我说和你一样。听起来很谦虚 , 实际是和你一样 , 你喝多少 , 我就喝多少 ? 创业 , 不是喝酒 , 不能吹牛 , 我只能讲一句 : 下一步 , 目标是浦东 !”

大陈镇里的陈溪见

在朋友间周末谈心的气氛中,听陈溪见讲述人生与服饰文化,股票上市与可以申报吉尼斯记录的浙江义乌市大陈镇的衬衫业,还有以3000元起步办厂等等,有一种哲理的启发、开拓的精神和艺术的熏陶。其实,我是第一次与他正式见面,而他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和荣誉,却经常出现在我经常接触的媒介上的版面或屏幕上:

1998年末,在中国服装协会命名的“中国服装之乡”大陈镇中,他作为董事长的能达利集团,令人信服地成为龙头、代表性企业。

能达利集团年生产力达1.2亿件衬衫等服装产品,固定资产4500万,流动资金2000万,员工900多人。列浙江衬衫业第3位,全国第10位。在全国有500家专卖店,仅四川一个省就有100家专卖店。

1998年秋,国家技术监督局对全国13个省市142家服装企业抽查,能达利总分列第5位。

以销售国外品牌而著名的北京燕莎商场,破例经销能达利衬衫,是国内惟一进入燕莎的衬衫品牌。以致尼日利亚大使在大陈镇能达利本部一见到陈溪见,就说:“哦!中国朋友!在燕莎买过你们的衬衫!”

10月28日,正值'98中国小商品博览会开馆开幕的第一天。下午3时,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孙孚凌在银都酒店邀请义乌市7家个私企业家代表举行座谈,详细了解和询问了个私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发展现状与今后如何发展的情况。当孙孚凌了解到能达利集团近三年来的销售增长每年平均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流动资金年周转次数为7次时,孙老高兴地说:那很不错了,这个增长速度和资金效益非常了不得。当陈溪见谈到集团公司的68个总经销中有70%的总经销商是通过小商品市场获得交易的时候,孙老连连点头称赞,情绪高涨,感叹道:“看来,‘小商品’,一定能做出‘大世界’来。”

就在他领导的浙江能达利集团有限公司和他本人分别荣获浙江省金华市企业和企业家最高奖项“金星奖”、“金牛奖”的次日,他自己驾车到来,特意安排了两个小时,与我交谈。

他给人的印象,首先是壮实中透出儒雅,热诚中透出机智。身体魁梧,一双眼睛透露出对知识的追求。我们开始交谈,话题竟与衬衫、企业、赚钱似乎毫不相干。

问:听说尼日利亚大使到能达利公司什么也不要,就要了40米做能达利衬衫的布?

答:是的,其实尼日利亚大使要的那种布是从绍兴进来的,白底有条纹,他拿去是给能达利推销,到时要大量进货。我们要送他衬衫,他说:送我布算了,你这衬衫款式我接受不了,我回去做。他非常喜欢朋友赠送的纪念产品并陈列起来,这样到老的时候,可以回忆过去。外国人喜欢用实物见证,他们往往卧室很小,陈列室很大。他说要专门写上一页,到过能达利公司。

接着,陈溪见的一番话让我这个当过文物局长的所谓历史文化工作者大出意料之外,他这个1981年义乌苏溪中学的高中生很熟悉历史。他说:“我们有5000年悠久历史,美国只有800年历史,建国才255年,还没有我们清朝历史长,光一个清朝就有302年。”

我很兴奋,一个热衷于“赚钱”的个私企业家有如此的历史文化观和尊重历史、文物的意识。中国农业银行行长曾到大陈镇考察,他对陈溪见风趣地说:“大陈镇人口才12000人,企业360多家,99%是服装,而且99%是男衬衫。这可以申报世界吉尼斯记录。我到过广东、广西、海南、东北等地,都不像这里工业企业密集、产业集中。12000人口中,光是董事长就有360多个!”

能达利集团是在这360多家企业中独具匠心的一家。陈溪见在大楼前面构筑了一个颇有文化色彩的“能达利公园”。注重企业发展史,保存了能达利集团前身凯歌服装厂的厂房,并且设立了精品陈列室,编印了用铜版纸印刷的《能达利》小报。这些都与陈溪见的独特文化品位有关,使我窥视到了他思想深处文化底蕴的一角。

问:取名能达利有其背景吗?

答:有。那是1993年清明时节,一位在沈阳工作的老同学回义乌踏青采青。义乌有清明采青的风俗,采集新的生命的寓意。当时,他来看我,听到我的凯歌厂名,说这个“凯歌”翻译成外语就很一般。外国人也喜欢听好话,像金利来,金也来,利也来。你要取个外国人喜欢的洋气一点的厂名。他想了想,就建议用“好运又发财”,译成中文就是“能达利”。能达利就是这样在采集新的生命的清明时节诞生的。

得来全不费工夫,更新恰在于机遇。可贵的是,陈溪见并不忘记过去的历史,那些过去了的岁月皱纹,深深地刻在他的思想中。

问:据说你靠8台缝纫机、3000元钱起步,这一切现在重提,你有什么感觉?

答:每回想一次,都有新的力量;每重提一回,都有新的启示。

1981年我在浙江义乌苏溪中学高中毕业时,不认识西装,当时中山装流行,全家最好的衣服就是一件咔叽中山装。第二天要拍毕业照,但这件衣服下午4点多钟在跑步时搞脏了,得赶快洗一下并晒干。人都有爱美之心,穿上中山装就不一样,特别精神。就从这次开始,我对服装有了朴素的认识。

以后生活很艰难,在铁路上做工,埋电缆线,像轮子一样将电缆线滚来滚去。从诸暨到龙游到新安江,停留最多的还是金华。

第一次进入服装厂,是在1985年,在后宅一家服装厂打包,手工劳动,一个月90元钱,干了一年多。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老板叫我到西安讨一笔债,是到一个军人服装社,要回1.2万元的呢制大衣货款。我在西安天桥市场看见在义乌成本10元一件的服装,在那里可批发13—15元。我很兴奋,回来后就辞职了,开始了艰苦的经商生涯,大包小包装上服装,长途贩运。上了火车后,却不知道什么叫行李费,被列车员查。1986年,萌发了自己干的念头。8台脚踏缝纫机起步,开始做棉衣罩衣。1987年10月,义亭信用社刘主任告诉我,个体户有3000元以下的贷款权利。我非常激动,申请4000元,他批了3000元,我又筹了7000元,总数1

万元 ,从 1988 年开始办起了服装厂。

问 :小平南方考察那年是你的一个飞跃。听说你有一个难忘 90 万元的故事 ?

答 :是的。那年义乌市农村信用社到大陈调研 ,看中了我们兄弟俩的服装厂。认为发展思路清晰 ,又是从底层艰苦奋斗出来的 ,有潜力和实力。我夸了一句海口 ,如果贷给我们 300 万元 ,我们也能上规模。信用社经过比较、论证、决策 ,决定贷给我们兄弟俩 90 万元 ,这真是一次强有力的助推。

当时董事长、总经理、办公室主任一共 10 个人 ,开了一个会 ,大家心情非常激昂 ,七嘴八舌 ,到晚上 12 点会议才结束。会议结束 ,一个副总提议 ,咱们要干两杯 ,就到他家里 ,酒搬来了 ,干 !那时经济不太富裕 ,喝的是家里的高粱烧。酒碗有大的 ,也有小的 ,有铁的 ,也有搪瓷的。回去以后 ,我与弟弟溪东两人坐在同一张床上 ,他坐在这一头 ,我坐在那一头 ,真是热血沸腾 ,一直聊到凌晨 3 点多。

问 :你认为最有力量的人 ,力量的来源是什么 ?

答 :这也可以表述得很简单 ,大度些 ,再大度些 ,凝聚些 ,再凝聚些。一句话就是要千方百计凝聚人心 ,而凝聚人心最重要的是以诚相待 ,从细微处入手。

能达利能够走到今天 ,最重要的是能达利人不计较名分 ,不图个人利益 ,不争位置 ,友好相处。在我们这个公司 ,不管职位高低 ,没有什么矛盾。大家都是为了工作 ,小到接待员 ,大到副总 ,都没有什么特殊。整个企业向上的气氛很强 ,所有员工都愿意挂厂徽 ,为自己是能达利人而自豪。在企业发展过程中 ,就要跨大步。人们会提出怀疑 ,你能不能跨过去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 ,需要员工们的支持与信任 ,当然我作为董

事长也要关心员工。

我记得两件小事情。一件是有一个春节前,有两个员工回家,出了车祸,我说:我们这个员工出车祸,我们应该去看看。开始我的一个副总,小心眼得很,他说不要去,农村不讲理,你一去把你拉住,要你钱的。我说,不会吧,他回家出事,不是我的愿望,我的愿望是他们平平安安回去,高高兴兴回来。我后来去看望他们,当时钱不多,送了一些水果,给了1000元钱。1000元钱在1993年的时候,不算小数目了。我看望了两次,员工的父母很激动。还有一件事,也发生在普通员工身上。从我1988年下半年办厂开始,这个员工就招入厂里。当时她17岁,干到24岁结婚,整整7年,没有离开过厂。在这个7年中,厂里也发生过一些兴盛衰退的起伏,有人担心能否拿到工资。父母都劝她,这么好的技术,应当到其他厂去当个班组长或车间主任,高薪聘任。但是她就是没有离开。她要结婚了,我就说能达利这个美好的今天,也有她的一份功劳,我们应该有所表示。当时送了一床被子、一个席梦思,还送了一台西湖牌25英寸电视机,一共价值4000多元。这在当地传为佳话。

我们都畅怀笑了起来,因为我知道,当年陈溪见结婚时,还很清贫,为3000元嫁妆,还有一段花絮呢!果然,他也不回避这一往事:

“说实在的,我爱人嫁给我时,她家里很有钱。她家答应给我3000元钱的嫁妆,我爸妈高兴得几夜都睡不着。那是1987年,正是我没有钱的时候,这3000元嫁妆使我很激动。后来因为我们出去做生意,马上就有小孩了,他哥说我们不争气,要我们把小孩打掉,打掉了就给3000元嫁妆。我们两口

子一商量,宁可放弃这个嫁妆。这件事锻炼了我的志气。”

问:我还听说了一个“没有办公室的董事长”的故事。这件事不仅在能达利,而且在位于东阳的中国横店集团都很有影响,是吗?

答:是的。三年前《横店集团报》的记者来我厂采访,我正在车间处理事情。他问我办公室在哪里?我说就在这里,我没有办公室,都在现场办公,这里坐一下,那里坐一下。他有点惊讶地看我。回去后,他就给我写了一个报道《没有办公室的董事长》,发表在《横店集团报》上。中国横店集团总裁徐文荣看到报道后,就一定要来看看我,两次路过,不巧,因为没有预约,我都出去了,没有碰到。他说:“我的部下一提升为科长,见到我就问:我的办公室在哪里,最好不要拼在一起,而你董事长都没有办公室。横店集团上下3000多员工都看了这篇报道,震动很大。办公室大一点、小一点也没有人争了。中国有一种观念,办公室的大小、办公桌的长短是身份的象征。这种观念一定要打破,为什么不把争办公室、争车子、争级别等等的精力、时间用在事业、工作上呢?”

对于1999年,对于跨世纪,陈溪见充满信心。他说,火腿、斗牛、婺剧、佛手、中国小商品城,是我们金华、义乌一带的名城名品,能达利衬衫,要朝这样的品位努力,经久不衰,不断出新。陈溪见说,当年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一透露他喜欢一家糖果公司的豆形胶质软糖,这个第四代的公司就一下子走红。这个例子说明,锄品要追求知名度和美誉,要追求名品名城,还有名人名事等效应。

问:诸暨枫桥被称为“衬衫王国”,对此你有何感想?你下一步的目标和策略是什么。

答：诸暨市枫桥镇被称“衬衫王国”，一年生产 2000 万件，企业 31 家，从总量和规模都与大陈镇没法比的。大陈从一家标准服装厂、一家镇服装厂开始，发展到今天拥有几百家衬衫企业，已有 15 年历史，而枫桥才短短六七年时间。前次枫桥镇委书记到大陈来考察时说：“我这个衬衫王国也不敢称了！”但我认为称什么都没有大关系，不要去硬打什么旗号、什么“王国”的，关键还要看实质实力，实在的名品名牌。

现在我们刚完成初级阶段，即是资本积累过程。要有大发展的举措，要使品牌系列化，下半年要搞西裤、内衣、领带都有了。还搞收购合作，用一到两年时间，力争在明年年底，进行股份制改造，改造成股份制企业。产权要明晰，注重文化品位和包装，力争上市，当然这个像李白的诗所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要创造条件，要闯这个“蜀道”。

准备总比不准备好，我现在已在准备。这是我的目标。

关于策略，上面已经讲了。没有策略，有时是最高的策略。凝聚人心、和气生财，这是最普通，也是最基本的真理。1998 年 10 月 29 日，在与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座谈时，我曾向孙老汇报了我经商的“秘诀”，那是我的心里话：“能达利集团公司和义乌的大多数个私企业一样，我们共同的经营秘诀就是让利客户，使他们有利可图，做到薄利多销，用‘量’的增加达到‘利’大的目的，这样能把企业和产品做大，把生意做活。”孙老听完我的话很高兴，他称赞道：“看来这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另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也是能达利集团等企业走向成功的经营之道。”

王福元记

一、张子恩称他是同行！

1999年暮春的北京，气温比江南还高出许多。因执导《宰相刘罗锅》而著名的张子恩，正为他新近投拍的有关蒲松龄的电视连续剧忙得不亦乐乎。但他听说中国大陆最大的民营医院浙江义乌复元医院的董事长王福元与夫人来到了北京，而且住在一个一般不对外营业的宾馆里，他就忙里偷闲，冒着一场突至的春雨，与夫人一起坐出租车来拜访王福元。

在此之前，他们未曾谋面。张子恩却亲笔修改了一份由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写的义乌复元医院院歌的词。张子恩还热情推荐他的好友，《红高粱》、《水浒》电影电视主题音乐曲作者赵季平为之谱曲。义乌复元医院院歌就这样由国家级大师写就，打印那天已是春节临近，张子恩亲自到住处旁的一家电脑房，一字一音符地校对。院歌完成后，张子恩又婉言谢绝了王福元高稿酬致谢：“主要是感动，为你创业精神所感动！”

张子恩和王福元终于在京城见面了。张子恩风趣地说：“你是为人的身体‘救死扶伤’，我拍电视剧，试图给人精神上的‘治疗’和扶正。我们是‘同行’呀！”

二、4000 万元资产与 286 元硬币过年

王福元在上海吴淞口当过兵,是一个好兵,入了党,当过卫生员。1977 年春天退伍,不久,县卫生局局长找他谈话,要他出任一个乡卫生院院长。

对于医生这个职业,他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追求。他是一位受到农民爱戴的医生、院长。但那时的卫生院院长,受到的束缚太大,连买一张桌子也要报批。他决定辞职,自己去闯。于是,他和支持他事业的现在成了他夫人的小方,一起丢掉了铁饭碗,挤上了北上的列车,到长白山参农家,直接收购人参。那时带着巨款风险很大,王福元胆大心细,将几十万元钱放在饼干箱下,上面盖了厚厚的一层瓜子。饼干箱就放在座位前的小桌上,一路上大大方方打开盖子,抓出瓜子自己嗑、小方嗑,还让同座的旅伴们品尝。

他的致富之路,就这样开始了。由于他是将产销中间环节一笔勾销,直接从参农手中收参,又直接投放市场,所以质佳价廉,使当地的医药公司感到了压力。这时的王福元却在悄悄地放弃正红火的人参生意。

1990 年 12 月 26 日,他在家乡附近靠浙赣线的荷叶塘乡政府一旁,个人投资 560 万元,办起了大陆第一家民营关怀护理医院,设 20 张床位,特别面向孤寡老人和不治之症的临终者。住院病人最多时有 31 人,床位不够,他就让出自己的房间。他对夫人说:“我是穷苦出生,小时还打过铁。后来跑东北,那时火车很挤,一站就是几十个小时,到沈阳脚肿得鞋子都穿不住了,也没有什么嘛!现在我们睡在办公室沙发上,还

是一种享受嘛！”

市委书记对这个医院十分关注，省、市、县卫生系统也对这个向普通民众奉献一片爱心的特殊医院予以厚爱，全国会议上让王福元作为特邀代表身份出席。王福元想，这只是一个好的开端，目光应投向更远的地方。1996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有，由于一句似乎是漫不经心的话，却使王福元生命旅途徒然转折。

有一次体验时，义乌市信用联社年轻的主任了解到王福元的创业史，被深深地打动。他们促膝谈心，主任说：“福元，你要把医院办到义乌市去，在城里买一块地，再创辉煌！”

也许这仅仅是一种鼓励，仅仅是一种期待，仅仅是一种工作艺术，但是，仅仅一个星期后，王福元已经将办医院的地皮买好了，一切手续放在了这位主任面前。主任摘下了他颇有学者风度的眼镜，重新打量这位9岁丧父的中年人。王福元说：“其实，很简单，义乌人的脾性就是敢为天下先，中国第一市场小商品城里，有我的许多朋友，他们迈出的第一步，比我还困难得多，而现在已有几百万、几千万的资产。请主任信任我、支持我、考验我！”

这是有志者的行动。仅仅几个月之后，在义乌市西入城口，在一个象征着开放世界的不锈钢跨街雕塑旁，一座10层的综合性復元医院拔地而起。从关怀护理医院的20张床位，扩大了10倍，这里是200张床位，而且每个病房都设备齐全，还有卫生间。当初与他谈话、让他去担任卫生院院长的县卫生局长，作为23名医学专家教授之一，成了这里的业务科室负责人。

復元医院占地面积7324.2平方米，其规模列大陆民营医

院之首。这里拥有肿瘤监测仪等先进医疗设施,讲究现代科技与传统园林相结合,门诊部前面就是绿化地,有亭阁、小桥、假山等。王福元说:“另外在离医院不到30里地,还投资建了一座大型制药厂。两家医院和一个制药厂,总资产在6000万元以上,属于我个人的有4000万元。”

然而,这么一个财大气粗的大老板,个人生活却十分简朴。曾在义乌市财税部门开过小车,后来又成了王福元小车司机的“胖子”告诉我:“有时一天去杭州三趟。早上四五点钟出发,八点已在省卫生厅办公楼等厅长了。王总裁对吃住都不讲究,从来不上三星级、四星级宾馆,总是找招待所,如果碰上专家来医院做手术,他就自己乘公共汽车或火车,让专家坐他的小车。”

1996年春节前夕,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正值复元医院建院如火如荼之际,资金运转处于最紧张阶段。一天筹款180万元,分发给工地各建筑单位,让外省的民工回乡过节。已是腊月二十七日的凌晨二点,王福元和夫人小方从工地一起往回走。突然,几个小流氓将车子截了下来。

“要过年了,给几个钱,不给,不要走!”

王福元很直爽:“这里只有3000元钱,是留给小方过年买件皮大衣的,拿去!”

截车的11个人,一下子把钱抢光了。就在这时,一个流氓认出了王福元,他脸色一下子变了,在王福元面前跪了下来求饶:“王总裁,我认识你的!”王福元说:“我并不认识你呀!”

那人说:“你办医院的,那次一个安徽民工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你们医院赔本抢救。你这个人心很好,也很苦的。我们

千不该万不该抢你的钱。我去一个个把钱收回来 ,也请你手下留情 ,不要报案 !”

那 11 个人一个个都跪了下来 ,将 3000 元钱交还。王福元说 :“你们中谁真正过年有困难 ,我可以救济 ,但是刁徒 ,决不轻饶 !”从那次以后 ,那个认识王福元的流氓从此洗手不干了 ,他们还成了朋友。王福元对这不平常的 3000 元 ,也改变了用途 ,作为职工的工资补贴 ,用到了刀刃上。而且 ,直到大年三十 ,他才将平时积累硬币的小盒打开 ,一枚一枚地数 ,总共 286 元。他就用这 286 元硬币 ,买了一些菜 和老母亲及没能买上皮大衣的夫人一起 ,吃了一餐特别温馨的团圆饭。

三、一定要办医院

王福元说 :“为什么选择学医行医办医 ?除了我喜欢杜甫诗中‘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境界之外 ,我亲身经历的四件事 ,刺激了我、鼓舞了我 ,我必须走这条路 !”

首先是 9 岁丧父。那正是闹饥荒的年代 ,父亲到姑姑家拜年 ,姑姑烧了粽子、大块的肉给平时吃不饱饭的父亲吃。结果父亲回来就不吃不喝 ,腹胀发病 ,到正月十一日就死了。王福元眼中含着泪 ,与其说是胀死的 ,不如说是饿死的 ;与其说是病死的 ,不如说是医药水平太低的悲剧。

第二件事 ,是王福元 11 岁的时候 ,三伏天割稻 ,又饿又累的母亲忽然晕倒在生产队的晒谷场上。“四清”工作队里有一名温州某医院来的医生 ,立即对母亲进行了抢救。母亲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对王福元说 :“是好医生救了我 !”少年王福

元心中记下了“医生”这一神圣的职业。

1975年夏季,当兵的王福元奔赴安徽抗洪抢险,却被伤寒病感染,住进了扬州120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医学专家闻讯前来救治,终于将他从死神中夺了回来。王福元在医院病房一躺就是32天,他望着雪白的墙壁和天花板,与医学有关的往事历历在目,他默默地发誓:以后一定要办一家让天下人俱欢颜的大医院!

而又一次给王福元强烈心灵震撼的是一个70多岁的乡亲。那是王福元在卫生院的时候,医生们都回去过年了。大年初一,一般是不找医生的,但这个70多岁的老人一人进了医院,对王福元说:“王医师,你给我开点药就行了。”王福元说:“配药要先看病的,你解开衣服我看看。”一看,那身上是打的伤痕!王福元说,你这是被打的,大年初一,跟谁吵架?他哭了:“是儿媳打的。我就一个儿子,从小把他当作宝贝。”王福元说:“乡政府有值班人员,跟他讲一下,要处分的。”他讲:“哎,王医师,这不能讲的,家丑不能外扬呀。”王福元想,这种儿子、媳妇虐待老人,是触犯刑法呀!后来,老人走了,看着他的背影,王福元的眼中热辣辣的,办关怀护理医院的想法在霎时间涌起……

四、一切为了救死扶伤

《义乌日报》上曾登出这么一条承诺:凡是到复元医院就医的,救护车接送一律免费。王福元说:“一家医院,一切要围绕病人转。到复元来都是复元的客人,不一定急病急症才派救护车,凡来就医的,都可以接送。”王福元还将医院的一

辆白色小面包车改成“便民的士”，随时运行，特意挑了个“9453”（谐音“救死扶伤”）的牌号。

王福元说：“我办医院，在大、高、小三字上下功夫。大，就是事业办大、医院办大、药厂办大，知名度也要做大。高，在于高标准高技术高文化。1999年，与浙江省人民医院协作，成为省院的一个特别分院，以提高技术，提高标准，增加设施，并且优势互补。而要大要高，一切要从小事、小环节、小人物身上做起。所以，‘便民的士’和我院承诺的免费出诊等，虽然微不足道，却体现了复元的亲切、热情和周到。”

王福元接着说：“大人物和小人物在我们这里是一视同仁的。无论是书记、市长、银行行长、电视台台长，还是普通电工、管道工和环卫处工人，到这里来体检，都是清茶一杯。肝功能检查要空腹，检查之后，则每人供应热汤面一碗。”

“有一次，一个捡破烂的，一分钱也没有，被送来医院，头部损伤严重，有好几处血肉模糊了。怎么办？我明确下令，救人比什么都重要？我还掏钱给他买了饭菜。病人康复时，他父亲和舅舅跪在我面前感谢我。”

“还有一次，一个波兰女客商在商城宾馆心脏病突发，我院医生接到电话就上门出诊，为病人实施紧急抢救，又是打针又是输氧，终于使波兰女客商转危为安。”

王福元认为：重要在于价值取向，一家医院必须以救死扶伤为最高准则。如果一家医院、一名医生，自己的心灵连起码的“卫生”都没有，一切向钱看，一切充满铜臭，那还办什么医院呢？

1998年盛夏的一个中午，义乌市柳青森美电镀厂86个职工突然不知原因地发烧。复元医院院长助理接到求救电话

后迅速赶到现场,查明了原因,确诊为重感冒,对症进行了处理,厂方非常感动。

还有一位农民肿瘤病人,因病情紧急需送杭州肿瘤医院。復元医院党支部书记自告奋勇,主动陪其前往杭州,一路悉心照顾,未接受一点馈赠。

浙江省卫生厅曾数次对復元医院的处方进行随机抽查,其中的对症下药、因病施药、合理检查、规范收费等指标,均为满意。平均每张处方在40元左右,与某些医院的大处方形成鲜明对照。

也许上述三个例子,只是反映了復元医院风貌的几个侧面,也许是挂一漏万,但不管怎样说,王福元提倡的“以救死扶伤为最高准则”已开始成为復元医院上上下下行动的准则,这是復元医院的魅力所在、价值所在、力量所在!

五、他说 武训办学精神有一股热劲

对王福元来说,已接近知天命的年龄。几经磨难,几经风雨,已积累了厚实经济实力。復元医院和关怀护理医院都蒸蒸日上。他自己和早年被工厂炉火烫伤,只剩下一只眼睛的哥哥,在復元医院生活区,各造了一幢别致的三层别墅。小时候,七个人共睡一张木床,共盖一床旧被子的日子已经远去。

年迈的老母亲在老家,搬出了清代建的不太见得到阳光的老屋,住进了红砖青瓦的楼房,客人来了,她总是要烧红糖鸡蛋招待。客人吃了,她才会心地笑了。

可是,王福元依然想着大事、新事、实事。他总是念念不

忘他那已经初步建成的花园式药厂。1999年暮春,他与夫人小方一起,坐上了温州至北京的特快,专程来北京向著名医药专家、鱼鳞癌首选药平阳霉素发明者张鹤镛请教。费孝通教授闻讯专门听取了他的汇报,欣然为他的民营医院,亲笔题写了“浙江义乌復元医院”的院名。正在主持《刘仁传》编撰工作的原北京市政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高戈,还风趣地对王福元说:“以后我住院就住到復元医院,以获得一流的关怀和护理!”

王福元认定的是一生的追求与奉献,一生的进取与创新。他说:“我要把药厂办好,一定要办好,有困难才需要我,我的志向就是不办没有困难的事。武训办学,虽然有些人认为是不上大雅之堂,但那种精神总有一股热情在鼓励着我!”

金根清与他的品牌

进入2000年后,浙江省百名优秀农民技术人员之一、浙江金华市北山李类果树研究所所长金根清很忙。刚刚从火车站接到重庆远道而来购买布朗李种的客户,又接到了贵州黔西南雷县打来的急电,一个与他见过面的客户,想与他达成一项秘密交易,打他“清云牌”的品牌,让他开一张证明是从他处出售的5万株布朗李的发票,给他1万元钱。

45岁的金根清一夜没有合上眼。他与妻子小卜反复商议此事。他从1976年开始从事果树生产,先在乡政府,后“下海”承包了几百亩荒山艰苦创业。1994年成立了金华市北山李类果树研究所,用科技的力量,朝高档水果目标不断跋涉。从美国加州引进的布朗李,经过他的精心培育,在金华这一片金色盆地中长出了丰甜的果实。在风味、色彩、果径、含糖量等方面都超过了母种,可谓“养父胜过生父”,已推广150万余株,2万多亩。在1999年华东农交会上,受到全国各地专家和种植户的青睐。几个月后,贵州黔西南州由州领导带队,一行41人,其中有14个县市长,风尘仆仆赶到金华,专程拜访金根清,引种他培育的清云牌布朗李及其他水果,并且请他去讲学、辅导。金根清与清云牌,就这样在黔西南获得美誉

……

金根清与妻子小卜认为,决不能惟利是图,为了1万元钱,而出卖自己的品牌与良心。当初,他们之所以将自己的品牌取名为清云牌,一是各取夫妻两人名字中的一字,二是要创造一种如天空碧绿,清水白云般的田园生活。为了事业,他可以放弃乡政府的铁饭碗,他们可以放弃在城里舒适宽敞的房子,而至今仍住在大片果树之中的陋室里。要追求阳光下的利润,而不要带着铜臭的昧心钱。

金根清果断地回了电话:“不!”

在冬末阳光的照耀下,在他陋室前摆一张圆桌,放上热气腾腾的清茶,金华市政协常务副主席章关键等与他亲切攀谈。他的视野是宽广的,勇气是感人的,着力点是准确的。他坚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水果高档化的动力。他认为入世之后,水果业将接受更大的挑战和机遇,只有不断创新、不断形成自己的特色,这需要科技与本乡本土的结合,需要对气候、水土、传统与创新的把握,才能战胜自我,从而战胜竞争。他说:市场是无情的,挑战是有意的,要不断进取!

他给我们看了一张他颇感兴趣的比利时雪树的照片,那树在夕阳中亭亭玉立,一身素装,片片雪叶给人以美感与纯净。他说,这是一个远方的客户给我的资料,“他需要我的有关培育果品的技术,我说可以,也可以免费,但你也提供给我信息,将这比利时雪树的资料给我一份……”“那客户愉快地同意了,给了我资料,让我拍了照,并且答应将他仅有的两株比利时雪树给我一株。”金根清说,有时信息就是一切。不过他还是大方地向我们披露了他已经研究成功的清云牌美国杏、杨梅、石榴、梨、油桃等新品种和特藤葡萄的信息,他幽默地说,这特藤葡萄粒粒饱满,颗颗甜润,而且不掉粒,五六米远

的地方抛绣球一样抛给你 ,你大胆地去接 ,一颗也不会掉下 !

从文学起飞的总经理

在我面前的他属于青春成熟期的年龄，一副踌躇满志的气派。明亮的眼镜后面闪烁着浙江人特有的睿智，精剪的短发和应时的 T 恤显出了一个经理人的干练。他的坐椅背后是一排贴墙的书橱，精装的书册似乎在无声地讲述着他的儒雅与爱好。在他的企业中形成了浓郁的读书风气，对公司员工的读书和购书，他采取了“阳光政策”。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介书生出身的缘故，而是他有一道算式，就是读书可以获得知识，知识就是力量。将知识作为这个企业的砥柱中流。

我与他相交多年，也目睹了他所在的义乌农贸城仅仅用了五六年时间，农产品的年成交量突破 30 万吨，统计表格上总成交额也达到了 14 亿元。义乌农贸城在国内同行中是一个很有名的实业，但在他的叙说中显得那么随意和井然有序，仿佛时间在齿轮和钟摆间自然地转动，水在河床里静静地流淌。

他就是我的朋友——王攸。

稚嫩脚印

我们又像 20 年前一样叙起了共同关心的话题：文学。文

学和人生岁月在他的额上悄悄地涂染着企业家闯荡风云特有的赭色,但是,一谈到文学,他的眼睛顿时闪烁着清纯的亮光。

20年前,三中全会揭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的大地上升起了希望的曙光。1981年,王攸刚满20岁。他就读于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和他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酷爱着文学,希冀一生与作品相伴作永恒的飞翔。

王攸对文学是如此的痴情。读大学时,他每月只有11元生活费,但他坚持订阅《青春》,执著地撰写文学手记并向编辑部投稿,当时我在义乌县文化馆,后来在义乌县文联主持《枣林》文艺小报的编务。王攸于浙师大毕业后,在距义乌县城20多公里的一所初级中学当语文教师。他和几个同学一起,成了《枣林》文艺小报“狂热追逐者”。我选用了王攸的诗和微型小说,这是他的处女作,也成了他日后一直念叨的一件事。他夫人曾告诉我,他们的结合,也是由于文学,那时的约会少不了《萌芽》、《青春》、《杭州日报》副刊“初阳”以及《枣林》的话题。

理想是浪漫的,努力却是现实的。王攸深深地懂得展翅云天与脚踏实地的辩证关系。在中学担任老师时,他强调“以作文为中心”和“非命题作文”的训练,对学生来说很实用。他还办了一个刊物,名字就叫《脚印》,志在沿着鲁迅、郭沫若开拓的中国文学事业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这个《脚印》,从他执教的那一天起,一直伴随他走过了9年。

教学写作,写作教学,构成了王攸从20岁到30岁这10个青春年华的生活。不断投稿,不断退稿,不断收到编辑部鼓励信件,王攸作了冷静的思考。在对自己发表的作品认真地作了总结之后,他把笔杆套上了笔套,暂时停止了创作。周围的友人们,包括我都有些惋惜:正在上升的阶段,眼看就要建

功,怎么浅尝了一下就止住了。王攸笑了笑说:“文学源自于生活,需要有深厚的积淀,而自己从学校到学校,缺少人生的磨炼,虽然获得了一点成绩,但欲获得真正的成功,必须像潜水员一样投进深深的海底,以人生的深度兑换作品的厚度与高度。”实践证明,王攸的转向是一个精彩的手笔,强攻是一种战术,迂回也是一种战术,是另一种形式的攻坚。

1990年,王攸参加市政府办公室的招聘,他以优良的成绩,被组织部门聘为联系农业的秘书。在学校里,教师严格地遵循教科书,而秘书遵循社会发展与变革,需要阅读没有教科书的教科书,那就是人生。1995年,王攸又被任命为义乌农贸城总经理。用他的话说:“在生活海洋里,我又往下沉了一截。”

当经理了,王攸参加会议多了,出差多了,甚至杯盏交错的时候也多了。但是,他始终不忘的仍然是读书。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自己新的事业:中国是农业传统古国,千百年来,农民荷锄戴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然历史上也有过几次生产关系的变革,但总体上说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缺少商品经济的升华,因而属于弱势产业。如果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之间架一座桥梁,从经营、市场等角度作一番推动,这个弱势将转换为强势,成为极有希望的朝阳产业。

在转轨改制的新时期,需要塑造新的文学形象,汲取生活信息,观察和了解人们的生活,王攸认为,义乌农贸城应当是一个取之不尽的生活基地。

也是脚印

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义乌只是一个普通的县城。由于

历史的原因,人多地少,资源匮乏。长年的艰苦环境也造就了义乌人“勤耕好学,刚正勇为”的品格。1982年,当各地还认为“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的时候,义乌县委冲破阻力,石破天惊地提出了包括“长途贩运”在内的“四个允许”,以致日后形成了中国第一市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这一切激励和感奋着王攸。他受命义乌农贸城总经理时,手头上能支配的只有800万资金,几乎可以说是白手起家。然而,王攸及时地将勤耕好学的美德转化为富有改革精神的八个字“艰苦创业,开拓创新”,形成农贸城的“城风”。

我们在农贸城徜徉。

占地500多亩的批发市场尚处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办公大楼的正门上悬挂着十五块荣誉奖牌,从国家农业部颁发的“定点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到浙江省政府授予的“浙江省先进农业龙头企业”、“省级百花工程农业龙头企业”等等,在早晨的阳光照耀下,金灿灿的。

农贸城真是一座“城”。大型载重卡车从遥远的省份开来,卸下成堆成垛的果熟瓜香。塑料箱内葡萄仿佛沾着晨露,西瓜青藤上缀着鲜嫩的绿叶。抬头一看,现代化的电视屏幕醒目地打着“新世纪、新观念、新生活”,“倡导绿色消费,保护生存环境”,“认真学习江总书记‘七一’讲话,努力实践三个代表讲话精神”等标语,屏幕上运行着全国各大蔬果集散地的商业行情,郑州、河北、厦门、天津蔬果价格一目了然。市场自1996年1月8日开业以来,交易持续繁荣兴旺,各类农产品成交量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递增。全国20多个省市的农产品在市场上设立了销售窗口。目前,义乌农贸城的集聚功能日益增强,辐射范围不断扩大,已成为浙中地区的农产品

流通中心。

王攸对于农贸城来来往往的业务如数家珍,他的生活乐趣已经沉浸到了这些来自于田野的累累果实之中。“文学是人学。人们的生活,生活中的人们是我关注的对象。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远胜于文景之治、康乾之治的兴盛时期,连年丰收给我们农贸城的发展创造了机遇。自然,每天都在为我积累着研究生产力与发展关系良性运行的文学素材。”王攸并没有打开笔记本,就以流畅并带有一种自豪感的语调描述着义乌农贸城——

义乌农贸城,具有完善的服务体系,优越的交易环境。公司一直致力于完善市场的服务体系,健全市场管理规章制度,保持低成本的交易环境,提供包括装卸、过磅、仓储、金融、信息、中介等的优质、方便服务。

义乌农贸城,致力于培育农产品经贸队伍,拓宽销售网络。公司十分注重农产品经贸队伍的培育,目前拥有公司型、代购代销型、长途贩运型与订单型的中介组织和个人。农贸城的这些购销队伍联结着各地农产品市场,形成了宽广的销售网络,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农产品的优化配置。

义乌农贸城,指导农产品生产基地,通过基地联结千家万户。公司积极参与全市农产品基地的开发建设,按照“区域化布局、产业化发展、规模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的模式,在本地培育和发展了一批农产品生产基地,同时,将从种养规划、苗种供应、技术服务到销售环节对全市各类基地进行指导。

目前,管理农贸城的公司尚处于努力取得理想的经济效益阶段,公司时刻“为了农民,关心居民”,围绕这一宗旨,不遗余力。近年来,义乌农贸城架起了广大农民走向市场的桥

梁 准确的农产品信息有效地指导了全市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强大的辐射功能实现了农产品的大范围配置 市场给城乡居民提供了充裕的农产品 也给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与下岗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这时 王攸呷了一口矿泉水 不无感慨：“我有一个观点，物以‘多’为贵。要想造福一方 让家乡农民致富 必须上规模 上档次 搞大型的集约化。”稍停 王总深深地感叹 义乌农贸城能有今天 依靠的是全体员工与广大经营户的同舟共济 更主要的 是义乌市委、市政府对农贸城在市场建设政策上的倾力扶持。

明天的脚印

要干一番事业 需要有远见。在王攸的办公室里 你随时可以感受到一种深沉的目光 一种高瞻远瞩的境界。

墙上有两款书法 遒劲的笔力书写着“人生朝露 事业千秋”和“古井”的警句。在时间的长河里 人生之短暂 可以和缀在叶尖的露珠相比。曹操《观沧海》诗曰：“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而在王总的心中 同样对于露珠的吟叹 却是另一番含义！那“古井”两字则以源源活水吐哺人间 寓意王攸的人生观。

我和王攸是文学同道 青年时期同时起步于文学 光阴荏苒 此时我认真地向他凝视 这个漂亮的人生急转弯已将他从少年壮志的 20 岁步入了不惑之年。“新世纪开年不惑 很好。”王攸说：“我对这个‘惑’字有两层理解：不迷惑 也不接受诱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我要牢记‘三个代表’讲话精

神,一时一事首先要考虑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说着,王总吁了一口气,表述着为人行事的哲学——“大海苍茫,波涛浩荡,我取一瓢一勺足矣!发展义乌农贸城是我今天为之奋斗的事业,也是我今后创作汲取素材的生活源泉。”然后我们的话题又联系上文学,谈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竹林七贤的安贫守素、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禁不住掏出采访本将他时刻在思考与探索富于哲理的一系列体会记录下来,读点书、写点文章有好处。文学可以认识人的价值,做明白人;当企业总经理,目的是为了社会积累财富,但千万不要只为自己,或只为赚钱而赚钱;在工作中,尽管前进的步履维艰,但应当是一步一个脚印,无论脚印是深还是浅,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遇到困难就是拣到财富,让逆境炼出真金;在生活中,也许会有人不能全面地理解你,甚至埋怨你、责备你,但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让一切暂时不理解的人理解,甚至后悔。

此番与王攸的相聚与交谈是短暂的,但所闻所见,我深切地感到农贸城就是他和他的同事们的大作品。他有许多心里话要说,但以我对他的了解,这些成绩还只是他当作家的文学计划中的一段。王攸的手握得很有力,这是他对待朋友的习惯。“老方,这些年,可以说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天下友,我始终没有忘记我们20年前的志向——写一本书,记述我自己的阅历,也真实地记录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书中主要事件当然应当发生在我们的农贸城!”对此,我真诚地祝愿王攸能够如愿以偿,梦想成真!

王攸,你明天的脚印在延伸……

(此篇与吴野合作)



我的作家、 艺术家朋友们

老鬼不“鬼”

——京城与老鬼一席谈

北师大校园一幢有点暗红的半旧小楼二层,1999年初春的暖意已悄悄包围了这里。老鬼将门只开一条门缝,打量着我这“不速之客”。我报出了一个足以打动他的名字,他才释然地露出灿烂的笑,热情地将我和一位住在他旁边小楼的环保工作者迎进客厅。

他正在写《血色黄昏》的兄弟篇《血与铁》,以自传体的坦率风格,毫不掩饰地再现了作者由童年到“文化大革命”初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首印5万册,已销售一空。他说《血与铁》的写作已告一个段落,现在正写在美国那一段的生活,他说并不打算马上出版,先写出来。

客厅半旧沙发的上方,挂着一幅镶黑边的他母亲杨沫的照片。照片上的杨沫雍容大度,虽是晚年风采,却可从明亮宁静的眼睛中,透出《青春之歌》的生命气息。

老鬼就坐在杨沫的照片下,与我叙谈。我觉得他很有一些相似与神似他母亲的地方,甚至老鬼不加掩饰的笑容仿佛也是他母亲轻抿着的嘴角的自然舒展。

老鬼对我说,他也是10岁左右看《青春之歌》的,和我看《青春之歌》的年龄相仿,但他并没有被迷住,而是有一些自

己的看法：

“我是差不多小学四五年级开始看母亲主演的《青春之歌》的。那是1958年，我在高干子弟的育才小学上学。我当时受的教育，是喜欢看打仗的书，所以，对《青春之歌》还不太喜欢，认为我母亲的作品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

“我与母亲没有谈过《青春之歌》，但我的不敬也流露出来。我爱看打仗的电影，她是知道的。我爱看《林海雪原》、《烈火金钢》、《红岩》等电影。”

老鬼这时幽默地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再看这个作品，我又觉得情调还不够，它太革命了。我与我母亲是两代人，她的作品在党夺取政权的年代里激发了好多青年。而我写的，则是我们这一代的亲身经历，与她写的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我认为老鬼讲的是大实话，不加掩饰和创作的大实话。如果说老鬼的《血色黄昏》、《血与铁》，不属于传统的流派，也不雷同于前卫的现代派，那么老鬼的创作最大的特色在于他将自己拥有的一切，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中人们的变态，包括幼稚、可笑以及激进，毫无保留、不加修饰地捧献在读者面前，似乎没有技巧，但那是一种天然去雕琢的最高技巧。

老鬼不“鬼”，老鬼很实在。我突然这样想。老鬼仿佛洞穿我的思绪，突然提起了“文化大革命”第一冤主吴晗，他说：“你们老乡吴晗，我很敬重他，他也‘不鬼’。罢官容易折腰难，一点也不会耍滑头，是个实在人。但可悲的是，这样正直正派的人，却一度遭受了那样的折磨。可以说吴晗的悲剧，是促使我写《血与铁》的内在动力。”

老鬼激动得有点“口吃”地说：“我觉得苏双碧先生重写《吴晗传》，是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一种勇气和胆略。那时，

咱们中国就是不能说实话,说实话就会对你冲。像我的书,就是如实地把那段历史再现出来,我觉得那有许多悲剧,有很多人在写。像邓拓自杀,有很多原因。但我觉得他的家人与他划清界线,这个因素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对他打击很大。”

老鬼说起康克清大姐为吴晗与袁震抱来的养女吴小彦时,眼中有闪动的泪花:“我很感动的是吴晗的女儿,一直支持她爸爸,她认为她爸爸不是坏人。老舍为什么自杀呢?当时,他妻子与他划清界线。不划清界线不行,马上就整你。这一些都是不堪回首的回忆。我在《血与铁》里把那些悲剧都如实写了,当时,我父母出问题了,但我还是要跟毛主席走,跟毛主席干革命。我没有想得太多,这可能对父母的伤害很大。身边的人、孩子,对他们的批判、揭发,对他们的伤害是最大的。”

老鬼加重语气,强调了他对吴晗和他养女的敬意:“吴晗的事,我非常感动,他真惨,而他女儿的态度,我非常感慨!所以,我把我们这一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与遭遇如实地写出来。很多事如果不写的话,后代都不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些事了,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划清界线。我认为我是以我的彻底坦诚在写,是以我的热血在写。”

老鬼感叹地对我说:“我们这一代也50岁了。”然后,他闭上眼睛,仿佛想起那段峥嵘岁月,想起在美国无干扰中写作的情形,以及《血色黄昏》、《血与铁》出版后引起的轰动,也许还有北京“三家村”文化发展实业公司对他的友情支持。他突然说了一句:“我母亲也提过吴晗,他们一起开过人大。”

他又陷入了沉思。我觉得他的一席话透出一种坦诚的深刻,一种正直的凝重。悠悠岁月,人来人去,是血是铁是青松是

阳光 ,其实都不会歪曲 ,“不鬼”的永远是历史。

俞天白的厚实 :《世纪寓言》

被誉为“中国文坛上的推土机”的俞天白 ,给人的印象是厚实。厚实的身躯、厚实的文风、厚实的收获 ,包括他在米兰的中国餐馆趁着醉意 ,用浓重的乡音大声询问 :“有义乌来的吗?有没有金华人啊?我是金华义乌人!”这样厚实的故乡情结!

他已出版 800 多万言的文字 ,塑造了 1000 多位各式人物。代表作《大上海的沉浮》,与茅盾的《子夜》、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形成了“以文学形式为上海历史运行轨迹提供了一条连贯有序的线索” ,从而成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一个亮点。上海老市长汪道涵在百忙中 ,专门与他约谈几个小时。日本国立一桥大学社会学部教授折敷濂兴先生对此作“一见钟情” ,经过执著努力 ,在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出版了装帧考究、分上下两册、竟有 866 页的厚实的日文版。

一、“以前我写的 10 多部长篇小说 ,
都是为写这部小说练笔的”

此刻 ,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的阳光 ,照在他宽大的前额上。他穿一件海蓝色宽松的睡衣 ,正在他的写作电脑前 ,专注投入地写作新著《世纪寓言》。

我发现他敲打键盘的手指 ,像钢琴家弹奏那样自如而轻灵。

俞天白款款地说 :“这部长篇小说 ,我已酝酿很多年了。上海《新闻报》记者在两年前的春节 ,专门采访几个作家怎么过春节 ,我说正动手写一部《世纪寓言》的长篇小说。

这是我一生当中一直想写 ,但一直不敢动笔的一部长篇小说 ,也可以说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 ,以前我写的 10 多部长篇小说 ,都是为写这部小说练笔的。”

二、“二战结束之后 ,石井四郎 却受到了美国的保护 !”

俞天白是学历史的 ,他的开场白使我们的谈话 ,一开始就进入了“厚实”的历史话题中。

“《世纪寓言》是对 20 世纪的一种思考 ,一种深沉的思考。是一个作家 ,对 20 世纪人类生存的思考 ,人类命运的思考。我觉得 20 世纪是人类历史非常重要的时期 ,发生了几次空前的大动荡 ,世界性的大动荡。两次世界大战 ,一次比一次规模大。这在以前的历史上还没有这样大规模的世界大战。过去十字军东征、罗马控制整个欧洲、成吉思汗西征等等 ,比起这两次世界大战 ,真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受时代局限、对地理环境认识的局限以及战争装备的局限 ,不过骑在马上 ,用刀斧嘛。”

“这次世界大战是空前的 ,死伤的人 ,被屠杀的人 ,也是空前的。被屠杀的理由也是空前的。过去被屠杀的理由无非是要它做奴隶 ,要占领它的领土 ,霸占它的财富和女人 ,而这

一次 ,以灭绝一个种族作为目标。希特勒要灭绝犹太民族 ,日本人叫嚣要灭绝所有对抗他的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更形成一个可怕的局面 ,很多人赞赏美国、向往美国。我过去曾经也赞赏美国 ,可是我后来思考之后认为 :今后的世界 ,最可怕的是美国。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 ,二战时日本进行细菌战、鼠疫战 ,就在我们义乌 ,离我家住的江湾仅一里多路的崇山 ,被投放过鼠疫细菌 ,后来又将这个村庄烧毁了 ,当时火光冲天 ,我亲眼看见了。我父亲是医生 ,使我一家能够幸免鼠疫、炭疽、伤寒等 ,我可以说是劫后余生。”

俞天白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沉思之中 ,双眸闪烁着一种恨与愤交织的亮光 :“这个细菌、这个鼠疫 ,是日本人驻东北的 731 部队搞的罪恶 ,长官是在日本称为细菌战争之父的石井四郎。这个石井四郎后来来到南京建立了荣 1644 部队 ,还在金华建立了一个荣 1644 部队试验室。日本人在义乌、衢州、宁波、湖南常德等地都曾投放过鼠疫菌苗 ,目的是为试验这个生化武器如何用于战争 ,如何投放 ,又如何保住自己。烧崇山主要是为了控制蔓延 ,掩盖真实情况。日本人把崇山的男女老少都赶到崇山一个小山背上 ,逼男男女女都把衣服脱得精光 ,一丝不挂 ,然后 ,连村庄连人连衣服 ,统统烧光。”

这时俞天白激动地说 :“二战结束之后 ,石井四郎却受到了美国的保护。他们进行了谈判 ,石井四郎将所有实验的资料、数据等全部移交给美国 ,美国答应免于起诉。结果石井四郎没有受到审判 ,而石井四郎手下的一批所谓科学家 ,后来在日本重要的科学机构安排做重要工作。”

俞天白站起来 ,来回走动 ,挥动着手说 :“美国要那些资料干什么 ?用心昭然若揭 !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来 ,以后战争

最可怕的武器 ,不是氢弹、中子弹 ,而是生化武器。”

三、“我可以肯定 ,马克思永远是伟人 !”

这个世纪另一个重大事件是共产主义运动。俞天白说 :
“我可以肯定 ,马克思永远是伟人 ! 20 世纪最伟大的人物 ,不
管东方、西方 ,几乎一致承认最伟大的是两个人 ,马克思和爱
因斯坦 ,马克思伟大在于他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规律 ,结果连资
本主义社会也吸取了他的科学理论 ,防止了很多弊端。马克
思主义目的在于人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关爱 ,享有同
等的权利 ,对整个自然资源享有同等利用的权利等等。”

俞天白深刻地说 :“后来 ,从苏联到我们中国 ,都走样了。
走样的后果是将人们互相仇视推到极端。眼前这样相互仇
视 ,将来怎么会平等呢 ? 反右、‘文化大革命’ ,这两个大的运
动 ,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觉得邓小平是伟大的 ,因为他深刻
理解这一点 ,力挽狂澜、拨乱反正。”

“我认为 ,这个世纪给我们反思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
了。我从这两次大的事件 ,进行整个反思 ,为人类命运担心。
如果说 10 年前 ,我写《大上海的沉浮》是为上海的命运忧虑
的话 ,那么我写这部《世纪寓言》 ,是对人类的命运感到忧虑。
无疑 ,人类应当有光明的未来 !”

四、“希望这一部书成为我新的代表作”

俞天白从慷慨激昂中平静下来 ,坐在写作椅上 ,安之如

怡：“《世纪寓言》写一个医生，医生一家，一个家族，其命运作为一条线索。从乡村到都市，都市到乡村，交叉起来写。环境背景，就是金华江两岸，我把金华江起了一个名字，叫婺溪。写上海、北京、昆明，主要是上海。都市和乡村、乡村和都市，就是上海和婺溪、婺溪和上海。”

“故事是从1920年开始的，这个医生正好20岁，一直写到世纪末。把历史上这么多重大事件，通过这个人物，通过他的命运贯串起来。写到他的死，在1999年无疾而终。”

“我是用《百年孤独》那样的写法来写的。这个医生到八九十岁，他已经没有什么活动，可他还是一个老人，作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存在于这个家族之中，存在于我着力刻画的子孙之中。”

俞天白又有些冲动，亮出了铜钟般的嗓子：“这个医生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力量在于独立思考，否则，知识分子一无所值，没有什么力量可言。知识就是力量嘛，知识只有独立思考，才能化作力量！这就是这位医生的基本人格，坚信力量在于独立思考。”

“希望这一部书成为我新的代表作，我是尽力去写，希望把它写好。我觉得，这部书是独一无二的，我的经历是一般人无法拥有的。现在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很多，但只是写知识分子的一般苦难。我现在写的不是知识分子个人的苦难，而是民族的苦难，人类的苦难。”

俞天白这时话题一转，幽默地说：“我写作不用提纲，只有框架，只有几个人物。”

“已经写了两年了，写了2/3，写到第五部，已写60万字左右，还准备写20万字，一共六部。今年可完稿，有许多出版

社来联系出版,我都没有答应,我想完成后再说吧!”

“我要慢慢磨,已磨了两年了,这一部小说要慢慢磨,我过去写了那么多小说,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写得太快。《大上海的沉浮》写了一年半,有不少反响,但现在看来还是属于我的练笔之作。”

五、秦兆阳恰到好处的点题

在我们坦诚得像故乡溪水一样清澈见底的交谈之际,俞天白的夫人已为我端上了一碗厚实的酒香四溢的热酒酿丸子。在俞天白的《我的家和我人生的X地带》中,将其夫人描写成“娴静、善良、单纯而质朴的”。

我只有服从这种热诚,品尝着他们夫妇赋予我的交融着“上海、婺溪、婺溪、上海”厚实的乡情和友情。

我注意到书房正中挂着一幅署名老芹、笔力刚劲豪放的对联:“凡存古往今来事,人在长河大海中。”俞天白告诉我:老芹就是著名作家、《当代》主编秦兆阳。这是秦兆阳生前写的最后一幅书法,字好,内容也很好。

我觉得秦兆阳的题词是有感而发,是对俞天白如“推土机”、如“孺子牛”、如“苦行僧”般的文学韧性,对他厚实、壮实、诚实的人生状态,恰到好处的点题。长河大海、古往今来,一个波澜壮阔的难忘世纪,俞天白正在深刻地把握!

有关张子恩

随使用一碗面条即可

张子恩因执导《宰相刘罗锅》在世界华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张子恩的名字,似乎与历史剧,与历史剧中雍容华贵的皇家气派连在一起。但当我在1998年末一个冬日傍晚,为询问他的行程,用手机与他通话时,他用朴素无华的语言说:“千万不要惊动领导,今天雾大,到金华也许要7点以后,随使用一碗面条即可。”

以后,与张子恩在金华一起考察历史文化的数天行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他天然去雕琢的朴素风格。安排住处,他谢绝套间,要了普通标准间。到义乌的那天,听说市领导正开干部大会,一定不让打扰,谢绝了安排好的午宴,兴致勃勃地与义乌市博物馆馆长研讨了一番义乌文物,就驱车赶回杭州。

张子恩夫人告诉我,他就是这样一个对自己生活随便、简单,对拍戏、对事业执著得有点吓人的人。拍《宰相刘罗锅》使他累坏了,心肌炎发作,住院抢救才缓过来。他待客喜欢用一壶锡瓶装的温热绍兴酒,再加几个江南菜,从不奢侈。但拍戏却一定要精致排场,一定要逼真,拍慈禧的戏时,让北海御膳厅做菜,一宴就花了几千元。

为什么要拍这么多历史剧？

张子恩是宁波人，少年时代随在海关工作的父亲，从上海到广州、海口，从美工起步，涉及影视。《西安事变》、《丝路花雨》的美工是他的代表作。

他拿到的第一笔稿酬，也与美工有关。70年代末，他创作了一套儿童连环画，叫《咕冬来了》，受到小读者的喜爱。后来这个题材还改成电视片，在国内外屡次获奖。张子恩得了几百块稿酬，在当时已算一笔不小的钱了。

1984年，张子恩改美术师为导演。15年来，导演过《默默的小里河》、《神鞭》、《黄河大侠》、《梦断楼兰》、《白马飞飞》等10部电影。

1995年拍摄的《宰相刘罗锅》是他执导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几乎开创了一个中国电视历史剧的新纪元。《宰相刘罗锅》在海峡两岸放映时，万人空巷，刘墉的书法复制品洛阳纸贵，一位出差北方的县委书记，打电话回来对夫人说的第一句话，竟是让她录下《宰相刘罗锅》在放的几集，回来要看。而半个小时又打来电话，说：不要录了，出差地的招待所也在放“刘罗锅”！这样的“历史文化现象”确为前所未有！

张子恩平静地说：“我觉得这个戏做成功了，它对国内观众，甚至世界华人有一种很大的凝聚作用，大家都来看这个戏，都来议论刘墉、议论和珅、议论乾隆。他们对皇权的挑战、对贪官污吏的整治、对中国人的幽默与机智，完全都接受。我觉得这个戏主要体现了老百姓心里想的东西，希望看到的东西，用一种新的历史观去看待这一段历史，所以打动了他们。”

们。”

张子恩从《宰相刘罗锅》开始，以显著的社会效益带动显著经济效益的电视历史剧接踵而来。他执导的《康熙微服私访记》前30集，也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火爆，以致投资商和港台影视明星纷纷“盯”住张子恩，又寄合同又寄图文，希望得到他的青睐。

为什么要拍这么多历史剧（最近由张子恩执导的一部表现明末清初一个知识分子爱情戏的22集连续剧《风雨一生情》又将上映）？张子恩说：“首先，与港台拍的历史剧有区别。我们拍的历史剧不是纯粹的历史剧，不仅仅是娱乐。我是寓教于乐，亦庄亦谐，把我们的哲理、思想、文化，放在娱乐之中。《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都是这样，都是包装上看起来是一个喜剧，但我们讲的道理，实际上是很含蓄的，是很沉重的。内涵是很严肃的，涉及面也很广。”

这时，张子恩换了一种比较轻松的口吻说：“现在收视率比较高的，台湾拍的有《还珠格格》，比较轻松，比较好玩，很好看，但内涵上找不出更多的东西，一笑了之。不像我们拍的历史剧，笑过之后，还有回味。”

“我们过去过分强调教育性，所以片子做得不好看，观众不愿意接受。最典型的就是样板戏了，把教育与政治等同起来。”

张子恩兴致勃勃地说了下去：“第二，我拍的历史剧中明清戏比较多。我感到历史故事离现在越近，观众越有亲切感。如果反映汉朝，观众会感到很遥远的事，那种服饰、那种礼仪、那种对白，接受起来会感到困难。但明清的历史故事就不一样，处处俯拾皆是，像走到侍王府，就能看到王府，看到太平天

国,离我们很近,与汉唐的戏相比,多了一点亲切感。”

“第三,古装戏回报比较高,有海外市场。现在电视剧不是政府投资,都是企业、个人行为,是一种商业行为,它投钱必须要讲回报。如果是现代戏,就不太会有海外市场。海外华人对我们的现代戏,对我们的政治、体制不太了解,他们不太愿意看。他们倒不是不愿了解,而是他们感到与我们距离比较大,对于我们的道德观、社会体制等,他们感到费解。比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上山下乡,所以这样的戏,他们不太愿看。这种现实题材的戏,在他们那里基本没有市场。”

张子恩还认为拍好一部历史剧,也从中体现了国家、民族的形象,从中体现了改革开放在文艺上的魅力。他说:“和台湾许多导演一起聊天时,他们对我说,你们这个政府不错,你们政府在文艺政策上非常好,比我们台湾强。你们这样的戏,在我们台湾不一定能通过,你们政府让它放,大家都非常受欢迎,说明你们政府在文艺政策上很成功。”

对金华的印象

其实,张子恩对金华情有独钟。他说小时候,她母亲做菜常用金华火腿,那确是一种独特的文化。20年前,他曾在春节期间,从北京坐火车到金华,到金华师专看望在那里教书的姐姐。张子恩说,那时的金华给人的印象是黑压压一片低矮的老房子,还有黑乎乎的煤炉。

这次来金华,完全是一种新气象的冲击。新区、老区、大街、江畔的公园、双龙景区的生态环境,包括地道的火腿菜等

等 ,都给人以美好的印象。张子恩还特别肯定了金华历史文化底蕴及近年来名城保护方针与实践。

“金华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 ,像侍王府、八咏楼 ,我觉得都是比较独特的。像侍王府这样的太平天国遗址 ,我看了很多。1995 年 ,我带几个美国好莱坞影视界名人(有一个是《刺杀肯尼迪》的编剧 ,他写了一个《太平天国》) ,从南京开始参观 ,南京最大的是天王府(总统府)、御花园 ,然后东王府 ,都参观了。东王府当时规模比这个大 ,但我觉得侍王府现存总体规格 ,像大的议事厅这样规模在全国要数第一。而且 ,南京那几个大王府 ,没有留下壁画 ,壁画保留在几个比较小的王府里。我觉得金华侍王府总体保存得比较好 ,危墙壁画也经过了紧急处理(有许多太平天国的戏 ,如果在这里拍摄比较合适 ,可惜那次没有让美国人看)。我觉得八咏楼也不错 ,八咏楼盖在江的旁边 ,而且盖得那么高 ,李清照在这里写了那首著名的《题八咏楼》。又像东阳卢宅 ,这么宏大这么完整。在绍兴有沈园、鲁迅故居 ,都有文化品位 ,但比不上卢宅这样的规模。”

张子恩说最近到山东蒲松龄故乡去了 ,很遗憾的是在老街上乱七八糟地插了许多电线杆 ,把气氛破坏了。平遥古城的明清街在这些问题上处理得比较好 ,各种管线都埋到地下。值得肯定的是卢宅那条街、那些牌坊 ,包括现在新建的仿古街 ,都搞得不错 ,没有电线杆。保护得最好的是卢宅后门的那条护宅河 ,原汁原味 ,十分难得 !

张子恩笑着说 :“看来谢晋选在这里拍《鸦片战争》 ,真是慧眼识珠 !”

张子恩对古建筑的敏感 ,不亚于对历史剧的偏爱。他强

调“越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越会感觉到这些文物的可贵。”他说:金华市民的名城意识比较强,这很好,有捐献文物的,像太平天国马槽,有自发保护文物的,像武义俞源村收集了民间灯具、瓷器、农具、道具等等。有的地方不是这样,在建设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明朝亭子,文物部门上报领导要求保护,结果批示还未下来,工人们已经把这个亭子拆了,说要这种“破烂”有什么用!这样的“文物盲”是可悲的。

张子恩认为名城保护一定要高品位、全方位,防止伪修缮、假古董,就怕大水泥、红柱子等等。对待王府、八咏楼等的保护、修缮,一定要严格考证。他说:“八咏楼现在拆了前面一些建筑以后,气势还是比较好的,如果能把江前面几座水泥房子拿掉,那气势就更好了。将拆掉房子的地方建成一个公园,以后逐步看到双溪汇拢这样的景色。像八咏楼这样南朝的建筑,实在是越来越少了。”

在金华文人中,李渔是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

与张子恩在一起,仿佛是与世界文化、中国历史、名人与哲理、故事与幽默在一起。车上、茶余、漫步,他都是三句不离文化。他推崇的文人中,李渔是突出的一名。甚至,在一次饭后聊天中,他慷慨激昂地驳斥了有人说李渔生活不检点的观点。

“我觉得在金华文人中,李渔是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中国写喜剧的作家太少了,从世界范围看,像李渔这样有写喜剧大成就的也很少,莎士比亚算一个,写的也是有限的几个喜剧,像莫里哀写的并不是很纯粹的喜剧。像李渔这样一生多

才多艺,又倾情写喜剧的人太少了,而且他写的剧本是所有剧种都可以用的。有许多剧作家写的,像关汉卿的《窦娥冤》,主要是山西梆子,京剧演得不多,在南方基本上没有演他的戏。李渔的剧目,从南到北都演,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而且他都是大团圆结局。他寓庄于谑,寓哭于笑。很多的悲剧内涵,通过喜剧表现出来,群众喜欢看。我这次在北京,几个老人与我聊天,他们说希望你多拍好看的戏。我问:什么戏好看?他们说,要乐的,不要死人。这是一个有下岗工人的家庭,老头老太太如是说。他们说,我们就喜欢看你拍的戏。而李渔的戏就是这个路子。”

张子恩说,他不但要拍一部有关李渔的电视连续剧,也许请程蔚东写本子,还要专门写为李渔正名的文章。

与徐文荣一见如故

张子恩与中国横店集团总裁徐文荣,只是在暮色中共进乡土风味的晚餐中见面,但对历史文化、旅游文化、企业文化的许多共鸣点,使他们酒过三巡已成为一见如故的朋友。张子恩对徐文荣说,仿故宫拍摄基地可有虚有实,太实了有时利用率不大,有的汉白玉石雕可用仿白石取代,这样可节省几千万投资,宫殿群建设也不必全面铺开,可选择有重点的先建。

徐文荣幽默地说:“请张导一餐饭,给我省了一个多亿!”

而张子恩离开横店后,几次提及徐文荣都称赞说:“徐文荣是一个了不起的企业家,横店影视城不是那种小里小气的东西。如果能把一些叫得响的影视作品拍出来,那么对进一步提高横店影视城的知名度很有利。”

“他很大胆,旅游文化必须结合影视的发展,使电视剧、电影在这个基地能够伸展。现在看来,拍历史剧,没有这样的影视城不行。中央电视台也搞了,在无锡建了水浒城、三国城,现在又搞太平天国城。在珠海搞了一个圆明园,在北京搞了一个涿州影视基地。利用率比较高的是水浒城、三国城两个影视基地。这些影视城的成功之处在于与好的电影、电视连在一起。看来横店影视城的发展,是要和好的戏不断结合起来,注重与特别有影响的戏结合起来。”

历史剧做开了,收不住了

张子恩说:“我非常愿意拍现代剧,包括体育题材,但电视剧是一种投资行为,没办法。这两三年,我将历史剧做开了,有了一定的特色,收不住了。因为老板有回报了,要做下去,到处都来约我做。”

张子恩对故乡有一种特别的挚爱,认为故乡可创作的题材太丰富了。他的历史剧继续做下去,反映有浙江特色的作品是他的一个重点。他说,这也是一种过去对这一块做得不够的补偿。

“我觉得中国文化底蕴深厚,走到哪里都能挖掘出题材。上次走了一下宁波,宁波电视台请我去参观了两天,到奉化、到宁波几个寺庙参观,觉得非常好。这次到金华、到东阳参观,给我印象很深。”

“我觉得过去黄河文化这方面表现得比较多,江南文化、吴文化是很重要的方面,以前表现得比较少。江南过去比较多的是越剧那种才子佳人的戏,《唐伯虎点秋香》属于比较夸

张的与历史不太搭介的那种比较闹的戏,跟文化关系不大,我想以后我拍的戏,应该做得文化一点。”

“现在的问题是粗制滥造的比较多,精品做得太少,要好好规划好好做,我觉得每个地区都可以做。像金华黄大仙这种题材,很有全球华人性,不仅大陆观众,而且像香港、台湾观众都喜欢看。但我认为不用强调那种迷信的色彩,港台做黄大仙的戏有太多迷信的色彩。我们讲的是一种文化色彩,讲这种易经的来历,道教的来历,一种黄大仙文化色彩,这就够意思了。”

1999年张子恩还有一个重头戏,是拍一部与香港、台湾不一样的《布袋和尚》。很巧,他看中了《认识马俊仁》的作者、义乌籍青年剧作家龚应恬写的本子。“《布袋和尚》是奉化的事,龚应恬是义乌人,谈起来很投机。他也写过《牡丹亭》,我看他写得也不错。我今天看了香港、台湾拍的《布袋和尚》的剧照,与我们想的不一样。第一场戏,恐怕就要有一个创新,是否设计一个布袋和尚以‘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笑笑人间可笑之人’的风度,戏笑玉皇大帝昏庸的场面。”

时刻记着观众的需要

张子恩是多才多艺的,不仅在导演和美术上成就卓越,而且经常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水浒歌》的曲作者赵季平等,一起合作主题歌作品。1999年初,在多个电视台引起轰动的《绍兴师爷》主题歌的词就是张子恩改定,赵季平作曲的。

“道路坎坷/人生苦难/要咬紧牙关挺直脊梁/热血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张子恩写的《风雨一生情》的主题歌词,由《血染的风采》曲作者苏越作曲。

尽管如此,思想深邃和才华横溢的张子恩还是觉得自己这个“用镜头来讲故事的人,要每个演职员在片子中尽可能发挥各自的重要作用,很难很难。”

“我每导一部戏,都是从零开始,需要崭新的知识,需要寻找崭新的创作点。像导《宰相刘罗锅》,就要了解乾隆、刘墉、和珅的事。执导《慈禧西行》,就要把慈禧的事从头到尾都研读一遍,像八国联军来的时候,她带着朝廷跑到西安,一路上就有许多野史。有几个日本人写的回忆录,非常详细,你就要了解。后来,我拍康熙的戏,又要对康熙的历史进行仔细的研究。所以,又是完完全全从零开始,必须从头把这些知识大概掌握,要不然,你拍出的东西就是外行。观众一看,就会笑话你,老百姓觉得你有些常识性的东西也不懂。”

张子恩就是以这样的认真,这样的创意,这样的朴素与执著,追求着一部又一部历史剧,他坦诚地说:“我拍的戏一般比较注重观众,我不管得奖不得奖,管得是‘时刻记着观众的需要’。我拍的戏很少得奖,但我觉得有观众是最重要的。”而一名圈内人士悄悄在我耳边说:“张导太谦虚了,他执导的戏,几乎每部都得奖!”

用青春演员演青春戏《上错花轿嫁对郎》

张子恩的代表作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无疑展现了这位大导演对历史透视与现实结合的巨大沟通力,其中的把

握命题、刻画人物、策划情节、选择演员，直至主题歌和服饰的创作，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端庄和无穷魅力。

2000年春夏之际，他却出人意料地执导了一部激情青春戏《上错花轿嫁对郎》。我电话中追问这里的奥秘，他避而不答又笑着说，可当面好好谈谈。他虽然很忙，刚接待完了日本一名著名女医学家，又与雷振邦研究电视剧的主题歌。但他还是和夫人一起，找了一处富有传统文化装饰的品茗处，与我畅谈有关美的追求、有关美化生活、有关他的青春戏和历史剧。

他对社会文化现象，对观众和读者的欣赏热点，有一种职业的敏感。他说“席绢的小说在青少年中，尤其在女青年中影响很大，很多人阅读。我发现这里面有一种很通俗的、没有什么历史感的美，我就根据她的《上错花轿嫁对郎》和《请您将就一下》两部小说，改编成一个20集电视连续剧《上错花轿嫁对郎》。我过去是拍很有历史厚重感的电视剧，这次却是一个通俗流畅的、几乎没有历史感的青春故事、激情故事，对我也是一次挑战、一次创意。”

“《上错花轿嫁对郎》这个戏，写了两个扬州姑娘，一个嫁给南方富家子弟，另一个嫁给北方的将军。于是，这两人的地域文化差异一下子拉开了。南方戏演员，我都从上海选，从上海戏剧学院等艺术学院里选，选一大批青年演员，北方戏演员就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选演员。这样演员本身一站，就是明显不一样的两个文化的体现，然后，再加上南方部分在扬州拍摄，北方部分在北京拍摄，这样这个戏中两种不同文化的对比就很强烈。这个戏是一个青春戏，就要在青春上下功夫，在青春美上自然流露。用的基本上是青年演员，知名演员不多，因为你不能用一个40岁的人去演20岁的

人。”

张子恩由此联系到美的领域、美的成熟和美的不可替代：“就美来说，老演员三四十岁的有他们的美，六七十岁的有他们的美，青年有他们的美，美是不可替代的，青年最可贵的是青春，青春是用钱、用化妆品都替代不了的。拍青春戏不能像历史剧那样选演员，我就用了一批青春的演员，用他们的青春演青春的戏。老演员里，比如一些中年演员，他们成熟，会扮演各种形象，也很美，在观众心目中有地位，但是他们不可能再扮演十七八岁的角色。美肯定是不可替代的，你可以模仿，但模仿过分就是拙劣。美是一代代相传的，一浪推一浪，后浪推前浪，所以我希望《上错花轿嫁对郎》以本身青春激情取胜，让读过席绢小说和没有读过席绢小说的观众都在青春激情中得到美的冲击。”

蒲松龄的鬼故事都是很优美的

作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陕西省文联副主席的张子恩，对电影、电视的发展感到欣慰。他认为一些欧美片子进来以后，对中国电影过去的模式冲击很大。涌现的第四代、第五代导演，都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形成的。近年来，电视连续剧，不管是现代戏、历史戏，与过去比进步很大，在表现形式上，演员选择上，剧本结构上，都有一种新的观念。比如历史剧，过去一味注重历史，现在还有戏说，要与历史拉开距离，要关照现实了。关照现实除了剧作、内涵上区别，在美的观念上也发生了变化，过去那种古装戏，越接近历史越好，唐代的画上画什么样，你就这样化妆。现在就不一样，唐代化妆可以加

上现代的观念。这样,有一种现代美的体现,观众感到亲近,容易接受。那种一成不变、老式的美学观念不一定站得住脚。

张子恩兴致盎然地谈起了最近执导的25集电视连续剧《聊斋先生》,他说:“这是一个很难做的戏,因为既是古装戏,又得兼顾现代,是国内第一次用这么长的篇幅来写一个艺术家、一个文学家,过去很少用文学家作为题材来做电视连续剧的。过去拍聊斋都是作为鬼故事来讲述,我这次拍聊斋故事,是融合到蒲松龄的创作,与他的人生、他的作品,交融在一起,变成一种时空交织,生活形态与他的创作相交织,是比较特殊的作品,在电视剧形态上有一定新意。这里牵涉到很多的是蒲松龄这个人物怎么对待鬼狐世界的问题,过去传统故事里鬼狐世界都是阴森森的,吓人的,都是青面獠牙的,但蒲松龄的鬼故事都是很优美的,很有人性,表现了封建社会压迫下一些女子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对恋爱自由的追求,所以这个戏跟别的鬼故事不一样,它必须用美的形式去解决。所有的鬼狐变成美女后的形象,造型都很独特,不是过去传统服装的装扮,而是加进许多现代服装,大胆地将现代美的因素掺入进去。这样,观众容易接受,因为现代观众看过去鬼的故事,也要用现代观点去想象。所以,我在化妆、服装、造型上加进了许多现代的东西。我用了一大批小女孩,她们都很漂亮,也都很善良,这样就接近于现代人对生活中美的追求。”

张子恩说,有一段时期动作片在华人圈子里很流行,像《少林寺》,李连杰、成龙的片子,但太多的港台戏,用很多杀人、武打去充实屏幕的时候,观众就觉得厌倦了,不喜欢看了,这时用一些优美的故事去变化,用蒲松龄优美的鬼故事去变化,观众就会喜欢。因此,历史剧不断出新才是美的。

现在的美 ,首先是敞开、是接纳、是一种升华

张子恩的阅历和知识都十分丰富 ,总是从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大趋势 ,来审视他的青春戏、历史剧以及自己对美的追求、对美化生活的见解。对待西方文化 ,他始终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 ,但必须有一种接纳世界、开放的态度。他对很长时间内“清一色灰色”的所谓高尚的美 ,有切肤之痛 ,他热情称赞改革开放带来的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之后 ,变成一种民主的倾向 ,变成一种接纳世界、开放的态度 ,对美的追求也成为一种开放 ,由一种封闭变成一种开放。这是一个最大的变化。过去那种封闭状况 ,是既否定过去 ,又封锁未来的封闭。对传统的美 ,古典的、汉唐的文化 ,采取虚无主义 ,抹杀、否定一切的态度 ,甚至除了样板戏 ,什么艺术都没有。服装不是列宁装 ,就是中山装。这是没有生命力和活力的态度。”

“现在 ,我们对各种文化 ,对欧洲文化、世界其他人种的文化 ,采取了一种接纳、吸收、兼容和协调的方式 ,所以现在的美 ,就变成一种多元的生机勃勃的美。”

“像生活中女同志的化妆、服饰、发型 ,还有建筑、家居、家具等都有巨大的变化。过去夏天只能穿长袖衬衣、短袖衬衣 ,现在什么服装都有 ,外国有的 ,中国都有 ,这就是美的变化。首先是思想的变化 ,思想的开放 ,允许思想的开放 ,主张思想的开放。当然 ,我们是提倡健康的美 ,不搞奇装异服 ,但我们可以丰富美 ,入世之后 ,我认为这种丰富还会有新的发展。过去我们出国旅行是不可能的 ,现在是变成熟了。国内

的旅行已经不稀罕了,要出国旅行。过去只到东南亚旅游,现在到美国、欧洲、日本去旅游。惟其如此,一个民族把胸怀敞开了,对美的事物首先要接纳,然后才能改造,才能在传统基础上,形成一种更升华的美,更符合现代观念的美。”

上海风格和北京风格,都是美的魅力

美需要敞开胸怀接纳外来文化,也需要兼容与并存。像电视剧一样,既需要《宰相刘罗锅》入木三分的以史为鉴,也需要《上错花轿嫁对郎》的青春激情。张子恩对此举了一个关于红木家具的生动例子,因为这几天,他正应邀对浙江年年红集团的《企业之歌》进行深加工,从而对红木家具作了社会调查。

“现在任何一家大的家具店,都呈现出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各式家具都并存。红木家具是一朵花,欧洲家具同样是一朵花。现代人由于生活节奏快,不满足于过去复杂、繁琐的审美观念,更喜欢美国式或欧洲式的比较简洁的装饰。这个变化是很大的。你说红木,有许多人喜欢,但也有的人不喜欢,不喜欢的原因是由于它繁琐,它太实了,太重了,而喜欢两个棍子一撑就是一个凳子,这就是现代生活一种美学观的变化。”

张子恩从红木家具与欧式家具的差异与并存,深入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并存,又从民族文化静与动的辩证统一,深入到对上海风格和北京风格建筑的评价,从中无不折射出这位大导演的审美境界和审美追求:

“我们民族是喜欢静的,以静致远,以静致美,中国画、中

国诗、中国书法里都强调静。但动起来，也同样美的。像书法有狂草的美，有隶书很静的美，魏碑也是静的，是端庄的、对称的，狂草却是很奔放的，行草是很流畅的美，都各有美的个性。任何一种美都保持着我们民族的风格。我们和美国人不一样，他们在电影里表达爱情的方式和我们是绝不一样的。日本片子也是这样，日本人有日本人表达爱那种缓慢、那种含蓄，还是有东方民族的风格，与西方不一样。这都应当允许并存。”

“东方的建筑、服饰、绘画，风格跟西方完全不一样，它更偏重于对称、安静、完整。西方则讲究均衡，均衡在构图上体现出来。我们最讲究的是对称，从故宫的布局可以体验到，这跟欧洲不一样，尤其与欧洲现代建筑更不一样。从我国建筑表现形式来看，近代的变化是很大的，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建筑、北京的建筑、上海的建筑发展都很快，而且上海与北京的建筑风格不一样，但同样都具有魅力。上海的建筑风格更接近欧美，因为它受海外影响较大。北京建筑很稳固，新的大厦对称居多，门窗都很牢固。上海就不同了，它讲究均衡，讲究漂亮，讲究现代感。像上海外滩，包括立交桥、高架公路都和北京不同，它更多地吸纳西方文化。在北京城市建设中，感觉到一种大气，一种端庄之气，建筑、长街、拱桥等等，文化气氛显得壮阔和大气。”

张子恩感慨地对我说：“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对美的追求、对美化生活的追求最繁荣、最活跃、最多元的时期。这是国家经济发展之后，民主制度逐渐完善的必然。那种所谓‘破四旧’把美摧毁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认为，美的先进性、文化的先进性，是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连在

一起的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大趋势 ,东西方文化中美的交融汇聚也是一个大趋势 ,同时 ,却不能丢掉民族的风骨和民族文化之根 ,美在各种风格各显异彩之中 !这是我无论拍历史剧 ,还是拍青春戏 ,都追求中国式、追求适应老百姓口味的原因所在 !”

《冰糖葫芦》串起十家庭戏

——拍摄现场巧遇翟俊杰、吕中、龚应恬

北京盛夏的黄昏，一改以往白杨树阔大叶片下的那一份凉爽，特别猛烈的阳光一点不留情地将街衢晒得如火炉一般，气象报告气温已到40度了。

我的手机恰恰在这时候响了，近年来连续写出《中国马家军》、《尚方宝剑》、《干部》等卖点火暴的剧作家龚应恬，用他那故乡义乌腔很浓的普通话说，他写了一年多的着力刻画十个不同家庭“金钱关系”戏的20集电视连续剧已经开拍，他正与大导演翟俊杰，著名演员吕中、许还山、程述等在拍摄现场。

我脱口而出：《冰糖葫芦》该和冰天雪地连在一起，怎么在三伏盛夏开拍？他答：这就是戏。翟俊杰是导《血战台儿庄》、《大决战》等战争戏出名的，又因导《西藏风云》获最受观众欢迎的导演称号，而他这次推辞了《詹天佑》等五部电视剧，抱病闭门三个月磨《冰糖葫芦》，对《冰糖葫芦》里的十个家庭情有独钟，说拍这样的轻喜剧非他莫属！你快过来，这就是戏！

我叫了出租车，赶到了北京西客站南广场附近一片由三面高大住宅建筑围住的小广场。只见铁栏杆和绿化树前已经

挤满了这里的居民和路过驻足的观众。一个熟悉的高大身躯 ,正在大型摄影机前比划强有力的手势 ,并哼着《水滸歌》般的曲子 ,即兴创作着顺口的民谣。这正是翟俊杰 !跟着他的手势和曲子 ,也哼唱着的是许还山、程述等几个著名演员 !显然 ,《冰糖葫芦》已经开拍 ,天大热戏大热拍摄现场气氛更热 !

一、翟俊杰心中的《冰糖葫芦》

在一个堆满拍摄器材 ,没有空调 ,只有一架老爷电风扇悠悠摇动的大房间里 ,我终于见到了正在商量剧情、表演和人物个性的翟俊杰、吕中和龚应恬。

翟俊杰对电视剧《冰糖葫芦》自有他的构想。歌曲《冰糖葫芦》风行全国 ,至今传唱不衰。同名话剧在艺术和票房上同样取得成功。这次翟俊杰从“枪林弹雨”、“炮火硝烟”走向发生在大热天的《冰糖葫芦》故事 ,表现一番京城京味京人京事 ,胡同里的纳凉人、卖冷饮的木推车、酷毙帅呆的太阳镜等 ,全景式展开十个家庭的真实故事 ,展开多样化新生活中老百姓的悲欢离合、嬉笑怒骂 ,翟导显得十分投入又十分自信。他认为愈生活、愈真实、愈家庭 ,就愈有味道 ,这可以成为《冰糖葫芦》的一个系列 ,一个品牌 ,甚至以后还可在电视剧基础上拍电影。

翟导说 龚应恬的本子写得有特色 ,有艺术 ,还有类似相声的捧逗 ,时而小乐 ,时而大乐 ,时而捧腹。翟导如数家珍地说着《冰糖葫芦》 ,经过他二度创作的戏“共有 20 集 ,每两集讲述一个故事 ,共 10 个故事。重头戏是 203 号院 8 号楼。主

人公们均为老人,而与这些性格各异的老年人相伴相纠葛的,则是同为本剧主人公的个性十分鲜活的年轻人。通过老老少少的遭遇和结局,人们看到了一幅长长的现实生活画卷,特别是一个个可乐而又可以给人以某种启示的喜剧人物形象。正是寓庄于谐,寓言色彩颇浓的故事中蕴含着并非说教的哲理。”

“十对老夫妇贯穿全剧,但又各有侧重:正副‘楼长’苑大姐和二主任、‘无事忙’小老李和他的媳妇郭三妹、玫瑰相约的莫老师和汪翠琳、人称‘高工’却是中级职称姓高的工程师高志兴和贤妻于淑珍、厨子出身的大老李和老伴姚阿芝、锁厂退休工人王长春与侯玉蓉老俩口儿、少心没肺的张彩月和她的蹬三轮车夫君唐秋生、‘款爷’戴克权与同床异梦的张光露、丛桂香跟她的当过出版局长却自己出不了书的局长先生,还有警察出身的老马和章婉贞一对儿。此外,还有两个决不可小视的重要人物:一个是音乐学院退休老教授、善拉小提琴的耳聋眼盲的龙老先生,一个是高龄100岁却童心大发、清朝年间曾为‘皇族’的温其老格格。”翟导风趣地说:“让我们投入一次充满笑声的合作,相信老艺术家们,会准确地把握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的。而那一个个与22位老人相伴的栩栩如生的俊男靓女,相信演员朋友通过精到的表演也会大出其彩的。”

二、龚应恬戏说《冰糖葫芦》

龚应恬早年写诗,后来写戏。但他始终在写戏中有一份诗的警觉与眼力,以诗的概括和透视去写戏。加上他本人特

有的幽默与诙谐,使《冰糖葫芦》始终贯穿着生活的酸甜苦辣、哲理与幽默。他说,十个家庭十场戏,有难言苦衷,有一波三折,有柴米油盐,有喜出望外,我始终抓住最为敏感的“金钱关系”作为剧情主线,使全剧充满了赤裸裸的人性暴露和辛辣的现实批判。

龚应恬说:我认为家庭、社会、老年人与年轻人的种种考验,种种冲击,种种变化,都可以在金钱关系上得到最充分反映,人生冷暖和人格高卑,也可以从中得到检验。因此,十家庭戏,也可以说是十金钱戏。为普通日子所困、所惑、所忧、所乐,所折射的家庭现象、矛盾和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时代主题,所以这个戏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全剧地方特色很浓,学老舍的京味。我和王刚、肖亦农、路远都是花工夫写的,最后由我统稿。至于为什么叫《冰糖葫芦》,因为结构和形式上都构成冰糖葫芦这样一种意象,十个家庭戏既单独成立又能连续,用一根签串起来。

龚应恬说:“剧中有名有姓人物达130多人,因此,这部戏也就成了世纪相交之际,中国老中青艺术家的一次空前聚集。为了展现中国三代表演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剧组费尽周折,从全国各大表演团体中享有声誉的精英艺术家中挑选演员,使此剧开拍之前,在演艺界圈内就有了不小的震动。一位剧组青年演员说,加入此剧,实是荣幸。”

“主创人员可谓‘星光灿烂’,有林连昆、管仲祥、吕中、张瞳、斯琴高娃、盖丽丽、刘佩奇、朱媛媛、张光北、梁天、马晓晴、尤勇、方舒、许还山、颜彼德、袁玫、程述、郑振瑶、杨立新、周琦、于黛琴、沙玉华、陈立中、冯恩鹤、臧金生、徐敏、王澎、阎青、李嘉存、田成仁、高放、王夫棠、顾永非、刘蓓、林默予、常蓝

天、濮存昕、黄宗江、黄宗洛、黄宗英等人。”

龚应恬为自己的剧本能吸引如此“灿烂的星星”，既感到兴奋又感到不安，他抹了一把额头沁出的汗水说，今天又有戏了，翟导刚才又出了新点子，有的戏要改。

三、吕中的美化生活和角色

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如《你为谁辩护》的女主角、《原野》中虎子他妈栩栩如生形象的吕中，一点也看不出她已经年近花甲。坐在我身旁，仿佛是一位秀气又高雅的大姐。吕中在《冰糖葫芦》中扮演“楼长”苑大姐，是戏很多的一个女主角。但她避开了《冰糖葫芦》的正面话题，她认为观众会对苑大姐作出评价。

她和我谈了一个似乎是美丽的女人不愿触及又不可回避的话题，即有关人老了，怎样美化生活与美化角色，也包括美化人生的话题。我感到了她的坦率、真诚与深刻。

“我是个很爱美的人，不光注重自己形象上的美。美的范畴是很广泛的，从深层次上看，实际上是个美学的问题。人人都爱美，如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穿着打扮呀，自己居室装饰、装修呀，处处都体现美。我的穿着打扮是有一定境界的，穿着打扮体现了一个人对美追求的层次。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自己已经是一个60岁的人了，外部的形象是越来越老了，脸苍白了，皱纹也长得很多很多。这时候，逐渐感觉到，对美的含义，对外部美的追求，已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层次。感觉到美的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心灵的美，是对生活的一种认识，对人生的一种追求，包含着一种境界的追求。因为人老了以

后,从外部形象来说,它是一种衰败,但是它对人生来说是追求深层次的理解,心理层次会越来越厚实,内力反而有一种升华,人们常常讲的气质美,我想就是指这方面。原来有一种苦恼,看到身体发福了,腰粗了,衣服穿出来也不好看了,有一种很苦恼的感觉,但是慢慢感觉到,当你对生活的积累到一定的层次后,对生活高层次的追求,内在气质发出的一种美,它确实不仅仅是单纯的一种外部美了。现在,我真正有这样的体会。我的心慢慢放下来了,不担心年龄带来的皱纹。在你所有的白发和皱纹中,深透着你对人生对生活的品位与理解,这是一种气质、一种素质、一种品质,给人一种震撼力和厚重感。”

吕中穿了一件黑色带花饰的上衣,表现出她的气质与魅力,如行云流水般谈吐着她对美的认识,然后又将话题引向了角色。她认真地对待每一个角色,她说:“我创作角色的时候,特别是年轻的时候,老怕我的形象美不美呀,让人看了是不是很漂亮呀。北京人艺有一句名言,爱你心中的艺术,而不是爱你艺术中的我。这是指你在艺术中强调自己的时候,就要把你真正的艺术丢掉了。而你真正爱心中的艺术时,就会塑造出一个又一个光辉的艺术形象,给观众留下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形象。”

“所以,实际也是这样一个辩证关系,当你明白这么一个道理,把心放下时候,你就不会处处总是注意自己,而把注意力放在你刻画的生动的艺术形象上,不会只注意外部形象美不美,而是注意塑造的角色美不美。这次塑造《冰糖葫芦》中的苑大姐,与翟导演及其他那么多艺术家合作,我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吕中停顿了一下,仿佛在一种充满渴望的思索中,然后她说:“对美化生活的认识,是涉及非常宽广的美学意义的问题,涉及对人生的认识,如何充实自己,如何走完这个人生,如何做一个高尚的人等问题。我认为内在的美和外表的美,包括对装饰和居室的美化,对家庭的责任等等,都可以结合起来的。”

四、其他

天色已经渐浓,但程述、许还山还兴致勃勃地在对台词。龚应恬说,程述这位《渡江侦察记》中的情报处长,这次要扮演一个如油老鼠般精明的小老李。当程述与我擦肩而过时,我感觉到了他那机智的眼光。

我向龚应恬问起了投资商及他们的期望。

龚应恬说,这是一个投资拍了《东边日出西边雨》、《过把瘾》等好多好片子的文化影视公司。老总汪一林是一个很有文化眼光的实业家,他对《冰糖葫芦》寄予厚望,将它作为今年最重要的一个片子,希望《冰糖葫芦》能在今秋奉献给观众,去串起千千万万个饶有回味的家庭故事和欢乐。

莫言与他的“红色作品”

一、我们的访谈很自然从有关红色开始了

世界的广袤、人类情感的深邃,以及与他息息相关的山东高密那一大片庄稼地,在他的作品中滚动成炽热、浓彩、灿烂和悲壮。而这一切最初给我强烈和震撼的冲击,是《红高粱》电影结束时那银幕上一片滚动的显得热烈得有些悲壮的火红。

与莫言的见面,是在一个又见白雪的北京初春。他那用深红色面砖铺制的宽大客厅给人一种温暖,我们的访谈很自然地有关红色开始了。莫言认真地说:“我没有对红颜色特别爱好,但与蓝颜色比较起来,我比较喜欢红的颜色。红的颜色充满热情。”他指着客厅地面上的红色面砖又说:“这是西班牙出产的。西班牙的面砖新的时候与常见的那种没有什么区别,但用上几年以后,就与常见的那种发生区别,常见的那种在三五年后变得暗淡无光,而西班牙产的面砖在三五年后,依然发亮。”

二、他的长篇小说《红树林》

他于1997年开始写的一部长篇小说《红树林》,由自己

改编成 18 集的电视剧 ,并且已经拍摄完毕。《江南》1999 年第一期发表了《红树林》的前半部分 ,第二期则登载了后半部分。我说 :又是一个“红色作品”。

莫言解释说 :“其实这部作品 ,与《红高粱》、《丰乳肥臀》没有什么内在联系。”

“这部小说最初的书名叫《珍珠奇谈》。当时我到南方体验生活时 ,对珍珠养殖产生浓厚兴趣 ,想写一部珍珠养殖的小说 ,叫《珍珠奇谈》。改成《红树林》是因为投资商们想到我的《红高粱》 ,对我的这类小说充分理解 ,还想用一个“红”字来表现 ,就把《珍珠奇谈》改成了《红树林》。”

莫言认为《红树林》与他从前写的五部长篇在三方面有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我以前写的长篇 ,都是写我家乡山东高密 ,这部小说描写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是写在南方海边一片红树林里发生的事。而小说中的人物 ,也主要写了一个女市长 20 世纪 90 年代的那种女市长 ,写了这个女市长感情的历程。写法上与过去也有很大区别 ,过去我写东西 ,可能非常用力气 ,把所有的颜色都泼上去 ,假若我手上有 1 公斤颜料 ,红颜色肯定都会泼上去的 ,一点也不节制。而这部作品则比较节制 ,用一种叙述的口吻 ,匆匆忙忙把故事讲完。这个故事太长、太长了 ,我不可能像写《静静的顿河》和《战争与和平》那样 ,一点一点地精雕细琢 ,而且我就是要匆匆忙忙赶快把这个故事讲完 ,像去赶火车一样 ,让大量故事一笔带过 ,有时可能从里面抽出任何一个细节 ,都可以发展为一个独立的中篇。这个作品的内容从苏东坡到洪秀全 ,拉得很开拉得很广 ,也有很大的信息量。编导和编辑都认为很不错 ,至于好不好 ,还应由观众和读者来判定。”

莫言有些兴奋地说：“这部书在1999年3月，要由海天出版社隆重推出。开始，我想把书名改成《红树林》，但出版社说封面都已经设计好了，花了好多钱了。那就用《红树林》算了。但如果按我个人想法，还是愿意用最初的《珍珠奇谈》。”

三、一位女大学生说，她是被 《丰乳肥臀》这个书名吓跑的

1999年2月6日，莫言在北京海淀图书城签名售书时，一位女大学生坦率地问：“你为什么要取‘丰乳肥臀’做书名呢？这个书名吓跑了许多读者，包括我在内。本来我喜欢你写的作品，但一看这书名，我就不买了。你为什么要取这个书名呢？”

莫言回答那位女大学生说：“你这样提问，我很为难。你没有看过这本书，有什么理由来批评呢？”

说实在的，《丰乳肥臀》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和猜测，认为其书名有哗众取宠、进行商业包装的嫌疑。对此，莫言毫不回避，他自有对书名及内容的一番说明和辩护。

“我用这个书名，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这是我1995年春天回山东去的时候写的，大约50万字。在1995年底这部书出版之前，出版社的编辑和一些朋友，包括一些领导，都对我进行过劝告，认为这个书名肯定会招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也相信肯定会丢掉一些读者，而且招徕一些麻烦。但我经过慎重考虑，还是觉得必须用这个书名。”

莫言的眼神中闪烁着一种真挚，还有自信，他说：“因为这个

小说主要写母亲生育的历史和大地怎样繁衍了万物。我想城市建设,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化也是大地繁衍的一种产物。我们的大地不仅生长庄稼,也培育了人类。所以,双重的生殖、孕育的意象,最好用‘丰乳’来表达,以歌颂孕育这种伟大的力量。”

“小说的前六章,是写母亲传统意义上的忍辱负重,靠一种强大的母爱,接受来自各方的孩子,把他们培养成人。母亲则忍受了各种各样的苦难、病痛、战争、战荒、逃难等。到第七章,则对这个母亲形象进行了一种挖掘。”

“她的8个孩子来自何方?我在第七章突然写到,她是德国人入侵山东的时候出生的,她被生下后,父母双亡,受到各种各样的压迫,是跟姑姑长大的。然后,她出嫁,她的丈夫恰恰是没有生育能力的。在封建社会,没有生育能力,会归咎于妇女。一个女人如果不能生育,在家庭就毫无地位,要忍受来自公婆的、丈夫的,以及所有黑暗、落后势力的压迫。这个过程是忍受无数苦难的过程。”

“妇女要在封建家庭立足,必须要生孩子。逼着她去找外遇,找外遇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感情,而是为了生育。结果8个孩子来自7个父亲,而且前面7个孩子都是女孩。后来,有一次在一个非常急躁的情况下,跟一个流落到中国的来自瑞典的传教士产生了真正的感情,生下了一个‘杂种’。按传统的世袭观点,这种中西方文化杂交的都不是好东西。我的小说里的他长得特别漂亮,体魄特别强健,但他在精神上是一个残废,从小眷恋乳房,没有母亲的奶,他就无法生活下去。实际上是在过分的溺爱下,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能力。最后母亲醒悟:不要正中下怀的男孩,而要顶天立地的男人。”

莫言依然以那种自信说：“只有读完了这本书后，再看《丰乳肥臀》这个书名，才会感觉到我是有很严肃的考虑的。”

四、因为很不服气，所以写了《红高粱》

对12年前中篇小说《红高粱》在《人民文学》一发表就引起很大轰动一事，莫言至今仍难以忘怀。他认为在《红高粱》之后，连续写了4个中篇，合成一个有内在关系的“红高粱家族”，是他创作的突破。

莫言以略带感谢的口吻说：“但这个小说真正走进千家万户，还是因为被改编成电影。由张艺谋导演，巩俐主演的电影《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大奖，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

那么，为什么要写这个《红高粱》呢？

莫言叙述了一段往事：“军队作家开会时，大家觉得苏联卫国战争打了5年，结果出了五代军事文学家。而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了8年，却没有出现好的军事文学家。当时我们年轻作家很不服气，苏联五代写卫国战争的作家，起码有三代没有亲身经历过卫国战争，但他们完全可以写。我们虽没有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也可以写抗日战争，写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我们写的战争是心目中的战争，我们写的历史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历史，实践一种新历史主义的观点。”

“现在让我总结，我认为首先这是以一种崭新的视角，关注历史，研究历史，回头看历史。这种视角一旦确定以后，所有的东西都迎刃而解，势如破竹，而且我们还有想象。”

莫言强调这一视角以及与视角直接相关的以第一人称叙

述的意义,我很能理解。南京大型文化周刊《东方文化周刊》1999年第9期上转载莫言小说《蝗》(上),也用了“我爷爷”、“我父亲”的叙述,将一个1927年发生的大灾难写得如临其境,这恐怕要归功于“第一人称”发挥了独特作用。

莫言就《红高粱》的特色,接着说:“《红高粱》是农村题材的作品。它与战争沾一点边,写的是抗日战争。从这个角度反映抗日战争,是一个独特的角度,或者说这种表现方式是一种革命性的。以我爷爷、我奶奶这种口吻来叙述,一下子使历史具有某种可信,一种全新的后代人来关照前人历史的表现方式。提及祖辈的所谓风流韵事或者污点等,如果按传统历史小说,肯定不行,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而如果用这种叙述方式,就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局限。”

前不久,《钟山》刊登了山东一个评论家的文章,作者认真研究了新时期新历史主义的小说,认为这类小说占了小说创作的相当大一部分。文章认为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范文和典范。而“红高粱家族”之后,以第一人称写土改的小说,写自己祖先、祖宗的小说,就有点泛滥了。可以说,他对莫言“红高粱家族”的评价是比较冷静的。

五、第一个成名之作是《透明的红萝卜》

是巧合,也不是巧合,莫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写的成名作、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也与红颜色有关。但是,他这篇成名作却是充满一片绿意。

莫言说:“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保定当过三年的政治

教员,在一个军校的大专班,教马列主义公开课。后来到宣传部当宣传干事。第一部小说《春夜雨霏霏》于1981年9月在保定市文联办的《莲池》发表。《民间音乐》是我第一篇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当时这个小说也在《莲池》发表。白洋淀派创始人、‘旗帜’作家孙犁在一篇谈读书的文章上,给予这篇小说很高的评价,觉得《民间音乐》很有空灵感,写得很好。我考解放军艺术学院时,这篇作品帮了我很多忙。”

莫言接着说：“在写《红高粱》之前,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已写了10多个中篇,包括《透明的红萝卜》。这个中篇小说在《中国作家》发表后,由主编冯牧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大型的作品讨论会,由冯牧老人亲自主持召开,这是一个破例。”

从此,莫言的小说创作一发不可收。引人注目的中篇小说《爆炸》,还有五六个短篇小说,直至中篇小说《红高粱》,组成了莫言“红色作品”的第一个高潮。

六、预测中国小说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莫言认为刘恒最近走红京城的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一部语言有特色的好作品。莫言进而说,他对整个小说创作、小说在文艺生活中所占的位置,持乐观态度。

“按照我的想法,可以供阅读的文学作品,起码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会因为电脑、影视,它就消亡了。影视如果想出精品,要依赖文学,文学是所有艺术的母体。回顾一

下新时期电影、电视上的成功之作 ,没有一部不是从成功小说上改编而来的。我们的小说 ,实际上为电影、电视导演提供了一种展示他们创造力的基础。”

同时 ,莫言清醒地指出 :“ 预测中国小说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任何作家都不能改变中国小说的走向。创作不像经济硬指标 ,更不是一种气象预报。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立的个性 ,真正的创作是绝不同任何人重复的一种精神操作的过程。我们的很多思考 ,很多创作的美丽境界 ,要比李白的、《诗经》的高明吗 ? 很难说 ,也不能那样比。所以 ,我认为 ,文学创作没有前后 ,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

七、相信外国人对中国作品的评价 ,会误入歧途

日本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在授奖仪式上发表演讲时 ,曾点到莫言和另一位中国作家的作品 ,这是令中国作家自豪的事情。莫言对此却看得很淡。他说 :“ 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只说明我有一个外国读者。另外 ,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 ,与我们不一样。国外出版社的商业操作非常厉害 ,他们出版一部中国小说 ,都会不遗余力地推出 ,有些宣传有点过分。如果你相信外国人对中国作品的评价 ,会误入歧途。”

“ 我的书在日本出版比较多 ,大概有 5 种。今年 10 月 ,日本的平凡社将推出我的新作。另外 ,我的作品已有 18 种文字 ,外国人对我的书评价较好。”

莫言肯定地说 :“ 要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写后或读后的感觉。这里我想提一下 ,长篇小说《九国》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部

作品。这部作品没有在刊物上发表过,第一版印过 9000 册。李佗从美国回来,他在美国时读过《九国》,认为很前卫,具有一种挑战性。现在评论家向我要样书,我拿不出来了。我打算在今年 7、8 月份,安排时间全面修改一遍再版。”

莫言的下一部作品将是再版的《九国》。不管怎么样,字里行间又会有那种壮阔的红色、激越的红色和内在的红色……

从《一代才女林徽因》到 《林徽因传》

林徽因是位充满诗才的建筑大师，是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1993年林杉的《一代才女林徽因》，又一次引起海峡两岸众多读者的感慨和倾慕。5年来，林杉一直在琢磨这本传记，不遗余力地搜集着林徽因的事迹。

一次，他偶然在书店买到一本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纪实作品，查到一条线索，立即多方联系，一查到底，找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1934年10月，梁思成、林徽因应浙江省建设厅之邀，到杭州商讨修复六和塔之事，不但到过《一代才女林徽因》中提及的武义宣平，发现了元代建筑延福寺，而且还到过金华，发现了一处元代建筑，即现在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宁寺。林杉兴奋不已，当天晚上打电话告诉我，要把这条史料写进再版的《一代才女林徽因》中。他还说，再版的《一代才女林徽因》就用台湾版的书名《林徽因传》。

当林杉将一本刚刚由九州图书出版社出版的《林徽因传》递给我时，首先感到了它的分量，继而被封面设计所吸引，雅致的底色，左边一幅少女林徽因的倩照，照片下有一行字：“一代才女的心路历程”。仔细看，封面右下部还有四幅照片：林徽因与父亲林长眠的合影、与诗圣泰戈尔及徐志摩等

人的合影、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美术学士学位的照片和 1935 年梁思成为她所摄灯下遐思的珍贵照片,这些照片大多第一次公布于众,起到了全书脉络提示的独到作用。

林杉说:“《林徽因传》所收照片增至 43 幅。新收集到的照片有少女时期林徽因、梁思成、林徽因在新月社、徐志摩年轻时诗人味很浓的侧面照,以及林徽因与梁思成考察文物古迹的原始图像记录,有的照片很珍贵,如 1937 年林徽因在陕西耀县药王庙测绘佛像的照片,大佛和贴坐其上认真做记录的林徽因相映成趣,是十分难得的林徽因现场文物调查照。”

林杉说:“《林徽因传》增至 25 万多字,比《一代才女林徽因》多了 4 万余字。”

林杉接着说:“与《一代才女林徽因》相比,《林徽因传》有点面目全非,作了很大的改动,如原来诗化的小标题觉得太虚了,全都改了。《林徽因传》更突出了她在建筑方面考古、考察的贡献,凡是她到过的文物古迹,尽可能都叙述。她是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她的才华、她的奋斗、她对祖国的挚爱等,可以说她是建国 50 年来难得的一位才女。所以,这一部书也是献给建国 50 年的礼物。”

林徽因早年留学英伦,与著名诗人徐志摩有一段温馨的恋情。1931 年 11 月 19 日,早已成为维新派首领梁启超的大公子梁思成夫人的林徽因,在协和小礼堂给外国使节讲中国建筑艺术。徐志摩曾从南京打来电报,要赶到北京听林徽因演讲,梁思成驱车南苑机场去接,却空车而归。后来传来噩耗,徐志摩乘坐的“济南号”失事,机毁人亡。社会上对徐志摩的赞美和攻讦自他逝世后不久就开始了。徐志摩在 1925 年去欧洲前,曾有一批信件和几本日记本装在一个八宝箱里

交给凌叔华保管。当时八宝箱的下落成为一个焦点。后来在胡适先生和林徽因的一再要求下,凌叔华将这一八宝箱交给了胡适,胡适又将它转交给了林徽因。《一代才女林徽因》中虽对此有所交代,但仍有许多疑问。《林徽因传》则以“八宝箱的奥秘”一个章节,对延续半个世纪的这桩公案,收集了详尽的史料,作了细致的描叙,还征集了新发现的四封信,这些信分别是1982年10月15日和1983年5月7日由定居英国伦敦的凌叔华致陈从周教授的两封来信,以及林徽因于1932年元旦和这年正月初一给胡适的两封信。这四封信专门谈及徐志摩八宝箱里面的信件日记,尤其是对有关徐志摩、林徽因康桥之恋的两本英文“康桥日记”的下落,作了较明确的交代。虽然这两本英文日记不知谁撕去半册,用林徽因的话说,“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但这两册不全的日记最终陪伴林徽因至生命最后一刻,焚于“文化大革命”之中。

林杉说:“这是《林徽因传》的新增内容,基本揭开了八宝箱的奥秘,会引起读者和研究者的注意。还有徐志摩失事去世后10天,林徽因曾在《北平晨报》发表了一篇约7000字的感人肺腑的《悼志摩》,这次也全文收入。”

林杉在靠窗的沙发椅上往后靠了靠,表现出一种宽松的心态,他说:“五年来,平时处处留意,今年夏天集中所有休假日,几乎重写了一遍,对所有引文都作了校订,增删处达50多处,对不太精练处作了修改,对有错误的地方作了更正,并作了补充,少则几十字,多则几百字、上千字等等。”

林杉对重要的修订如数家珍,他说:“诗哲泰戈尔于1924年4月访华,成为中国文坛盛事。林徽因、徐志摩曾与泰翁左右挟臂而行,被京都报纸在醒目版面上誉为苍松竹梅三友图。

以往资料都认为泰翁4月23日的演讲是在天坛公园举行的，这次经过核实，发现地点是在日坛公园。原来演讲确是定在天坛公园草坪上举行，但考虑到天坛公园要收门票，为照顾经济拮据的北京大学生，最后改在不收费的日坛公园举行，《北平晨报》发了公告。据此，《林徽因传》中对此作了校正。”

林杉又说：“作为传记，要给人以真实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一代才女林徽因》至《林徽因传》，不是简单的再版、改名，而是重新审视，重新取舍，重新叙述。这里有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在泰戈尔访华结束火车快要启动时，徐志摩即兴给林徽因写过一封信，但未写完，车启动了，徐志摩要把未写完的信扔掉，被泰戈尔的英文秘书一把夺过，放进了公文包。这次，通过香港作家，复印了这封未写完信的原件，收入了《林徽因传》，增加了作品的历史价值。”

我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轻轻翻动着装饰高雅的《林徽因传》，不禁被林徽因当年创作的四幕话剧《梅真同他们》中的一段台词所震撼了：“我就说这个！新角度的透视。为了这新角度，我们的世界，乃至宇宙，忽然扩大了，变成许多世界，许多宇宙。”林徽因正是以这种每天迎来新一轮太阳的新的角度，走完了她诗人、才女、考古学家、建筑大师的一生，放射出动人的魅力和不褪色的光芒。林杉也以这样新的视角，透视林徽因心迹以及精神，为读者奉献了一部具有吸引力、真实感，并有许多新发现的《林徽因传》。

最后，林杉又风趣地以诗人的想象力，与我一起畅想梁思成、林徽因到过金华的一幕。他说：“他们肯定品尝过火腿菜，肯定像李清照一样漫步过婺江之畔，也许还登上过八咏楼，品味那‘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洲’的诗境……”

苏双碧谈新版《吴晗传》

《吴晗传》是苏双碧、王宏志这一对史学教授的心血之作。苏双碧是吴晗生前的秘书，北京历史学会惟一的专职干部。“文化大革命”初期，参加过以邓拓为组长的《海瑞罢官》问题讨论写作组，虽出于“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得以健康发展”的真诚愿望，却在后来被扣上了“假批判、真包庇”的帽子，受到吴晗和“三家村”冤案的牵连。

1978年11月15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苏双碧以一种大无畏的胆略，在《光明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外电纷纷报道。香港报纸称：“中共开始批判文化大革命了！”苏双碧和王宏志，也就在那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写一部《吴晗传》，吴晗胞妹吴浦月等也极力鼓动他们写。他们认为，吴晗高尚的品行和学术上的成就，应该让许许多多的人们汲取，而吴晗惨遭“文字狱”的悲剧，更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的警策。

由彭真同志亲笔题写书名的《吴晗传》，于1984年8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成为当年京城畅销书。首印2.2万册，很快一售而空，又加印了两次。与其说这是对一部书的热烈反

响,不如说是人民对十年浩劫之中特殊人物的一种怀念,对十年浩劫的一种反思。吴晗的挚友,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读完《吴晗传》竟老泪纵横,对苏双碧、王宏志说:“谢谢!谢谢!吴晗就是你们写的这样!”

几年后,《吴晗传》获中国传记文学评奖一等奖。

苏双碧夫妇却未因此陶醉,10多年来,他们仍在尽力搜集有关吴晗的资料,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初期风云突变的前前后后。苏双碧说:有的要推倒重写,写吴晗这是关键时期。这不仅仅是吴晗个人的悲剧,从中可以发人猛醒的东西太多了,写出来很有意义。

苏双碧夫妇说,美国学者马紫梅女士,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观察吴晗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时期。写了一部英文的吴晗传记《时代之子:吴晗》,由曾越麟等译校后,1996年在国内正式出版发行。“我们也一直在考虑新版《吴晗传》,将当时不能写不宜写,但又是真实的内容写进去,进一步写出真实的吴晗、真实的历史。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版《吴晗传》。付印前所有文稿(包括前言)专门送高层审定,保留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史料完整,我们很高兴。”

在苏双碧那宽敞、大方又充满书卷气的住处,我们在一种聊家常的宽松气氛中谈起了吴晗,谈起了新版《吴晗传》的三大修订之处。

“增加将近10万字主要是增加‘文化大革命’的内容。过去我们写的时候,这段历史写得比较简单。当时提出来写‘文化大革命’宜粗不宜细。再一个就是有很多问题没有完全了解清楚,所以只好从简。”

“吴晗的《海瑞罢官》案子,影响很大,实际上是一个‘文

字狱’对知识分子冲击很大。当时批吴晗,这个背景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姚文元那篇文章是怎么出笼?过去说是林彪、江青和姚文元炮制出来的。现在觉得这样写不太准确,因为林彪当时还在苏州休养。江青呢,这个人职务也不高,她没有操纵整个全局的力量。因此批吴晗这篇文章,涉及‘三家村’,涉及彭真,后来又成为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突破口,这实际上是很大的事。”

苏双碧强调说:“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新版《吴晗传》前言中着重写了。要讲真话,讲真话是为了吸取深刻教训。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的文章里说过,如果没有毛主席允许,我是不敢去组这篇文章的。毛主席和斯诺谈话时也说了,他在北京找了三个人写,第一个人说吴晗是历史学家,不能批,第二个人也说不能批,第三个人是不敢写。这样才到上海组了一个班子。康生在一本《大事记》里讲了,在批吴晗文章发表前两个月,毛主席和康生讲过,要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并说从阶级斗争角度来看,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以,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现在对类似情况作了真实反映,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了。”

一种经历过大思考之后的平淡和坦率,形成了一个大学者的风度。他话锋一转,接着谈起了修改有关吴晗《朱元璋传》的内容。他说:“社会上有一种观点,实际上是贬低吴晗的。说吴晗在解放以前写的《朱元璋传》,学术水平比较高。解放以后,吴晗为政治服务,写得比较差,没有什么学术味道。我们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吴晗解放前写的《朱元璋传》,叫《从僧钵到皇权》。40年代出版的。那个时候是抗战时期,参考资料很少,历史差错比较多。另外,吴晗自己说,一是为了

稿费,当时生活困难,需要稿费;二是要骂几句蒋介石。所以他就写了这么一本书。解放后,吴晗修改《朱元璋传》是不是为了迎合政治服务?实际上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吴晗是一个书呆子。毛主席当时确实说过,对吴晗提过意见,朱元璋是一个开国皇帝,又是农民领袖,要写得好一些。当时,学术界有一股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都在检讨,解放以前写历史不够科学。吴晗检讨的就是这本《朱元璋传》。范文澜是检讨写‘孙权’,生硬影射蒋介石。他们都强调写历史要讲科学,所以在这个时候,吴晗写《朱元璋传》是一心一意,在史料、在观点上下功夫。他并没有去迎合政治服务,如果他想迎合,就不会写那么多,什么朱元璋限制后宫,不让后宫同外界联系。若通信或替外界传递信件,都要处罚。这些内容本来都是历史事实,但江青看了很反感。另外,他在《朱元璋传》中对朱元璋历史评价了几条,总体上是肯定的,但认为朱元璋搞特务政治、文字狱等等不行。吴晗写得很具体,按照条数的话,朱元璋的缺点比功劳还多。这正是吴晗正直之处。我们在新版《吴晗传》中对这些内容写得比较多,恢复了吴晗写《朱元璋传》的本来面目。”

“还有反右派,这是一个老问题,现在有些人对吴晗反右派有意见,认为他反右派不应这么积极。”苏双碧讲到此,看看我的反应,因为我知道吴晗的弟弟吴春曦和小姨子袁溥之都被打成右派,而吴晗一点也没有怀疑过这是“扩大化”,这是“左”的错误,反而认为是弟弟和小姨子不对。苏双碧说:“吴晗从1942年开始,对党对毛主席,从来没有怀疑过。所以,他对毛主席发动这场反右派斗争,不认为是错误的。我们在新版《吴晗传》中用了一个‘真诚的人犯了真诚的错误’的

题目,写了吴晗在反右派斗争的表现。他是诚心诚意的,没有任何怀疑,诚心诚意到有点可笑的程度。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新版《吴晗传》在少奇百年诞辰之际出版,苏双碧说:“这是一个巧合。我们很推崇少奇同志‘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那句名言。这恰恰也是吴晗,包括‘三家村’,以及许多曾有不公正遭遇的人们,他们的坎坷与光荣、耻辱与昭雪的最好注释!”

蒋星煜的《海瑞》与 吴晗的《海瑞罢官》

出生于江苏溧阳的我国著名戏曲研究学者蒋星煜，在位于上海田林新村的住处一见到我，就风趣地指着放在沙发对面镜框内的陈望道手迹说：“你们义乌人对我影响太大了。一个是陈望道。1939年，我考进设在赫德路（今常德路）的复旦大学，读的国文课本中有一本就是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1942年，我将对《修辞学发凡》的一些建议，如书中所举的例子似乎可以更多一点等等，辗转带到了重庆北碚夏坝，当面交给了陈望道，他非常高兴。后来我们通了多次信。很巧，1950年，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文化部，陈望道是部长，我在艺术处，是上下级关系。对我一生更富有戏剧性影响并使我得到人生锻炼的是另一个义乌人——担任过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

吴晗比蒋星煜年长11岁，2000年是吴晗诞辰91周年，对于吴晗的屈死，我们试图从中寻找一种教训与启迪。

蒋星煜说，他写的海瑞传记，比吴晗写的有关文章和剧本要早一些。

“1955年，昆剧《十五贯》获得了周总理的赞誉，在观众中影响也很大。我对剧中主要人物况钟的生平，作了研究。况

钟和海瑞都是明代有代表性的清官,我通过比较,认为真正斗争得比较艰难的清官还是海瑞。于是,我在1956年,写了历史人物传记《海瑞》,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印了10万册。出版时很不容易,因为是在反右高潮之中,很多人为我捏了一把汗。”

“1959年,毛泽东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学习明代清官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后,吴晗写了长篇学术论文《论海瑞》,用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当时,上海市出版局局长罗竹风对我说:‘现在中央提出学海瑞,参考材料还不多。吴晗同志写了一篇。作为传记,你写的有7万字。我们上海向中央作了推荐,不少高层领导都在看你这部书哩。’”

蒋星煜说:“一开始我与吴晗没有直接关系。后来,中华书局要编纂、校订、出版《海瑞集》,派老编辑陈乃乾专程从北京到上海来找我。他说:‘吴晗先生和你一北一南,都对海瑞有研究。对如何编《海瑞集》,吴晗先生已经提了不少意见,我们特地来征求你的意见。’”

“陈乃乾和我讨论了《海瑞集》的一些具体事项。有关该书的序,中华书局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因为吴晗工作比较忙,不再写序了,就用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海瑞》作为代序。另一个方案是,请我写,对此吴晗先生认为很好。我说:‘吴晗先生是我的前辈,用他的《论海瑞》代序比较好。’这样,该书的序就定下来了。”

蒋星煜对这样的处理表示满意,他告诉我:“在《海瑞集》的后记上,编辑还提到了我在上海作的海瑞研究和有关工作,提到了当时有两位同志协助我搞这方面研究,一位是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方行,一位是我在解放前就熟悉的老朋友丁景

唐,他那时担任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

“看来吴晗这个义乌人与我有缘,有关《海瑞集》只是我们交往的序章。至于我们共同研究海瑞,后来发展到作为中国的一段重大历史的直接导火线,这是我原未料及的,也是吴晗原未料及的。”蒋星煜颇有感慨地说着。“吴晗与我的直接联系,是由于他写了一篇《海瑞的故事》,我仔细研读了,觉得有一些事实和细节值得商讨。如海瑞没有做过兴国州的通判,只做过兴国县知县,而吴晗先生的文章弄错了。其次,我对明史有研究,找来了《徐氏族谱》反复阅读,觉得徐阶并不是很好,还做过一些好事,觉得吴晗的《海瑞的故事》对徐阶责难重了一点。我就把以上两点看法写成一篇文章,与吴晗先生商榷,寄给了《新观察》杂志。”

“《新观察》杂志把我的文章转给了吴晗,百忙中的吴晗,特意给我回了一封信。吴晗先生写道:‘我写《海瑞的故事》时,还未读到你的《海瑞》,后来才读到,认为用力极深。’吴晗对我指出通判、知县之误表示感谢。但吴晗对我太相信《徐氏族谱》表示了不同意见:‘先生根据《徐氏族谱》,徐家人当然替徐阶说好话,谀墓之词是不足信的。’”

蒋星煜说,“吴晗虚怀若谷的态度使我感动,他以唯物辩证法看待《徐氏族谱》的方法,又使我深受教育。”蒋星煜强调了一个观点:“我认为吴晗先生提出的辩证地看待族谱、家谱的见解,不仅仅是对研究明史、研究海瑞,而且对研究整个历史,都有重要意义。族谱、家谱中无疑有不少有价值的内容,但也应当有所鉴别。否则,就太书生气了。”

蒋星煜接着说,他对吴晗的敬佩,还由于“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继续进行对海瑞的研究,在河南省见到了与徐

阶、海瑞同代为官的重臣高拱的明代刻本文集。高拱在徐阶、海瑞之间持中立态度，所以他的奏章可信度比较大。看了他的奏章后，使我大吃一惊，当年，徐阶在北京城外交通要道上开设了一家布店，其实是一个特务机关，凡有上京反映徐府问题的人，一旦探听到消息，就予以打击、迫害。可见，徐阶是很险恶的。吴晗先生关于不要轻信族谱的判断是科学的。”

1965年末，江青、张春桥在上海密谋，姚文元发表了震惊海内外的批判吴晗与《海瑞罢官》的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蒋星煜自然逃不脱厄运，被张春桥设计的“引蛇出洞”圈套网住。但是，蒋星煜在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形势中，没有人云亦云，落井下石，而是保持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与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一伙斗智斗勇，尽量实事求是地论吴晗、论《海瑞罢官》及自己的《海瑞》。

“张春桥在上海开了两次有关吴晗《海瑞罢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徐德麟、陈守实、张家驹、刘大杰等，由陈虞孙先生主持。座谈会气氛很紧张，尤其是第二次，那是1965年最后一天的下午，与第一次一样在上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

“我和与会者观点差不多，吴晗写的剧本《海瑞罢官》有些问题可探讨，有不足有缺点可修改，如古为今用是对的，但太往政治上靠，艺术上就不强。但讲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不能理解了。我说了一个意见，要讲一分为二，海瑞是一个具体的人，现在姚文元等写的文章，将海瑞讲得一无是处，一点也没有借鉴意义，这不是一分为二。

“人们觉得姚文元的文章过于盛气凌人，把学术问题上纲上线，很难接受。当时，上海市文化局剧目工作室主任曾找

我谈话,明确希望我与姚文元展开笔战,《文汇报》的两位编辑也特地到市文化局找我,在草坪上谈了一个多小时,希望我写文章与姚文元展开面对面的论争。我答应写一篇论述海瑞罢官历史背景的文章。几天后,我写了一篇万余字的长文《海瑞因何而罢官》,《文汇报》很快排出了校样,但始终没有能发表。

“到1966年2月,对我的批判也急转而下,徐景贤的写作班子在1966年2月12日的《解放日报》,以丁学雷笔名发表《海瑞上疏为谁效劳》,指责我和吴晗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一分为二看‘清官’》,在摘引吴晗作品中的某些语句加以‘批判’的同时,又以‘蒋星煜同志也这样质问’开头,引用了我在座谈会上关于一分为二问题的发言,然后横加诬蔑和谩骂。”

蒋星煜坐在沙发上不动声色地沉默片刻,我觉得此刻他像一尊坚定的岩石,又像一座充满想象的雕塑,历经大风大浪,显出本色气节。如今蒋星煜在一种淡泊的心境中回顾历史,撰写新章。书桌上放着他很快要出版的一部散文随笔的清样。近年来他对《西厢记》独辟蹊径的研究引起了日本、台湾和国内同行的刮目相看。

蒋星煜眼眶有些潮润,对我深情地说:“我已将吴晗给我的亲笔信,捐给了海口市海瑞墓管理处,他们在陈列柜中作重点陈列,以通过展出,教育更多的人。我以为永远记取吴晗因《海瑞罢官》剧本而制造文字狱的惨痛教训,具有深远意义。吴晗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他在从事行政工作的同时,严谨治学,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明史的研究,用了许多苦功。他写的文章非常通俗易懂,中学以上文化的读者都能读懂,这一点很有特色。

他一生留下了许多精神财富。这一切都值得后人发扬。”

龚应恬的《认识马俊仁》

可以说,马俊仁热是1998年中国的一个社会文化现象。赵瑜的《马家军调查》和开来的《我为马俊仁当律师》各抒己见,甚至不少是水火不相容的对立观点,由此产生了强烈的远远超出文学和体育范畴的社会文化震荡。当曼谷亚运会上传来我国女子中长跑运动员夺牌失利的消息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缺席的”马俊仁和马家军。

为此,英国《每日电讯报》称:“马俊仁教练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家军调查》与《我为马俊仁当律师》两部约40万字的著作出版之间,还有一部17万字的《认识马俊仁》由中国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据说原来也要邀请马俊仁前来北京签名售书,马俊仁也亲自打电话给该书的作者、义乌籍作家龚应恬,表示:“《认识马俊仁》虽也有些缺憾,但这是一个客观的说法。”然而,面对可能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还有商业效应,龚应恬却与其他有关作者不同,保持一种独有的超脱和平静。

从1998年9月底《认识马俊仁》出版后,龚应恬已拒绝了至少5批记者、编辑的友好“访问”。他说:自己不愿陷入到有关马俊仁和有关写他的书的炒作浪潮里去。作为作者,

文章写出来了,印出来了,文化的任务已经完成。如果你还有素材,还有时间,还有经历,还可以写第二部、第三部嘛!

1999年,是建国50周年。龚应恬说:“我不可能中断有关创作,而去当新闻人物。一部取名《金婚》的电影文学剧本正在写。这件事与别人关系不大,但和我的关系很大,是我继《王震》、《中国马家军》等电影、电视剧创作后,又一个可以一提的剧本。它写了一对普通老年夫妇50年的夫妻之情。妻子因患老年痴呆症,一下子走失了,丈夫靠修自行车,一找就找了三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创作的时候,当然有加工、提炼,虽不直接写共和国50年的历史,但实际上折射共和国50年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融。”

“我对此倾注了精力和美好的情感。所以,我不愿也不能打断这个创作,而投入到可能会‘轰轰烈烈’的那个马俊仁热之中。一家很有影响的生活类杂志的编辑要采访我并要我一张近照,我开玩笑说:‘我既不漂亮,也不英俊,放在封面的话,会有损于你们的发行量。’我友好地谢绝了。”

龚应恬对他自己的《认识马俊仁》情有独钟,他强调:“我觉得写《认识马俊仁》这本书很有必要。马俊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确实需要有人站在文化立场上来谈谈这个问题。现在有的人是通过马俊仁的所谓‘鲜为人知’,所谓马俊仁背后的一些秘密,将马俊仁作为一种商业现象,或商业机会来炒作。我觉得马俊仁没有隐私,也没有秘密,他最大的秘密,就是破世纪记录的秘密,还有比这个更大的秘密吗?其他,我觉得都是次要的问题。马俊仁自己说过,我如果去美国,可能连当教练的资格都没有。美国很讲究文凭,也讲究所谓的科学。马俊仁说,我的科学观不符合西方人眼里的科学,是一种土科

学理论阐述不清的科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将马俊仁的事情过分炒作,我认为是不恰当的。”

“我这本《认识马俊仁》,是想通过马俊仁这种现象,看中国各个行业中形形色色的东西。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炒作马俊仁的高峰。其实当时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人写马俊仁,我写得比较早,是1994年。这本书出版时,正好在赵瑜和开来两本书之间,就内容而言,在别人看来,也是处在中间态度。”

谈到此,龚应恬敞怀大笑起来,“中间派”似乎有左右逢源,甚至“投机”之嫌疑。龚应恬亮出了他自己的底牌:“其实,这都不是我的态度,我的态度就是广东东莞清溪镇那个大字认不得几个的、阉猪出身的、将一个十来万人口的小镇弄得像欧洲花园般的党委书记殷顺喜说的话:‘中国需要一种精神。’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普通人对成功者的态度。我是以一个旁观者来看待成功者的,与赵瑜、开来的两本所持的态度没有关系。”

谈到赵瑜和开来,龚应恬认为,双方大可不必很有点刻薄的论战。他说:“赵瑜是一个严肃的作家,确实有才华,但他把马俊仁推到一个极端,似乎包含着一种商业行为。而开来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在许多人看来,写马俊仁都是商业行为。那么,我写马俊仁,也有商业行为。但是,在有商业行为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个作家起码的行为准则、写作道德,我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阐述个人见解,通过自己的发现,来写这样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普通人,又有点不太普通的中国人。”

1999年第一期《南风窗》卷首有一篇秦朔写的《第三只眼睛看马家军》,他认为赵瑜和开来双方的观点“就像人的两只

手一样,完全可以相插在一起,只不过由于分工不同,生活中它们时常分离。现在,由于某些外力有意无意的搀和,这两只手离得更远了。”

龚应恬对此似乎与秦朔先生的精论很有相通之处。龚应恬说:“早在《认识马俊仁》尚未印制完成之际,就有人来策划,想把我这本书与赵瑜的书对立起来。后来,有关谈文化人弱点的内容都删掉了。当然,大多是出版社删掉的,现在看来,他们删掉是对的,否则,可能卷到另一个漩涡去了。”

“现在我写的只是马俊仁,赵瑜可以写,开来也可以写。我是写马俊仁这个人物折射出来的一些社会文化现象,并让人家好好琢磨一下。”

“我这本书出版后,主要是让读者看。我觉得纪实文学应区别于小说。小说需要作者尽的力更多一些,70%由作者来透视,而读者感受占30%。而一本好的纪实文学,应有更深刻的东西,让读者自己去领会。我认为40万字大可不必,如果真能懂得马俊仁的话,一句话就够了。我正因为还不太懂马俊仁,所以还写了17万字。如果真的说不清,40万字也说不清。”

不过,龚应恬认为他今天的17万字也许不是终结,也许马俊仁这个人物以及由此迸发出的其他有意思的现象,会促使他又写马俊仁。他觉得马俊仁这个人物始终会成为社会热点话题,成为非常有辐射力量的一个“核”,正像马俊仁自己所说的是一个生命核能的“核”。

龚应恬很坦率,他又谈到了读者对《认识马俊仁》的各种反应,包括与他的商榷与批评。

“《认识马俊仁》出来后,听到许多声音。从文学艺术角

度而言,包括雷达这样的评论家,都充分肯定。从写马俊仁这个事件而言,一些非常慈爱的长者,都用极其负责而且十分关爱的口气,说你写这本书,肯定得不偿失。因为人们感到你去凑一份热闹。也有读者来信,口气非常尖锐。有的人认为写一个人的弱点,写一个新闻人物的背后,就是深刻,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所以,我这么来写马俊仁,好像缺乏勇气,是一种文化上的献媚。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读者,这还不是一个一般的读者,是北京一个大学教古韵学方面的教授,好像带有很强的民族情感意识。里面也有提出和我商榷的意见。还有读者认为有的章节跳过去了。我就说了,这本书是经过中央好几个部门的审查,删掉了一些内容。

龚应恬肯定地说,一个有特色的人物,几部写一个人物的作品,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无论如何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和开明,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马俊仁是一个民族英雄,恐怕以单纯从赢得金牌去理解马俊仁,还要深刻得多。

梁文茜谈梁实秋

一代文学宗师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和她在美国西雅图倾注毕生心血于营养学研究的妹妹梁文蔷、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致力于数学研究,曾与华罗庚多次合作撰写论文的弟弟梁文骥一样,自己选择了志愿和兴趣,1951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一直与“罪与非罪”打交道,成为一名海内外著名的女律师。

刚一见面,就觉得她很有文人气质,既热情又端庄,看不出她已经69岁了。作为北京市政协常委、朝阳区政协副主席,她正在为全面修缮老舍的故居写提案呼吁。她认为北京是文化名都,应当突出这方面特色,像英国保护莎士比亚故居那样,重视名人故居的修复和开放。

她谈起了杭州、西湖和灵隐寺,谈起了金华火腿。他父亲曾写了一篇著名的《火腿》文章,我背出了其中的一段:“有一次得到一只真的金华火腿,瘦小坚硬,大概是收藏有年。……老板奏刀,砧的一声,劈成两截。他怔住了,鼻孔翕张,好像是嗅到了异味,惊叫:‘这是地道的金华火腿,数十年不闻此味矣!’”

梁文茜特别高兴地说:“我父亲离开大陆后,想起本乡本土,首先想到金华火腿。在外面吃不到这么好的火腿,那感情

是不一样的！”

谈及1987年11月7日，梁实秋突发脑溢血去世，梁文茜奔丧去台北，却被阻在香港，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后来迫使台湾当局改变“死硬”态度，允许大陆亲属奔丧一事，她依然充满了激奋。

“那次在香港闹得非常轰动，台湾方面不让我进去，我非要进去，结果引起好多新闻记者来采访。我说，为人要是不孝，要为天下耻笑，如果父母死亡，你都不去奔丧，不给父母抔一把土。这样不尽孝道，在哪里都说不过去，特别是在台湾特别尊重孔孟之道，怎么可以这样不近人情呢？闹得国民党中央天天开会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他们觉得如果不让我去，会让天下人都认为不尽人情。中国人特别讲孝道，父母死了，要披麻戴孝，如果父母死了，置之不理，那这个人简直为人所不耻，被认为大逆不道。所以台湾当局压力很大，僵持了很长时间。虽然当时我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但不久后却打开了一个窗口。台湾当局规定，人去世后，亲人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可以去奔丧。”

可以说，那次“梁文茜奔丧”，充分展示了这位才女律师的机智和有理有节，那时，她已经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当时台湾方面不允许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台。面对全世界的记者，梁文茜这样回答：“我是政协委员，又不是权力机关，我们是参政议政、多党合作的一个机构，不是军事、政府要员。台湾方面说，你这样能说话，一定是共产党的宣传部长！我说这是我家庭私事，你不要往政治上扯。我说谁没有父母呀，国民党没有父母呀？共产党也有父母，这是人的自然规律。不论什么政治观点，不能把爸爸扔着不管。”真是妙语连珠！

对于父亲的死 梁文茜至今仍眼神中饱含着沉重。

“1987年11月3日是台湾红十字会第一次允许登记以后 经过申请 可以到大陆探亲。我那个继母 11月2日就去登记了。所以我父亲情绪很激动 多年没有到大陆来了。那是老年人呀 悲哀不行 高兴也不行呀 有人哈哈大笑后 就脑溢血。我父亲特别容易激动 他已经有40多年没有回大陆了 想到要回本乡本土看看 一激动就心肌梗塞了 很快就去世了 享年86岁。”

梁文茜特别动感情地说：“父亲死前正在用英文写一部巨著《中国文学史》，一句话没写完 笔搁在稿纸上 就去世了！”

梁文茜说她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 林语堂是他的老师。他一生教书 一生笔耕。国民党几次请他出来做官 都被他拒绝了。梁实秋说：“我是一个穷文人 我念我的书 写我的书 官场的事 不是我所长。”

梁实秋于1949年离开北京 到上海、广州 辗转到台北 以后较长时间在台北师范学院执教英文。他编的《英汉辞典》共有8万多条目 联合国就用这个辞典。台湾方面把这个辞典分解开来 大大小小成了几十种版本。

我说：“现在北京的书店也已经上柜梁老编的英汉辞典。”

梁文茜略带自豪地说：“是的。最近梁实秋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在书店也有卖的。莎士比亚的40个剧本由一个人手笔译完的 全世界只有梁实秋一人。”

我知道 这是梁实秋创造的奇迹。不少文学家为此“壮志未酬身先死” 朱生豪就是一个。而梁实秋从北京内务部

街故居到台北师范学院,二十年如一日,终于完成了一人全译莎士比亚剧作的大志。

梁文茜说,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很投入,很吃苦,甚至到写“血书”的地步。

“这是他的志趣所在。他这个人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很能吃苦的。他整天坐着翻译莎士比亚剧作,血脉不流通,后来就得了痔疮,得痔疮后就流血。那时,我母亲给他做了一个棉垫,垫着凳子,他一天坐七八个小时,非常投入的时候,就不知道痔疮流血了,到站起来时,椅垫上一大片血,他才发现:‘哎哟!怎么搞的,这么多血!’”梁实秋不仅全译莎士比亚剧作,而且对英国文学有深入的研究,著有《英国文学史》、《英国文学选》等六大本。他写的《英国文学史》与众不同,凡是英国每一个历史阶段的代表作,都译成中文。梁文茜很理解父亲的匠心所在:“这样你学习英国文学史时,参照这些代表作,可加深对那个阶段文学发展的了解。”梁文茜还透露了梁实秋的另一心愿:他本来想用中文把《英国文学史》写出来,用英文把《中国文学史》写出来,他认为中华民族有光辉灿烂的文化,文学发展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但是外国人限于语言的障碍,不了解中华民族这些宝贵的文学遗产。宣传中华民族这些文学遗产,首先应当突破语言这一关,但认得中国字的人实际并不多。这样,他就想用英文来写《中国文学史》,向世界来宣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他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但非常遗憾的是,他没有写完,写了一半就去世了。如果他多活二三年的话,就完成这部巨著了。他曾经对我说:“我要赶快写,因为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怕写不完。”

如今,梁实秋的文学作品和翻译作品,正拥有越来越多的

读者。一部《雅舍小品》已印了 300 多版,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遍布亚非拉美各洲。在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凡是有华文书店的地方,就有梁实秋著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人的一个骄傲。

梁文茜说:“这主要是我父亲一生献给了文学和教育,治学态度非常严谨,常为了一个字反复推敲,误人子弟之事绝不。另一方面,他阅历丰富,学外文的,出国留学后,能集中西文化之所长,所以,他的作品比较亲切,比较幽默,知识面广,在当代文学史上有其特色。”

梁文茜说现在海峡两岸对梁实秋的作品和研究都十分重视。梁实秋早年写作之处重庆北碚的雅舍、青岛的故居都已由当地文物部门公布为保护单位。华龄出版社正准备出版《梁实秋全集》。台北专设了梁实秋文学基金会,每年颁奖一次。新竹的清华大学设了一个梁实秋纪念室,陈列了梁实秋的遗物、手稿等。最近,台北《中国时报》的一位记者打电话给梁文茜,打算在梁实秋的弟子协助下,写一部《梁实秋传》。

不管天涯海角,不管阴晴圆缺,有情者终成眷属,有志者终有大成。大凡历史和文学都这样延续,梁实秋是一个证明。

近访王西彦

5月的上海,时晴时雨。与王西彦夫人周雯通电话后,我一直在想,她说的86岁的王老身体状况还不错,就是起不来床。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细雨中,我找到了王西彦的住处,是复兴路沿街一座不算太新的高层楼房的四楼。我叩门而进后,周雯陪我到王西彦的书房,宽大的书桌、摆满各类文学著作的书橱,还有一对已经褪色的日本式沙发,组成了作家的简洁而大方的写作环境。我不敢相信的是,在沙发前面,放着一张可升降的病床,上面躺着的是一生不畏艰难、勇于跋涉、不屈不挠、始终前行的王西彦。

他很快认出了我,清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周雯说,1998年11月7日,王老在阳台上散步,由于他几十年的糖尿病引起的神经麻痹,突然手扶不住门把,全身瘫软,摔倒在地。王老说:“当时,我叫喊起来,叫周雯,这个手不行了。”周雯连忙赶过去已经晚了。救护车将王老送进了华东医院。经查,虽没有骨折,却已经伤了筋骨。

在华东医院住了36天后,王西彦“吵”着要出院,不肯再住在那舒适的高干病房里,他要回家,回到一天也不愿离开的书房。周雯说:“这老头就是倔,他有自己的逻辑。现在回想

起来 ,对他失策的是没有很好控制血糖。1978 年、1981 年他曾两次重访福建 ,重游阔别 30 多年的旧地。有一次我没有同行。结果 ,他回来兴奋地对人说 :“这次到福建 ,周雯没有去。我吃了好多香蕉 ,好多龙眼。回来一查血糖 ,以为要升高 ,结果不但没有升高 ,而且下降了 ,证明血糖不必控制。”

周雯说着 ,充满深情地拍拍王老的下巴 ,又疼又爱地说 :“你呀 !你呀 !就是这样一个人。”王西彦眼神闪过了诗意 ,幽默地对我说 :“我有一个老朋友 ,巴金 ,长年住在华东医院 ,身体也谈不上很好嘛 !”

与王西彦认识 ,是由于 16 年前 ,我在家乡义乌文化馆主编《枣林》文艺小报。我们在头版头条开辟了一个介绍家乡籍名人业绩的专栏 ,相继介绍了吴晗、陈望道、冯雪峰、何家槐、尹庚、吴劳等人。在上海的名人 ,关注的热点 ,集中于著名作家王西彦和俞天白。1983 年新年 ,杭间和龚应恬 ,这两位后来都成为北京有一定声望的业余作者 ,专程赶到上海采访了王西彦。在那次采访中 ,王西彦发表了著名的“作家的根在故乡”的谈话。王西彦认为 :“作家的根在他的家乡 ,在他对家乡、祖国和人民的爱。”“对一个作家来说 ,对一个人来说 ,没有根就像不是站在自己的大地上 ,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 ,是不能忘记家乡的。”

上海著名作家艾以 ,写了《关于王西彦的笔名》一文 ,专门寄给《枣林》。读了这篇文章 ,我了解了王西彦不少鲜为人知的创作之事 :王西彦原名王余庆 ,1914 年农历十月初六出生于义乌青塘下。他在念小学时 ,见课本结尾处都有一小结 :“西谚曰” ,觉得很有意思 ,又觉得“谚”字笔画太多 ,就征得教师认可后 ,自取了“西彦”学名。1931 年 7 月 15 日 ,他 17 岁

时 第一篇处女作《残梦》,在南京《橄榄月刊》发表时,就署名“王西彦”。

从此,我经常与王西彦联系,他也经常寄书寄资料给我。1989年4月22日至28日,王西彦夫妇,还有阿章、俞天白、圣野、鲁兵等人组成的上海市作家访问团,应金华市文化局的邀请,专程到金华考察、访问。在金华火车站出口处一见面,王西彦就用那浓浓义乌腔的普通话对我说:“哦!方竟成,编《枣林》的,《枣林》很有泥土味,我每期都看!”我说:“作家的根在故乡,这声音一直围绕在我耳边。”王西彦立即认真地说:“是的,作家的根在故乡。那个在温哥华岛上询问我的英国女诗人听我这样说,她哭了,她是英格兰人,童年即随父亲在印度度过,现在却是加拿大移民。她说她的根在哪里呢?”我说,只要心中拥有对故乡、人民的挚爱,到哪里都有根,像你就有三条根!她听了,破涕而笑了。”我们也都随王西彦深刻而幽默的叙述而笑了。

如今王西彦静静地躺在床上,他望着不动的天花板,望着流动着云絮的蔚蓝天空。他还在想家乡义乌那秦朝乌鸦孝子的故事,想着他苦难的母亲和三个苦难的姐姐、艰辛的乡间小路、苦难的旧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暮色中走向郊县劳动营的苦难历程,想着他在“第二故乡”福建永安、南平、福州度过的烽火岁月和创办《现代文艺》时夜半印刷机的运转声,想着他已经写出的《车站旁边的人家》、《古屋》、《神的失落》、《苦命人》、《春回地暖》、《在漫长的路上》、《穿过废墟》、《折翅鸟》、《在沼池里》等大量中篇小说,还有他正在构思,正在口述,由周雯等人作记录的回忆录及其他。

王西彦的眼神中充满了一种真诚与炽热,转过头来,望着我说:“作家的根,当然在故乡。不在故乡,在哪里?关键是如何去认识,如何去做,如何以作品去表达。我很想再到故乡看看,到义乌、到金华、到永康,也包括我抗战时期就热爱、熟悉的滨海城市福州。那乌山、鼓楼附近的旧米仓、龙山巷和于山的小白塔都很难忘。”王老接着说:“我10岁时就到永康去朝拜胡公,1988年,家乡义乌改县建市时回乡,应邀又去了方岩,写了一篇《永存的恩泽》,发表在《人民文学》。金华的几个洞,小时候去过,后来也去过,很想再去。现在金华一带发展很快,又十分重视文化文物,历史文化名城,我听到这些消息,很感到欣慰!”

在周雯的鼓动下,王老破例从薄被下伸出手,与我紧紧握手。周雯说,儿子王晓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非常关心父亲的身体,为了防止他长期卧床生褥疮,我们花了3000多元,买了一张水床,今天就要送来。我又一次为之感动,我想留下来,为安装200多公斤重的水床而尽一份绵力,但周雯坚决地谢绝了。

丁玲、艾青话义乌

1985年初,已经意识到“知识经济”的义乌县委正副书记,还有人大主任、女副县长,穿着一色的棉军大衣,风尘仆仆赶到北京寻找乡音和知音。曾打算在当时北京显赫的西苑宾馆顶层旋转餐厅开一个知识分子恳谈会,终因我去“侦察”后,觉得花费太高,而改在宣武门饭店。

定于1月13日上午开会。头天晚上,县委书记谢高华(刚刚奉调地委农工部部长)和我同住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小标准间。老谢自己写发言稿。我一觉醒来,见台灯还亮着,他正在一字一句推敲,我一看表已经凌晨2时,蹑手蹑脚往卫生间里走,想不到老谢响响甩过一句话:“明天,你一定要请到丁玲和艾青!”

那天很冷,但阳光也很明媚。北京的冬天就这样很有一种大冷大风大阳光的光明磊落感。林乎加、廖沫沙、高戈、吕志先、吴敏达、金若年等先后来。艾青也在高瑛陪同下,早早到了,坐着,一声不吭,如一尊沉稳的礁石。严济慈也说了利用一个活动的间隙到会。只是丁玲迟迟未到,我打电话过去,是陈明接的,说刚好是休息日,作协的小车正在联系。我马上说,我们来车接。

丁玲是在全场人的期待中,缓缓步入会场的。所有的目

光集中在丁玲那饱经岁月的脸上。不少人交头接耳,艾青露出了致意的笑容。一个女服务员轻轻说,是写《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丁玲!对于这一切,丁玲看得很淡,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看见,从从容容地朝前走去。

一个写小说、一个写诗,中国文坛最有代表的两大文人都不是义乌人,却来出席义乌人关于振兴经济的会,自然成为会议的热点。请他(她)们也讲讲“义乌话”嘛,廖沫沙风趣地说。我立刻将这提议转告县领导,很快采纳了。我征求了陈明和高瑛的意见,也得到了肯定。

不愧是大起大落中走来的“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很快宽容了我们这一“突然袭击”,她一边从容地站起声明说:“我要站着讲”,一边以她特有的湘味很浓又很清亮的声音说道:“也不事先打个招呼,叫人为难。要讲经济,我是个文盲,什么也不懂的,我自己这两个钱,袋里从来没装过,艾青也跟我差不多。我们不知道市场里怎么样,买个菜怎么样,是这种人呵。但是,将了军了,我就得讲两句。现在好像有一点懂了,也不是我去学的,而是听到一些信息。我这个信息还是从我的农村来的,从我的北大荒来的,从我的河北乡下来的。过去我们一块劳动的人,现在来看我时,常捎来自家的鸡蛋、鹅蛋、鸭蛋和油。那时,我再穷,也比他们好一点。有个什么事,他们就向我借个10来块钱。现在他们都成万元户了。这就使我懂一点了。过去我们最看不起的,是做买卖的人——商人,我们都喜欢工农兵,商人就不太去沾边。看人也是,太会精打细算的人,我们就觉得没意思。现在好像世界翻了一个个了,我们的确是落后了……听到这么多信息真是高兴,觉得党的政策实在很好,使人变了。那时,我去农村,看到

农民懒洋洋的 ,八九点钟 ,太阳老高了 ,还在街上聊天。就是上地了 ,动了两下手 ,大家就回来了。现在他们不是这样了 ,现在他们拼命地干活 ,因为劳动果实归自己了 ,干活就有积极性了。”

这时 ,丁玲以她闪烁着宽厚慈祥的目光 ,与近百位在北京各行各业的义乌人的目光相碰。也许她回想起了 1983 年秋天 ,与唐弢、楼适夷、骆宾基、杜鹏程、黄源、汪静之等 ,一起到义乌寻踪冯雪峰之路的情景。她曾戴了一顶草帽 ,在义乌赤岸神坛村雪峰故居与雪峰亲属合影。那次 ,她就住在义乌县二招不带卫生间的简朴房间 ,与义乌人度过了难忘的日子。丁玲露出了一种亲切的笑容 ,说 :“那么我们同你们义乌有什么关系呢 ?说老实话 ,你们讲义乌话 ,我一句也听不懂。陈望道是我最早的老师 ,1922 年 ,我在上海上学 ,他是我老师 ,他讲课时义乌话太多了 ,我们不太听得懂他的话。冯雪峰虽讲普通话 ,但是义乌腔还是很浓。前年 ,我们上了一趟义乌 ,觉得那个地方很可爱。”

听着丁玲这样“话说”义乌和义乌人 ,在场的义乌人很自豪。

艾青一开口 ,就不再像沉默的礁石 ,而是幽默、风趣横生 :“我只讲一点 ,人家说我是冒充义乌人。我这个冒充 ,已有很多年了。我的母亲是义乌人 ,母亲的母亲也是义乌人。这样我同义乌有很深的关系。我住的地方离义乌只有 20 公里路 ,离金华有 35 公里路。我实际上是金华人 ,但是同义乌只隔一条小溪 ,这样人家就把我当义乌人。现在我可以声明 ,我是金华人。但是很多外国人翻译我的作品时 ,都说我是义乌人 ,这简直没有办法了。去年 ,我到了珠江三角洲和深圳。我每到

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县 就想到金华太落后了。最近 金华开了一个振兴金华的会 我也参加了。我说金华的一边是温州 一边是宁波。现在有个新鲜事 金华与温州、宁波的铁路要修了 这当然是好事 但是金华夹在两个开放城市的中间。金华没有能源 凡是繁华的地方都有矿产 金华没有什么矿产。金华靠什么呢？靠一条江水 靠李清照写过的八咏楼 这样萧条得很。他们虽然送我火腿 但是我觉得吃了也寒酸得很 不忍心吃。今天 有人说这是从义乌来的（指桌上的瓜子） 瓜子到处都有 我总有所不忍 它特别难看 什么道理呢？一我咬不动 二是其貌不扬。”

艾青一本正经地做了一个诗人才会做的动作 一边翻看瓜子 一边说：“看有没有义乌两个字？没有！”在场的人已笑成一片 艾青自己不笑 仍然一本正经地说：“林乎加同志说 义乌有那么多小商贩 我都大吃一惊 北京遍地都是义乌人。我知道青田人在法国、意大利做皮革生意很在行。义乌人 根据它的小商贩这么发达 组织起来大有可为。义乌人要像珠江三角洲那样 靠华侨来支持 没门。严济慈没有钱 陈望道没有钱 冯雪峰也没有钱。”大家都被艾青这坦诚、亲切、充满智慧和风趣的言语打动了 爆发出来自内心的掌声 许多人眼角涌出泪光。丁玲和廖沫沙也不例外。

艾青接着说：“今天 开这个开拓的会。义乌人嘛 第一条是开放的县 它有一个女县长 这个女县长是开放的 我昨天问她 义乌有几个万元户。她说有几千个万元户。这几千个万元户可不简单 我家还没有成为万元户。你领导几千个万元户不简单。……我赞成林乎加同志的话 把商人组织起来 把青田人组织起来 把义乌人也组织起来 源源不断的财

富就会产生。”

丁玲和艾青的“话义乌”结束后，会场的气氛非常热烈，并且在热烈中又多了一份抑止不住的阵阵笑声，那是心灵震颤后的释放。

那夜星光灿烂。来北京的义乌人和在北京的义乌人难以入眠。谢高华破例喝了酒，我也是。直到 13 年后的今天，耳边仍回荡着丁玲、艾青的殷殷祝愿……



我推崇的社会学家 和文物专家

费孝通近况

五月中旬的北京,天高气爽。太阳不算太猛烈。

在北京医院见到的费孝通教授,不像一个90岁的老人,更不像我想象中的各种各样的病态。他坐在沙发上,笑容可掬地正与全国人大办公厅来探望他的两位同志交谈,不时有幽默而机智的妙语,还回忆起在镇江一个岛上“勇敢”地品尝河豚的往事。

病房收拾得一尘不染,没有多余的摆设。用玻璃隔开的里间,有一张小床,是给秘书或警卫休息用的。此刻,有几位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认真地抄写着文稿。一问,才知道费孝通在当天午休时间,又一次审看了他将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的《我们要对时代变化作出积极有效的反映》演讲稿,他亲自写了1400字,现在他的几个博士生正在誊抄费老的手稿。

我感到惊叹。不久前,费老由于起床过猛,一支小血管发生血栓。费老幽默地说:“当时右手夹菜时老是不准。”仅仅过了10多天,费老身体迅速康复,右手握笔,一个中午就写出了一篇文章!

从1936年费孝通经历了一次常人难以忍受的死亡威胁和丧亲之痛后,利用在吴江开弦弓村养伤期间,深入乡村作社

会调查,写成调查报告《江村经济》。而后该报告作为他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得到他的导师、著名社会学家马林诺斯基的赞许,使他一举成名。1943年,他曾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邀请的中国十教授之一,在美国作了一年时间的文化交流。半个多世纪以来,费老始终敏锐观察着中国的变化与发展,以作品反映时代的行进与节奏。尤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对农村经济、乡镇企业、小城镇发展、苏南模式、温州市场、西部开发等重大战略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真知灼见。耀邦同志曾在他的《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上作出充分肯定的批语。1990年,江总书记还邀请他到中南海面商国事。1998年,费老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后,他幽默地说,“可以‘告老还乡’了,回归知识分子队伍了。”但他仍以一名执著的北大教授身份,一方面以自己的智慧与品行薪火相传,带着博士生,另一方面继续他的专业研究,一年时间下基层166天,并且日写2000字,创下了新的记录!

虽然在小恙之中,费老的视角仍关注着20世纪与中国、东西方文化交融、科技日新月异与变迁、推陈出新与未来。他这次本来要亲自到上海出席学术研讨会,演讲他的论文,医生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不赞成他的“热情”。他在感到遗憾的同时,用笔流淌出他的思想的光束和真诚的思考:

“我这一生从20世纪开始,已经经历了90年风雨,在我晚年还能有幸踏入21世纪,因此我经历了人类文化社会的两次重大变动,第一次是19世纪从欧洲开始用蒸汽机推动机械生产的时期,第二次是近20多年来在美国开始的用电子计算机促成的信息时代。

“我早就明白,我们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不能不随着这个

历史性的变迁而变动,我们必须推陈出新才能适应我们的客观世界。在这个变迁中,许多传统的生活和思想不能不逐步改变,如果完全按照传统办法是无法取得生活上的满足的。

“我无法从零开始重新采取完全新的文化和社会方式来进行新的生活,因为我们还是生活在承传下来的文化和社会之中,这个矛盾也许是在我这一代人最深刻的经验。

“我认为只有从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发生的新旧矛盾出发认识自己研究的问题,并采取科学的态度和观察客观的历史发展的事实去理解现象,总结客观的演变,看出新旧交替的规律,才能作出我们生活前进的策略。”

费老的以上观点,基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充分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基础上,掌握新老交替的科学规律,创造代表先进文化的新生活,这无疑是在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的深刻观察后提出的具有前瞻性的观点,令人回味无穷。

走近张鹤镛

晚上到京城方庄,到处是耸立的灯火点点的高层楼房。颇有学者风度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顾问张鹤镛一再表示“不必前来,这里的楼房在晚上很难辨别,我去看你”,但我还是比较顺利地,在几串红灯笼装点的温暖气氛中,找到他住的楼房。

1998年9月下旬,张鹤镛曾率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考察团到金华考察。市里让我负责具体接待工作。我到杭州东茂宾馆接他是上午10点左右,一进屋只见屋里很静,半掩着窗帘,他正在读书。他热情地请我喝茶,一开口已点出金华侍王府、双龙洞、火腿、斗牛四大特色。原来他已在杭州作过调查,访问了几位曾在金华、义乌担任过领导的老同志。可见他是一个有心人。

以后,他十分关注金华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工作,他们的考察团还向中办、国办报送了7000字的考察报告。今年“两会”期间,他特意给我寄来了“两会”首日封。我因公务出差北京,想着与他一叙。

他刚刚参加完政协全会,似乎还沉浸在那参政议政的热烈气氛中,刚刚入座就告诉我,他今年的提案是围绕可持续发展战略,就生态环境这个与战争、禁毒、旧城改造一起被列为

21 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四大问题的重大课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张鹤镛是我国著名的医药专家,曾长期在中国最大的药厂——华北制药厂从事科研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发明了一种对鱼鳞癌具有特效的抗癌新药,这就是至今仍作为抗鱼鳞癌首选药的平阳霉素。张鹤镛的夫人是一家大药厂的总工程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们可谓是夫妇医药专家。

张鹤镛出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后改名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后,致力于我国医药事业的高品位发展。他认为制药企业不仅要生产优质药品,还要文明生产,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1996年,他以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委员会委员和国家医药管理局领导的多重身份,到松花江流域,从上游到下游,一边考察医药企业,一边考察生态环境。他在哈尔滨药厂发表了著名的“前门与后门”的谈话。当时,哈尔滨的水质很差,是五级水,不能饮用,而哈尔滨药厂80%的制药废水,不经治理就排放到松花江。张鹤镛了解到这个情况,向药厂领导提出尖锐批评:你们前门运送青霉素,治病救人,后门却排放有害百姓的污水,这样怎么行?必须彻底改变。回北京后,张鹤镛根据这一典型事例,有感而发,写了一篇署名短评,发表在《中国医药报》头版,要求全国药厂引以为戒。

谈话中,张鹤镛对我说:“现在北京病谱发生了很大变化,肺癌发病率相当高,原因是空气污染,汽车尾气污染太重了。东北著名的镜泊湖原来水质很好,清澈见底,现在沿途一路受污染,到下游时水已是五级了。渤海湾的污染更是触目惊心,营口部分地带污水排放比较严重,已到了鱼虾死亡、海草枯萎的地步。而渤海的内海与外海交流很困难,净化一

次要花费 40 年时间。”

药品、生态环境 ,还有文物保护是张鹤镛热诚关心的问题。他现在担任着中国医药质量协会会长、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非处方药协会常务副会长等多个全国性协会的领导职务 ,几乎每天都到局里去办公。他也是一个读书人 ,在他的客厅有一个别致的书橱 ,里面不仅有医药方面的书籍 ,也有社科、文史的著作。他对我说 :“ 大自然与文化传统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都是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内容。生态决定人的生命 ,文化则塑造人的灵魂 ,为子孙后代着想都应全力加以保护。所以 ,我也经常呼吁重视优秀传统文化。”

后来 ,他话锋一转说 :“ 我到过全国许多城市 ,但像金华这样虽然只是走马看花但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地方却不多。金华确实很有文化特色 ,衷心希望金华能被批准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夜访吴良镛

1999年7月25日的《北京日报》在头版发表消息,昨天北京市是百年未遇的高温,达42.2!就在这种高温酷暑之日,傍晚时分,两院院士、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吴良镛刚刚从京丰宾馆开完中国工程院院士会回到清华,在等我的电话。而我在晚上8点30分左右才给他去电话,他抱歉地说,原来明天安排见一次面,但现在情况有变化,上午,临时安排一个研究生论文答辩,下午,秦皇岛市要专程送城市总体规划来征求意见。星期一开始,又要到京西宾馆接着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会。他沉吟了片刻,宽厚地说:要么,你就马上过来吧!

在一片绿阴地中,灯盏忽闪忽现。铁栏杆的门是虚掩的,我估计前面就是吴良镛住的二层小楼,沿着石子路走了约10多米,敲敲玻璃门,果然是!

吴良镛的会客厅和书房连在一起,大多是各种各样中文和外文的建筑书和杂志,古朴的写字台、名人的字画和一只海龟的标本,构成了高雅的书卷气氛。满头鹤发、一脸祥和的吴良镛被几叠书刊包围着,忙着接国际长途电话。

一、世界建筑师大会与《北京宪章》

1999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建协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科学委员会主席、《世纪之交展望建筑学的未来》主题报告的报告人、国际建协《北京宪章》起草人吴良镛,成为世界建筑业和建筑师关注的焦点,这是中国和中国建筑师的光荣。吴良镛说:我国是1955年参加了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建筑师大会,正式加入国际建协的。那次,包括翻译我们去了8人。梁思成先生生病,由我的老师杨延宝先生带队。很有幸,在那次大会期间,与国际建协第一任主席阿伯克隆比教授等在河边漫步、交谈,受益匪浅。后来,在第六届大会上,俄罗斯代表提出要增补波兰的一位著名建筑师为国际建协副主席,而另外一些国家提出增补杨延宝先生为副主席,结果在差额选举中,杨延宝当选。吴良镛回忆起这些往事,充满了自豪感。

在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引导21世纪初叶建筑发展的趋势、将对人类未来生存环境发挥重大影响的《北京宪章》获得五大洲数千名建筑师一致通过。这是中国建筑界对世界建筑业的划时代贡献,是中国建筑业继杨延宝先生当选世界建协副主席之后又一次殊荣。吴良镛在其中是不可取代的历史性角色。

“这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吴良镛说,“这次的宪章,从国际建协主席莎拉女士到与会各国建筑师都表示满意。”如同他在北京旧城改建中菊儿胡同的设计获联合国“世界人居奖”一样,吴良镛以平静心态接受这一巨大的荣誉。

他对自己在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中所做的一切,也看得很淡。他说:“《北京宪章》与我提出的‘广义建筑学’有内在联系,但又有发展。可以说是以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和一个发展中国家角度来看待21世纪建筑学的发展的。但我个人的作用不要渲染。《北京宪章》中有关‘认识时代’、‘面临挑战’、‘从传统建筑学走向广义建筑学’的精神值得弘扬。世界建筑师不能置奔腾汹涌的社会、文化变化潮流不顾,需要激情、力量和勇气,直面现实,自觉思考21世纪建筑学的趋势。面临环境破坏、混乱的城市化、技术双刃剑、建筑魂的失落等问题,要认识到‘地球只有一个’,要追求可持续发展战略。《北京宪章》总的精神强调‘在观察和处理事物要整体思维,综合集成’;建筑师要追求人本、质量、能力和创造……在有限的地球资源条件下建立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公平的人居环境’。”

吴良镛谦虚地说:“今天我们这一切只是一个探索,一个开始。”是的,20世纪大规模技术和艺术革新,造就了丰富的建筑设计作品。二战之后,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建筑师的功勋卓著。但是,人类对自然以及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已经危及其自身的生存,“建设性破坏”为建设者始料不及。50年代,为拆除北京城墙与众多牌坊,梁思成曾孤军奋战了一番,但最终北京这座世界级文化名城还是被“建设性破坏”了。21世纪中,建筑师必须对这一切有一个辩证的考察,共同保护与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与工作环境。这是每一个人类建筑师的社会责任,也是吴良镛这位中国建筑师杰出代表人物的强烈心愿。

二、20 世纪中国建筑代表作：菊儿胡同建筑群

20 世纪值得考察总结、去伪存真的事物、建筑、思潮、观念太多了。菊儿胡同的改造成功，走出了一条在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城市进行旧城改造，改善人居条件的北京旧城改造之路。行家们认为：吴良镛设计的建筑群采用了错落有致的楼房式四合院布局，兼有“交流性”与“秘密性”，是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住宅设计。1999 年，加拿大出版了吴良镛的《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的英文版。英国出版的《世界建筑史》第 20 版上，也刊登了菊儿胡同建筑的照片和文字，并把它作为当代中国建筑的一种方式 and 理论来的探索。吴良镛说：“今天又收到英国的《建筑评论》来信，这个刊物也要刊登有关菊儿胡同的文章。”

吴良镛认为：“对菊儿胡同的设计，当初是想如何在北京这样一个文化名城中，认识它的规整、以及院落式构成中的特有方式，像一件衣服一样，要认识它是怎样织的，然后进行改造。过去对此不太重视，以为旧的、传统的胡同就是落后、封建的，认为四合院是大家庭的产物，现在是三口之家的小家庭，不需要四合院了。”

“1978 年，我提出了两条意见：第一，旧城改造，不能从头搞起，不能大拆大建，而要用织补法，有机更新，像细胞一样重新长起来。第二，在北京严谨的城市布局中，在四合院体系、院落体系中，尝试保留能保留的部分，拆掉该拆掉的部分，像割除烂肉，长出新肉那样。旧城改造，不完全是造新的房子，要设计与原来文化传统有内在联系的建筑。事实证明菊儿胡

同基于这样理论的设计,是得到肯定的探索。”吴良镛一再强调:“这主要在理论上是一种探索,也可以看成是一条思路,不同地方、不同城市、不同文化背景,可以有不同的探索,菊儿胡同是途径之一。”

三、中国画的意境常常体现在建筑与景观之中

几十年来,吴良镛还对艺术孜孜追求,在他心目中,建筑中有艺术,艺术是另一种形式的建筑。宿白先生的弟子、首都博物馆馆长荣大为在我拜访吴良镛前一天曾告诉我,观看吴先生的绘画是与欣赏他的建筑精品一样的幸事。他的绘画多次在美国、德国等地展出,很有艺术特点和想象力。

吴良镛说:“绘画对建筑,与其说直接的作用和反映,不如说间接的影响与触动。一个建筑师的修养应该是多方面的,像国外名城的历史环境、名画作品,有时会触发建筑师的灵感,文学作品、音乐作品、绘画作品,也都有这样的启发。这种感受与灵感积累起来,通过内在的修养,就有一种深层的结合,产生新的形象,从而影响建筑师的创作。虽然不能说哪一幅画对哪一座建筑有什么直接作用、直接启发,但中国画的意境常常可以体现在中国城市建筑与景观之中,像有些风景区的建筑,需要诗情画意,借景造境。这一点与外国建筑有区别,外国建筑更注重形体与外在风格,与雕塑有内在联系,这是两种建筑文化背景的区别。”

吴良镛不无遗憾地指指放着书籍、信件、作画纸墨的写字台说:“现在实在太忙,已作不上画了!”我知道,他于8月份又要出国演讲,而他还是那个脾气,不要秘书代笔,任何论文、

演讲稿,都是亲自动手撰写。就在与我交谈之间,指针已爬过10点,但他已连续接了几个国际长途电话,谈建筑、谈演讲,甚至商榷论文的措词。

四、有关杭州与金华

吴良镛对杭州西湖美丽的风光有深深的印象,但对西湖四周前些年建了些高层建筑感到深深的遗憾。

吴良镛还披露了他与杭州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1956年至1957年,吴良镛等三名建筑师做了一个杭州华侨饭店的设计方案参加竞赛,结果得了一等奖,排名第一。不料最后采用的不是他们这个方案,而是将当地人做的一个方案进行了修改。据说浙江省委负责同志知道这件事后,曾批评有关部门,既然是竞赛,得了第一名,为什么不采用他们的方案?

吴良镛从杭州谈及金华。他非常关心像金华这样因火腿出名而经济处于发展势头之中的中小城市的城市化进程。由他主持,与齐康、陶松龄、谢文蕙、阮仪三等17位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著名教授、学者联合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八五”重点项目研究报告《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于1999年4月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吴良镛在序言中指出:“我们对地区建筑学的关心不仅在于它的文化传统的延续,更在于创造人工与自然环境相融合,城与乡相融合,园林、建筑、城市相融合的整体环境,在混沌中创造整体的协调美。”我认为,这是吴良镛的“广义建筑学”思想和《北京宪章》的精神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反映。这对金华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化进程,也具有深刻的

启示。

吴良镛说：“这几年来，金华重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旧城整体风貌保护的各项工作还应深入。‘如果是历史遗迹，当然要加以保护并谨慎地加以发展，如上海的城隍庙、南京的夫子庙就是佳例，如果是新规划地区，则更要精心塑造，形成新的饶有意趣的中心。’还可以开展如老照片、老地图的征集，通过这些图片、地图生动地反映金华的历史和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样的史料是必不可少的。”

五、对 2002 年柏林大会的承诺

夜已经很深，吴良镛还没有倦意，但我怕打扰他太久，打算告辞。他又告诉我一个令中国建筑师兴奋的消息，2002 年 7 月 22 日至 25 日在柏林召开的第二十一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已决定请吴良镛作一个《北京之路》的报告，以对《北京宪章》再研究、再发展、再明确。目前，已专门组成一个精悍的小组，开始调研。

我想起了李瑞环同志在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开幕式致词中的一段话：“一切负责任，有良知的人们，都应该行动起来，献身于认识自然、保护自然的崇高事业。”吴良镛正是这种有责任、有良知、有追求，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民族传统和地域特色”的中国建筑师的杰出代表。他将获得更突出更有个性的成功，这是中国建筑师们共同的目标，也是中国建筑师们对 21 世纪的承诺！

忘记生日的罗哲文

任性的春雨，片刻之间淹没了刚才还鲜丽如火的太阳，打在婺江上下，使古城金华笼罩在一片迷蒙之中。

罗哲文、郑孝燮、谢凝高、鲍世行等文物专家，又起了一个早，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这几天在金华看到的文物旅游点：侍王府、八咏楼、天宁寺、法隆寺经幢，还有必须躺在船上穿过夹缝进入的双龙洞和冰壶洞。细心的小车司机小金发现了罗老的一个“反常”：罗老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今天则是一只脚穿皮鞋，一只脚穿布鞋！

我们赶紧为罗老买了一双旅游鞋，给罗老时，罗老仍是那么随和地笑笑，连连说没关系，动员了好久，他才笑嘻嘻穿上。

原来，罗老一行这次先于4月上旬到浙南评审楠溪江国家级风景名胜等，在温岭方山考察文物古迹时，冒雨登高不慎摔了一跤，扭伤了脚，虽有红花油擦抹，但次日左脚还是肿了起来，皮鞋穿不进。

对于罗老，这算不了什么。曾有人说过，在当代中国，对文物古迹，尤其是古建筑怀有一种忘我的痴情的，当首推年逾古稀的罗哲文。作为主持长城维修的专家，从战国长城到明长城，“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40多年来，罗老几乎爬遍了所有长城。他以一种执著、毅力和忘我，解决了有关长城长

度等悬案。罗老勾画了一个巨大的时空范围,突破了万里长城之说,认定长城总长度达十万里。近年来,罗老曾八上西藏,为历史上最大一次布达拉宫的全面维修倾注了大量心血。至今罗老一谈起此事,仍沉浸在为这一世界文化遗产恢复原貌付出智慧和劳动的兴奋之中。罗老说,80年代初因布达拉宫失火,检查时发现了不少文物险情。向国家文物局、国务院报告后,立项拨款5000万元,花了10年时间,全面修复了白宫、红宫。罗老担任技术终审,几乎每年飞往拉萨。他风趣地说:“有的身强力壮的人,一到世界屋脊,就不行了,要输氧,躺下了。我却还行,从不用吸氧。”确实,了解罗老的人都知道,罗老一看见文物古迹,眼睛里就有一种热诚的光芒,什么高原反应、伤口发痛,都不在话下。

果然,罗老肯定地说:“下点雨,脚有点肿,没关系,去看汤溪城隍庙!”

罗老说,是文物之父梁思成先生教给了他一颗文物之心。1940年,中学毕业的罗哲文,参加了营造学社的招考,是唯一的被录取者。从此他师从梁思成,孜孜不倦地在文物保护领域辛勤耕耘。

说到梁思成与罗哲文的师生之缘,还有一段“世界之谜”。1944年,太平洋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美军对日本本土进行了狂轰滥炸。奇怪的是日本著名古都奈良和京都只遭受了有限的袭击,两座古都的文物古迹竟完好无损,未受罹难。日本人知道是中国知名人士从中周旋,使美军“手下留情”。多年来,日本人一直在寻找这古都恩人,终于在80年代,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宿白向日本记者揭开这一谜底:正是梁思成和罗哲文的功劳!

那时才 20 来岁的罗哲文 ,在重庆帮助梁思成整理敌占区保护点的名单。正是盛夏季节 ,对文化遗产怀有特殊感情的梁思成向美军提出了在战争中保护文物的建议 ,得到了采纳。于是 ,梁思成把一个绝密任务交给了罗哲文。让他在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一间房子里 ,在许多份地图上作记号。常常是梁思成先用铅笔打一个勾 ,罗哲文再正式标上记号。天气很热 ,梁先生请罗哲文吃冰激凌 ,罗老说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了冰激凌。”有时 ,梁先生让罗哲文一个人在房间里干 ,到了吃饭时间 ,打电话叫他 ,罗老说 :“这是我第一次使用电话 !”当时 ,罗哲文并不知道他的这一勾一画 ,决定了这场战争中世界文化遗产的命运。

真相是逐渐披露的。宿白的答记者问 ,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1984 年 3 月 ,在日本召开历史名城会议 ,中国、美国、埃及、意大利和日本的著名专家出席。罗哲文和郑孝燮等中国代表参加。罗哲文被誉为古都的恩人受到了极其隆重的欢迎。日本的报刊、电视台电台掀起了一个“罗哲文热”。

如今 ,回忆起这辉煌的一幕 ,罗老却非常平静 ,连连说 ,梁先生才是值得日本人纪念的。梁先生随父亲梁启超在日本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他对日本文物有特殊感情。梁启超带他去日本名寺 ,捐了款便可在瓦片上留名 ,结果梁思成捐了不少款 ,写了二三十片瓦片。罗老说 ,梁先生一再教导 ,文物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 ,保护文物是全人类的责任。罗老说 ,正是梁先生的言行给了他启迪和力量 ,使他对文物有了特殊感情。

为了文物 ,他可以废寝忘食。

为了古建筑 ,他会忘我地追踪。

为了数清卢沟桥上形态各异的大小石雕狮子,他连续两个月磨在卢沟桥。

为了撰写他的论著《中国古塔》、《中国古桥》,他把无数古塔、古桥摄入了他的镜头。

为了实地考察处在危墙上的侍王府壁画,他执意要省里同志改变日程,从兰溪折向金华;而为了看清卢宅的周围环境,他冒着40度酷暑,甩开大步,把陪同人员都甩在身后,沿着卢宅护宅河走了一遍。

为了历史文化名城和重点文保单位的审定,一向宽厚随和的罗老会据理力争,直到面红耳赤。用著名文物专家胡继高的话说,正是“寸土不让”的罗老,值得敬佩!

然而,罗老对自己的事却是那么漫不经心。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长、历史文化名城评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我国屈指可数的文物权威,却一点架子也没有。这次从永嘉到金华,连连在电话中要求:“不要派小车,来一辆普通的面包车就可以了。”4月15日,由于仙居年轻的县长一定要罗老一行车过仙居,一览仙境,不得不择道从仙居过永康到金华。结果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行驶,路石撞裂了面包车的油管,傍晚时分车抛锚在缙云壶镇。罗老一点也不感觉突然,仿佛在他的生命旅途中,抛锚、车阻、路险、意外,都是微不足道的。在壶镇一间用花布作“门隔”的简单餐厅里,罗老笑嘻嘻地举起大碗啤酒,向郑孝燮、谢凝高、鲍世行等敬酒,说:“能在壶镇碰杯,是有缘!”

酒过言多,不离文物。罗老谈起了吴晗与文物,梁思成、林徽因设计国徽和编写《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之事,说

起了他一生游历名山大川 ,拍摄各类照片已达 10 万余张的“秘闻”。他压根儿忘记了夜深路艰、车难修复、如何到金华等 ,还是笑嘻嘻地说 :“天亮到金华也没关系 ,随遇而安!”

于是到了 4 月 17 日傍晚 ,罗老从乡下考察文物建筑刚刚回来 ,金华市委书记仇保兴、市长毛光烈到住处拜访他。一见面 ,他就赞扬金华市领导抓历史文化名城工作的远见卓识。他认为名城重在历史文化底蕴、环境风貌和原汁原味的古迹 ,大致可分“硬与软”两个方面。所谓“硬” ,就是体型方面 ,看得见摸得着的文物古迹、建筑 ;而“软”则是指戏剧、诗词书画、工艺、民俗 ,包括金华的火腿等等。罗老说 ,这就是日本人说的“有形文化财”和“无形文化财”。创建历史文化名城 ,实际上就是将文物保护扩大到保护整个文化遗产 ,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对提高城市品味、改善人类生存环境、体现历史文化个性、促进经济发展都很有作用。罗老认为金华市委主要领导能从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战略角度来认识创建历史文化名城的问题 ,是一个高层次的认识。

罗老滔滔不绝地纵论名城保护和文物古迹 ,幽默地说 :“当然 ,成为历史文化名城也要付出代价 ,‘有失才有得’!”罗老说承德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市里下了大决心 ,拆了万余平方的建筑 ,武当山也是这样 ,山上风貌有了很大改观。罗老认为金华已有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 ,但还要趁势而上 ,在打开八咏楼南面视角、恢复府城隍庙原貌、改善明月楼环境等方面大做文章。

罗老就这样忘情地讲述着 ,为了金华为了文化遗产为了中国再添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 ,他又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而这一天正是他第 71 个生日 !他把这值得庆贺的日子忘记

了,是中国经济文化研究院的小毛在为罗老买飞机票时,通过身份证上的号码,发现了这一秘密。小毛一提醒,罗老才恍然大悟!罗老等下榻的金华宾馆顿时洋溢着一种难忘的温馨。宾馆经理亲自派人订做了生日蛋糕,窗外是曾被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妙笔渲染成“水通南国三千里”的婺江,窗内,罗老吹灭了生日蜡烛,金华市委仇书记代表金华人表达了美好的祝愿。

一切都那么和谐。

一切都那么真诚和深远。

文物名医胡继高

大约 50 年前 ,一个操扬州口音 ,在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念书的十五六岁的小伙子 ,在西子湖畔的浙江博物馆流连忘返。他面对巨大的鲸鱼标本惊叹不已 ,对展出的各类文物兴致盎然。

50 年后 ,他以全国政协委员、国内著名文物专家的身份 ,来到浙江金华太平天国侍王府 ,要对珍贵的太平天国壁画揭取保护。少年的梦 ,早已成为现实。他就是文物名医胡继高 ,通过他的妙手回春 ,不知多少国宝起死回生 ,重放光彩。尤其是抢救世界文化瑰宝唐代敦煌壁画 ,使他一举成名……

1962 年 ,年轻的胡继高从波兰哥白尼大学文博考古专业学成回国。几年没回扬州了 ,多想回到故乡的怀抱 ,与亲人相聚。但这时 ,他听到了敦煌壁画病害严重的消息。1957 年 ,我国曾邀请捷克大壁画保护专家格拉尔教授前来保护 ,格拉尔提出 :“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搞 ,10 个洞窟的壁画 ,要花 10 年时间。要带 60 个专家来搞 ,每个专家都要享受最高级的待遇 ,要盖小洋楼 ,每月要飞回欧洲一次。你们可以当助手 ,搬运东西。所有的化学保护配方都保密……”架子不小 ,条件不低。格拉尔在画面爬起、脱落的有病壁画中 ,选了两块做试验 ,用注射器注入保护液 ,结果效果不好 ,保护层像一串串黄

眼泪一样,不久就爬起、脱落了。壁画病害在加剧,外国大专家也解决不了。许多领导十分焦急。胡继高一回国就主动请战,没回扬州,先跟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著名美术家刘开渠、著名考古学家宿白、著名文学理论家王朝闻等一起,来到了敦煌。

大面积的壁画发生了病害,使胡继高心焦心痛。龟裂、破损、爬起、酥解,使飞天等美好的形象支离破碎。甚至旅游者参观时,窟门一开,空气对流,都会刮下一些壁画碎片。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壁画下面扫出一堆壁画“脱皮”。再不抢救,这些珍贵的壁画就完了!强烈的责任感,使胡继高一心投入了艰苦的工作之中。吃的是冷馒头,睡的是普通房间,他毫不在乎。经过几十次的试验,终于寻找到了保护壁画的最好配方,不仅解决了龟裂等病害,而且发明了用中国丝绸代替外国人用纱布操作的传统,使龟裂的壁画画面上经过修补后不留任何痕迹。经过20多年的考验,国内一流专家云集敦煌,对胡继高主持的壁画保护项目进行验收。一位挑剔的专家从梯子上爬到高处,用长电筒照射高处壁画,结果使他心服口服,竟没有发现任何重新爬起的画面,一切符合设计要求!1978年在全国首届科学大会上,胡继高的敦煌壁画保护项目荣获一等奖。

其实,敦煌壁画保护,仅仅是胡继高抢救国家级文物的一个例子。70年代轰动国内外的马王堆汉墓漆器保护、孙子兵法竹简保护等,都是胡继高的杰作。漆器与竹简历来一出土,就收缩、变质,甚至酥解成粉末。胡继高不但解决了脱水难题,而且上了化学保护层使之恢复原状,宛如最初模样的汉代漆器。这些文物出国展览后,引起国外观众极大的震动,胡继

高修整文物的高超技艺名扬五洲。

胡继高说：“我搞的保护项目，都着眼于未来，讲究可逆性。因为科学技术一日千里，到以后有更好的保护配方时，现在的保护层用几个小时就可以取下来，这叫可逆性。”一席话，道出了这位文物名医的眼光与胸怀。

如蛋壳薄的侍王府壁画，有几幅处于危墙上，必须把它揭取下来，待重新砌造墙壁后再安放上去，这简直像天方夜谭的故事，但这是胡继高制定的保护方案中的关键内容。胡继高和他刚从布达拉宫壁画保护现场来的助手们对此充满信心。

1995年元旦过后第二天，近20年用4根杉木如拐杖般拄着的侍王府西院二进凸肚墙，终于被一层层拆去，而墙内的壁画奇迹般地跟墙分离，像蒙着纱布的“病人”，与木框等一起被整体抬了下来！危墙壁画揭取成功了。8个月后，经过背部加固的壁画，在新墙上复位，一切按胡继高的构想进行！

胡继高说，他正在写一部文物保护专著《文物医案》，一案写一例，总共要写几十例，包括敦煌壁画、马王堆漆器、孙子兵法竹简等等抢救性保护的实例。胡继高笑着说，侍王府壁画是建筑壁画，有别于洞窟壁画、古墓壁画和岩刻壁画等，其保护有特色，也要作为一个典型个案，写进《文物医案》之中。

谢凝高与泰山的 11 根烟囡

被誉为“当代徐霞客”的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谢凝高，一眼看去像一个热情奔放的俄罗斯学者：秃顶、前额宽阔、说话兴奋时爱打一个手势。一问，才知道是浙江温岭人。

谢凝高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投身在名山秀水之中。没有去过的地方，他要去；去过的地方，他也要去，去发现新的境界。“文化大革命”中，他压根儿不管这派那派，人家在发疯似地贴大字报，他挤上了西去的列车，来到了天山脚下，登上了世界屋脊，饱览了天山风光和布达拉宫雄姿，还与藏民交上了朋友。这次他与罗哲文、郑孝燮、鲍世行等一流专家一起到他家乡参加雁荡山风景名胜的评审，他恰似鸟回丛林，起早贪黑，登高望远，如一个不知疲倦的登山运动员。仙居县的县长拉他到号称有多处世界之最佳的仙居名胜区考察，他一到就去看环境看风景，一早就去看古塔和寺庙，到下午 2 点还未吃中饭。

谢凝高对生态环境和“文态环境”的保护，有一种神圣感和责任感。他认为要对子孙后代负责，不能搞短期行为。1993 年由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他的 20 万字的专著《中国的泰山》，体现了这种境界。他在书中尽赞泰山之雄奇俊美，

但也在结尾对泰山顶上商业气氛太浓,影响泰山整体自然景观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出版社开始建议他改掉这一部分,他说,不实事求是的地方可以改,个别句子措词可以改,但观点不能改,客观反映不能改。他说,这是他对泰山23次深入调查研究,跋涉泰山周围250平方公里环境后得出的结论,泰山要保持其举世无双的风貌,任何“建设性破坏”,或者“商业性破坏”都是不能容许的。最后,出版社尊重他的意见,如期出版了这一专著。

说到保护泰山风貌,谢教授非常推崇周恩来总理的“三保泰山”。一次是水利部门打算在泰山文物古迹旁边建宿舍,群众写信给总理,总理作了批示,制止了这一“建设性破坏”。又一次是在备战备荒的时代,军方要在高处修雷达站,要修一条公路上山,勘察、图纸等准备就绪,周总理的批示又到了:泰山是要登上去的!另外一次是农业学大寨造梯田,要把泰山著名的“擂鼓石”崩掉,总理闻讯后要杨得志派得力干部去处理。

谢凝高说,群众传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要围师泰山,炸掉泰山的“四旧”,也是总理起了“保护神”的作用。总理要有关部门转告红卫兵小将,毛主席就要接见,要他们赶紧上北京。于是,把红卫兵调虎离山了。

谢凝高认为,泰山,首先是风景的泰山,文化遗产的泰山,保持其自然的、本来的风貌,更体现出它的神圣的、历史的、文化的价值。泰山的建筑、设施、商业、环境,必须首先考虑到这一基本点。80年代中期,在审批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际,全国政协组织专家到泰山考察,谢凝高经过周密调查后,认为泰山的环境还需进一步保护,使之与这一世界性名胜

相协调。他指出现在山顶上有 11 根烟囱 ,大煞风景。他的意见反映到中央 ,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通过中央秘书局向泰山党政部门作了意见反馈。当地政府专门派人作了调查 ,并实地数了烟囱 ,向谢教授说 :“感谢提出了这个意见 ,我们已不烧煤了 ,改烧液化气。但我们数了烟囱是 13 根 ,不是 11 根。”谢凝高立即幽默地说 :“是 13 根 ,但有 2 根是不冒烟的 !”原来谢凝高的调查比他们还细致 ,一时在场的人都笑了。

谢凝高就是以这样的专注、执著和一丝不苟 ,从事着城市与环境学的研究 ,从事着文物古迹、文化遗产、风景名胜的保护与利用 ,也许这正是这位“当代徐霞客”胜过古代徐霞客之处。在中国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 ,有的世界级文化遗产的总体规划就出自他之手。而他的论文《泰山不能再修索道了》在《文汇报》发表后 ,引起强烈反响 ,荣获特等奖。

美在自然弦外音

——郑孝燮的城市建筑美学观

满头鹤发的国家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评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建设部高级顾问郑孝燮，一生心血倾注于城市的规划与建筑的设计。每次出差，胸前总挂着几只相机，一捕捉到具有中国文化美感的传统建筑环境与构件，就举起相机，连连按下快门。有一次，他和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同在浙南楠溪江考察。我受市领导委托，专程驱车去接他们来金华，路程400多公里，要走山路，还要在仙居一停，时间很紧。不料，他们上车后，忽然发现一个古戏台，执意要下车。我去找人打开了锁着的门，郑老一看到那戏台的明代特征，双眼立即闪烁着异样的光泽，屏住气从不同角度拍个不停。结果那天耽误了到金华用餐的时间，在一个小镇的小饭店里，用塑料布一隔，成了这几个大专家用餐的“包间”，郑孝燮品着乡土菜，饮着乡酒，吟着唐诗，他说：这晚餐吃得很美！

这次在京遇郑老，是请他为浙江建设园林城市的目标作指导。郑老兴致勃勃地赶来，第一个发言：“城市建设要力戒盲目地大拆大建，搞一些生硬模仿的建筑。钱学森先生提出的山水城市和两院院士周干峙提出的园林城市的思路，我都赞成。城市的美，要抓住一个物境，一个情境，产生意境，诗情

画意 托物寄境 ,达到动人以情。我主张不但要讲究生态环境 ,还要讲究文态环境。不仅对单个文物进行保护 ,还要保护整个城市的风貌、传统街区等。要达到生态、文态的和谐。”

人们以为建筑师与钢筋水泥砖瓦打交道 ,比较“硬性” ,其实 ,听了郑老这一番话 ,才知道将城市置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中去筹划 ,去追求与自然的和谐 ,才是美之根源。郑老又认为 ,1999年在苏州召开的中国欧盟历史城市市长国际会议提出的“21世纪城市发展一个基本因素 ,是历史地区的保护和延续的观点”是有远见的。一个城市建筑之美 ,如同编剧 ,要有现代剧 ,即现代化的建筑与设施 ;要有新编历史剧 ,即具有本乡本土特色的街区与环境 ,还要有古装戏 ,即原汁原味保护、保留的古建筑古街区 ,当然内部也要进行现代化的改造。总之 ,在城市化进程中 ,千万不能丢掉自身的文化和特色。

郑老强调城市与水的文化关系。

我国的四大历史名楼全是依水而居 ,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等都是临水而建。有水有楼就有文化 ,李清照登临金华八咏楼 ,南望婺江 ,心潮澎湃 ,吟出了千古绝唱 :“千古风流八咏楼 ,留与江山后人愁。水通南国之千里 ,气压江城十四州。”

现在情况有了变化 ,但城市与水的文化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这实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 ,建筑文化与自然之美的和谐问题。成都临江有望江楼公园 ,主题是竹子 ,掩映着古建筑。有水有竹有古建 ,就很美。松花江畔的吉林市 ,整个规划也充分考虑到利用美丽的松花江。上海外滩也处理得很好 ,保持了沿江万国建筑博览的特色 ,体现了江滨绿化、小景、步行带的都市气息 ,又展示了黄浦江本身和彼岸的美。

郑老认为,城市规划和建筑是一件大事,事关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和人居环境。要请一些书画家、文人,换一个角度,从自然、文化、历史的角度,给我们规划师、建筑师提提意见,给我们的大手笔、大策划、大规划提提意见,给我们的街景设计、建筑风格、色彩,也给我们的绿色,如种香樟树还是种玉兰等问题提提意见。白居易和苏东坡都是文人,但他们修筑的西湖白堤、苏堤,都千古传颂。不要怕文人挑剔,他们往往能提出工程技术人员想不到的思路,给我们启迪,丰富我们的构想。艺术讲究一个情字,城市建筑也要有精神、有情趣,文学讲究含蓄,城市建筑也要摒弃仅仅是表面上的美观,要有意味深长的底蕴。

郑老去过世界许多地方,最令他流连的是那些历史文化名城。1997年2、3月间,他在加拿大名城魁北克考察,被那里的雪景、文物、古战场、石堡迷住了,一连写了7首短诗吟之。《历史名城》一诗中有“墙台门阙成文物,无字史书更寄情”的佳句。同年4月9日,他应邀到美国迈阿密大学建筑系发表题为“中国苏州私家古典园林”的演讲,获得很大成功,用他自己的诗表达,真是“园林山水讲西东”。他《在迈阿密大学建筑系讲课——苏州古园林(二首)》中有这样的警句:“叠山理水如诗画,美在自然弦外音。”

虽然郑老在诗中讲的是苏州古园林,讲的是中国园林城市的目标,其实也表达了郑老的城市建筑美学思想。

阮仪三的挚爱

由于航班延误,6月15日抵达上海时,已经临近子夜,《美化生活》总编辑胡晓申还在机场门口等我。一阵感动之后,竟以“明天争取一起见见阮仪三教授”作为回报。胡总编辑一愣,又一笑,马上说:“阮教授,久慕了!保护周庄的学问家!”

次日中午,我们三位未曾谋面,又对优秀历史文化共同有着挚爱的人,在阮教授所在的同济大学聚会。

阮仪三给人以干练、精明、认真,但又平易近人的印象。他的客厅中挂着一幅建筑大师陈从周赠予的墨宝,他一边吟诵着其中的题词,一边说陈从周是他尊敬的老师。胡总编辑乐了,他的父亲正好是陈从周的好友,并且是陈毅当上海市长时的商业局局长,也是一位出名的文人。所以,这会面一开始就沉浸在一种信任和友谊之中。

“北冯南阮”,是人们对致力于保护名城、保护文物的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冯骥才和上海同济大学博导、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成员阮仪三的尊称。的确,阮仪三和冯骥才一样,是不少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街区、代表性古建筑得以在建设性破坏和破坏性建设之中幸免于难的恩人。

20年前,全国名城保护的意识尚未形成气候。山西不少

县城都在大拆大建,后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原来也打算拆建。面临搬迁、拆迁之风,阮仪三针锋相对:要按规划刀下留情,不能乱拆!回想起这些,阮仪三风趣地说:第一次“救”平遥成功,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的一些学生当时在山西省有关职能部门当领导。阮仪三对平遥做了总体保护规划。

阮仪三说 20 世纪 90 年代末,山西又邀请一个负有盛名的学院,由教授和八名博士组成专家组,为平遥做了一个旅游规划,共有 40 万字,厚厚两大本,图纸和文字都非常漂亮。我看了规划后,觉得没有抓住平遥古城的特色,没有从保护总体风貌着眼。我提出了十点不同意见。开始那八名博士不服气,与我辩论。我就拉他们上街,面对一幢一幢古建筑给他们讲这是什么年代建的、具有什么特色、什么价值、怎样保护。虽然他们专长不是古城古建筑保护,毕竟他们是高学历的,知识丰厚,听我一讲解,就明白过来说:“阮老师,我们服了!”阮仪三笑着说,这可称作“二救平遥”!

20 世纪 80 年代,江南一带乡镇发展很快,是一种粗放式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无秩无序、乱拆乱建,大批古建筑、古街古巷,甚至像《林家铺子》中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古店铺街都被拆毁。阮仪三痛心疾首四处呼吁,并且一边帮助搞规划,一边语重心长地引导县乡领导:老城不要破坏,新城照样发展、照样现代化。不要简单地拆掉旧建筑,搞成没有特色的新建筑。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的文脉,不能割断、不能简单地“破旧立新”。

“有的听我的,有的不听我的,大部分不听。江浙这一带原来有 100 多个风景如画的水乡镇,而现在只剩下江苏的周

庄、同里、甬直和浙江的南浔、乌镇、西塘六个基本保持原本特色的水乡古镇。目前正在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阮仪三快人快语地说。

不争一时一地的得失,不计一楼一街的战略保护,使六个古镇经济上去了、旅游上去了、老百姓收入上去了,旅游带动了第三产业,旅游带来了知名度、财富和现代化。周庄原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水镇,陈逸飞一幅周庄古镇图,由邓小平赠送给美国政要,顿时引来了世界关注的目光。人们接踵而来,不看不知道,看了才叫好!中国的水乡,文化无穷、魅力无穷!而最初坚决建议保护周庄的人,正是离周庄不远的苏州人阮仪三。

阮仪三有些激动地说:“2000年,我带着这六个水乡古镇的镇长到欧洲考察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后来,联合国专家团又回访,考察了这六个水乡古镇,镇长们说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在法国一个以酒兴市的古城镇,我们考察了罗马式的酒窖、石头拱门等等,酒瓶上的灰尘,大约有一寸厚,原封未动,法国人说:‘这可有千年的历史了,也是遗产!’”

“到10月份,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的专家来考察这六个古镇,我们没用那种作报告、大讲座的一般形式,而是采用了一镇一个镇点评的形式,既充分肯定优势和特色,又毫不留情地提出整改措施,前后一共进行了12天,有力地推进了申报,推进了古镇的保护。今年周庄投入4000万,用于水环境的改善、污水处理,那里的居民居住质量已显著提高,每家每户用抽水马桶。”

阮仪三认为现在有些乡镇领导已有一定的城市建设特色

方面、美学方面的认识,也认识到过去乱拆乱建的肤浅,想改变一下。“问题是如果你得了肺病,一定要请肺科的大夫;你得了心脏病,一定要请心脏病科的大夫。专家,往往只专一门。到处搞宋城、唐城,到处建假古董,与乱拆乱建一样是不行的。城市规划、古镇保护,是一件慎重又科学的事,要把准脉搏,找准病因,不要找牙科医生看心脏病,切忌用胡改胡建来取代乱拆乱建。”阮仪三风趣地说。

离上海不远的一个古镇,就出现过这样的教训:在政府机关旁建了一座瓷砖贴面的高层建筑,又把大街改造得大红大绿,古镇丢掉了特色。他们找到了阮教授,问:有救吗?阮回答:有救!首先下决心将政府旁的高层拆掉!

阮仪三的专著《江南古镇》,于1999年获得国家图书提名奖,同时获得装饰美术设计奖。他还以此为主要内容,制作成一个图片展,到国外展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去年在德国展览时,引起了德国观众对中国保护文化遗产认识的转变。西方不少人一直认为中国是大革文化的命,“文化大革命”砸烂了文物,中国已没有多少历史文化遗产了!看了阮教授的图片展,才知道中国已发生深刻变化,保护了那么美丽的水乡古镇、历史文化古城,中国太令人向往了!

阮仪三越说越兴奋,他说,周庄的保护,也不是一点没有不协调音。凡是不利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凡是不利于老百姓长远利益的,我阮仪三就要出来讲话,就要尽我的力量呼吁!

我深深为之打动了。对文物的挚爱,对优秀历史文化的挚爱,其实是一种对祖国的挚爱,是一种对人民久远利益的挚爱,不是那种追求急功近利的肤浅政绩!他也动情地说:“我

了解金华。1959年,金华的总体规划就是我搞的,那时,城中有一条江穿过,很漂亮!”

这一刻,我发现他的眼光中闪烁着真诚的期望和热情

……

在此文写成之际,我与建设部著名建筑师、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通电话时,郑老说:1982年,我与当时建设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总工俞立康到平遥。那时我第一次到平遥,目的是作古建、古街、文物调查,看到了许多古建、庙宇,包括一些雕塑,好得很呀!我了解到同济大学的阮仪三做了一个总体保护规划。我非常赞赏阮仪三的远见,这是后来平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关键之举。

园林城市 21 世纪老百姓的享受

——园林专家王秉洛、鲍世行杭州、东阳行

一、在仇市长的办公室

车过钱江大桥，暮色中的杭州处于如浪如波的绿色之中。

中国动物园协会副会长、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秘书长王秉洛和建设部中国城科会常务副秘书长、《城市发展研究》常务副主编鲍世行，与同行的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何绿萍，还有洛阳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王铎，仍沉浸在刚刚与杭州市市长仇保兴纵论杭州城市发展的兴奋之中。他们一下飞机，就被仇市长请到办公室，为杭州这个在 1993 年被第一批公布为国家级园林城市的名城，勾画更绿更美的形象而促膝长谈。

专家们太挚爱杭州这“东方日内瓦”了，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街一巷、一楼一房、一色一彩、一石一井、一草一木，都牵动着他们的心。每每有一些不协调的建筑拔地而起或者有价值的文物古建被“建设性破坏”，他们都会痛心疾首。

杭州从 1999 年夏天以来，不断传来令专家们击节赞叹的

消息：“12345，有事找政府”的市长电话；保护清河坊古街文物建筑，已拆除了几十万平方米的违章建筑等等。当这些专家与仇市长面对面交谈时，他们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信任与理解。生长于杭州的鲍世行尤其感受到这一点。他万万没有想到，仇市长一听说他编了一部25万字的《钱学森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立即表示：钱老充满智慧的系统论，可以广泛运用到其他学科。该书中的科学方法论和山水城市理论的学术价值等，都是他故乡杭州的骄傲。

仇市长兴致勃勃地说，首先杭州是一个九曲古城，在漫长的城市发展进程中，其格局、建筑、园林，与钱江、西湖的自然地貌相融合，很有特色，杭州的自然风貌和历史古迹要尽力保护。年轻的上海，近日新造了一条“上海老街”，成为该市旅游的亮点。作为古都的杭州，本身的真古董更不能去毁。最近，一条清河坊古街被保护下来，其中包括梁宅、胡雪岩故居。

其次，对杭州城的水脉要进行深度整治疏浚。在仇市长办公室墙上，挂着三幅画，一幅世界地图、一幅中国地图，还有一幅是杭州市主要河道示意图，可见，杭州之水在这位市长心中的地位。不久前，他在抗洪第一线还抢救了一座1500年历史的古桥。这座被水冲“伤”的桥，当地曾打算拆除，但被仇市长力保下来。

仇市长认为，要使杭州的水清澈，就要使活水在城内河道迂回。在与钱塘江沟通的基础上，在运河上设置能控制太湖来的洪水的闸门。就如钱伟长指出的：一个水系对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十分重要。专家们听了这一席话，相互对视了一下，又将完全赞许的目光投向仇市长。

不仅如此，还要将历年的违章建筑一一拆除。仇市长说，

违章不除,规划难行。已经拆了40万平方米的违章建筑,总计要达到110万平方米。很巧,我在去机场接专家的途中,曾在杭州湖滨一家快餐厅用餐,邻座几个市民在谈论拆违。一位书画社的女职工对同事说:“我是坚决拥护的,骑车来上班,以前交通一堵,就可能迟到。堵车的一个原因就是违章建筑多。”无独有偶,一位杭州出租车司机告诉我,“杭州是一个以美取胜的城市,苏东坡写过那么美的诗,违章建筑像美人脸上的伤疤,除掉当然是好事!市政府在拆违中考虑比较周到,如考虑到了原来在违章建筑中做生意的下岗工人,我姐姐就是一例,她在不违章的营业房里找到了合算的经营场地。”

我想到了北京市新任市长刘琪的观点,他认为拆违就是投资环境。看来,北京市的市长和杭州市的市长,心有灵犀一点通。

仇市长说,每年要将15条街道的电线全部埋到地下,花3年时间基本做到除无轨电车电缆之外的电力、电信、广播电视、燃气管等管线入地,全城基本上改变电线杆林立和蛛网般线缆造成视觉污染以及限制行道树成长的状况。还要对11个入城口进行整治,同时扩展公共绿化,每年扩绿要达100万平方米。对钱江两岸城市景观特别重视,这次向国内外一流设计单位公开招标,引起轰动,美国、日本等国的不少著名专家也参加招标竞争。

仇市长强调,呼和浩特城市规划控制区有2000多平方公里,而杭州市区现在负荷过重、人口过密,要开辟新区。

这一切使专家们着迷、激动,忘记了时间,原定30分钟,却超出了三四倍时间,专家们此起彼伏,不断向仇市长提出问题和建议。

二、在东阳

也许杨守春是最后一次以中共东阳市委书记的身份,接待高层次的专家团了,因为他以突出的政绩又一次升调,8月13日就要以金华市政府副市长的名义,去上海出席一个金华双龙景区新开发仙瀑洞的新闻发布会。

东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卢子跃在次日告诉我,杨书记从晚上6点30分开始,一直在东阳宾馆等着专家们一行。

东阳历来被称为歌山画水,一条东阳江穿行南北,串起多少诗情画意。沿江不少处仍保持着纯天然状。距市区23公里处,蓄成了拥有2亿多立方一级水的横锦水库,水库颇有千岛湖韵味,有绿岛有故事,有鸥鸟与白鱼齐飞之景观。东阳是我国著名的建筑之乡、木雕之乡和教育之乡,严济慈、蔡希陶、邵飘萍、金佛庄等现当代名流出生在这一片热土上。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卢宅的肃雍堂主轴前后九进,纵深320米,列中国民居之最。卢宅的护宅河,在环河占地500余亩的建筑群中逶迤几里,穿行在古桥绿阴之中。新近又考证出卢宅是姜太公后裔雅溪卢氏聚居之地。还有金华火腿中的极品雪舫蒋腿,出产在东阳南马的上蒋村。

与新疆奎田、山东章丘等县级市有战略眼光的决策者一样,杨守春和一班子人,面对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与文化遗产生,作出了争创国家级园林城市的决策,市长汤勇挂帅实施。

东阳人民首先总结本世纪对古建保护的教训。1989年7月23日,洪水如裹着黄毛的狮子,疯狂地推着山石,呼啸而

下,市区边的公路也不能幸免。卢宅古建筑中积水1米多深,至今那条最高水位线仍常常警示着后人。

李瑞环同志在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开幕词上指出:“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带来了严重影响,使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日益恶化,已经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李瑞环呼吁,“要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东阳人正是在一种令人忧虑、一种猛然惊醒中寻求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点,寻求到了青山、秀水、绿树、艳花的园林城市的目标。

身材魁梧的杨守春向王秉洛、鲍世行一行伸出热情欢迎之手的时候,已临近8月12日零时。专家们毫无倦意,很快直奔主题,询问起东阳的山水与文物……

次日,在酷日之下,专家们穿行在东阳的歌山画水之中,果然卢宅的护宅河、巧夺天工的东阳木雕厂精品、如园林般的南方涂料厂、横店集团花巨资从乡下搬迁来原汁原味的两幢古建筑、穿城而过的东阳江保持着自然状态,还有东阳人的绿地系统规划,以及正在实施的让东阳市区更绿更美工程,获得专家们一致肯定。王秉洛想到了新疆奎田,何绿萍想到了山东章丘,这就将东阳提到了全国先进行列城市的水准来审视了。

专家们谈到了日本京都1000座寺庙有1000个园林,讲到了南京中山陵形成森林式绿化后,这个火炉城市竟比周围城市在夏日气温低1℃,讲到了杭州、云南,也讲到了钱学森有关山水城市的精辟论断:“我们在过去要办的事很多、很急,来不及认真思考,搞了许多傻事,如把首都钢铁公司、北京石化公司的工厂建在北京上风位地区,今后我们要有所改善……”

王秉洛说：要将一个城市当作一个大园林来规划、保护和建设，要有匠心，改善而不是恶化生态环境。我赞成日本东京农业大学还田教授的观点，园林城市要有五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城市污染源要消除，污染状态要得到根治，至少明显缓解，水、大气、土壤标准在二级以下；第二，达到相当数量、质量的绿地，构成完整的绿地系统；第三，热岛效应得到缓解或者消除。现在天安门广场与颐和园的气温相差7℃，万寿山与圆明园的气温相差1℃，东阳市区与南山比怎样？一定有差异、有热岛效应；第四，城市气流组织达到良性循环，小气候得到改善；第五，物种多样性趋于丰富，而不是趋于匮乏。鸟回来了，鸟多了，鸟声与早霞齐飞，这样就好。

王铎说：1933年通过的《雅典宪章》中有一句名言：每个城市都有发展旅游的机遇。一个优秀的园林城市，要从生态、空间美学、文化效应上达到和谐，这也是一个优秀旅游城市意义的涵盖。东阳有灿烂的历史文化、丰富的自然遗产，有条件成为园林城市。英国人从1962年开始，不准搞高层建筑，他们认为是一种骄傲。美国新墨西哥首府，所有建筑都没有超过四层，外墙都是印第安人的黄土墙。他们强调的是，要有地方特色。东阳卢宅建筑群中，有细如头发丝一样精美绝伦的木雕，能否办成一个世界性的建筑博物馆？还有对东阳江、南山等的开发，要非常慎重对待，对其一草一木，要像保护文物一样对待。

何绿萍（义乌老乡，她的父亲何战百是义乌市早期参加革命的勇士，曾与艾青同去巴黎留学，在反右斗争中错划成右派，历经磨难，最后昭雪。她的丈夫是北京大学教授，为“北大方正”的创始人。她怀着对故乡义乌的浓浓乡情，开讲前

先用未改的乡音讲了一句“我是义乌人”，博得在坐距义乌仅18公里、历来义乌东阳不分的东阳人的热烈共鸣)说：建设园林城市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宏伟的目标，东阳人很有战略的气魄。在城市化汹涌澎湃的大潮中，以园林城市来推进城市的发展，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我很赞成。建筑园林城市涉及生态、经济、文化、社会学、建筑学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不像卫生城市可以一个突击，也不像一幢建筑物拆除或者建设，它是一个复杂的生态与植物、自然与人文、色彩与水质、时间与过程。我愿以一个家乡人名义，与家乡人一起，不断配合、不断琢磨、不断探索。

满头鹤发的鲍世行虽只讲了不到3分钟，但非常精辟：钱学森曾对我讲，过去的中国山水文化，是宣传一种出世思想的，而我们建设中国山水城市，是入世的，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我的理解，我们建设山水城市、园林城市，都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这是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如钱老所说：颐和园和避暑山庄，过去都是为帝王服务的，19世纪统治阶层住的地方，难道21世纪的老百姓还不能享受吗？

是的，钱老的这一反问式的勉励，正成为杭州、东阳，以及中国许多大小城市建设园林城市的奋斗目标！

京城近访张文彬

2001年仲夏的夕阳中,在北京一条不宽的胡同里,一对平和朴素的中年夫妇一边亲切地交谈,一边散步,并不引人注意。其实,这是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和他的夫人。

张文彬就是这样一位平和朴素的人。在他的书房里,挂着一幅自己写的书法,写道“胸怀坦荡泰然处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既飘逸又平和。他夫人作的几幅花鸟画,同样轻灵静秀,与他的书法正好形成同一品格与境界。

不久前,他搬进了文化部新楼宽敞的办公室,他欢迎我到他办公室交谈。

那天,我一进屋看见他正与局里一位干部商议一个批件。他说:“搬到这里,办公条件比以前好了,也气派了,但没有以前方便。在北大老红楼里办公的日子,常常使我回想……”

文物考古,是他在北大学的专业。在河南工作时,他曾从事高校教学科研工作,并担任过省社科院副院长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等多种领导职务。20世纪90年代中期,调北京工作,出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党组书记。他笑着说:“这次的工作变动与我大学时学的专业联系起来,算是专业对口,划了一个圆圈。”

近年来,我国文物保护和博物馆事业发展很快。一个适

应经济发展与国际保护水准接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新任务,已经摆在各级政府领导的面前。张文彬说:“人民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三峡文物的抢救与保护、圆明园三件流失海外国宝的回归、定海古城的自发保护、应县古塔维修方案公开征集等等,都牵动着千千万万老百姓关注的目光。这是令人十分感动的,也是非常可喜的。”

张文彬接着说:“办博物馆也是这样。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都很有积极性。现在,不但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博物馆,还有不少行业馆和专业馆,如水利的、交通的、邮电的、家具的、纺织的、服饰的、陶瓷的等等。财政部也要在杭州办一个中国财政博物馆,中国已经有几千来的理财史,举办财政博物馆,在世界上也是首创。不仅如此,有的国有企业也在办博物馆,像有知名度的保利艺术博物馆。民办博物馆的热情也空前高涨,个人办博物馆方兴未艾。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办的中国紫檀博物馆,就很有特色。”

国家文物局,作为全国文物管理的最高行政机关,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这种新形势。从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将每一份历史文化遗产、每一件文物保护好,利用好。同时,要打破原有的框框,改革创新,寻求突破,发展我国文博事业。

张文彬强调说:“新世纪的文物保护工作,要有新的起色。第一,要加大法制建设力度,依法管理。目前,依法保护,很重要的工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充实、修改、完善。这是一部重要法律,要适应发展了的新形势,增添

内容。现在已充分征求了各方面意见,写出了修改稿。报经国务院审查通过后,力争在年内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第二,要加大规划力度,从宏观上布局全国的博物馆发展。最近,我们正与有关部门一起,制定‘十五’期间全国重点博物馆的布局规划。要加强和改善博物馆的管理。办博物馆要引导,要扶持,也要规范。要出台一部全国性的《博物馆管理条例》,使之走向科学的、规范化管理的轨道。第三,要加大遗址保护力度,增加这方面的国家投入。如大家关注的三峡文物保护、西部开发中的文物保护、三星堆文化遗址等,还有浙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都是重中之重。第四,要加大文物的科技保护力度,文物科技保护是新世纪的一个重大课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文物保护最有力的保证。许多文物,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出土后一接触空气,没有高科技手段,就保护不了,像漆木器、竹简、木牍、壁画、青铜器、丝织品等等都是这样。因此,要使文物青春长驻,必须依靠科技!”

据我了解,以张文彬为首的国家文物局领导班子,对文物科技保护非常重视,采取了加大投入、专题研究、加强国际交流和人才培养等有力措施。我们的话题,不约而同地转到了在文物科技保护上独树一帜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胡继高身上。张文彬说:50年代,国家专门送胡继高、王丹华同志等到波兰学习文物科技保护,学习国外壁画保护等技术。当时波兰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他们学成回国后,在壁画保护、丝织品科技保护上,作出了许多贡献。敦煌壁画的“妙手回春”、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脱水保护、金华侍王府危墙壁画揭取保护等等都是他们同当地文物科技工作者密切配合取得的重大成果。尤其是《孙子

兵法》竹筒,出土的含水量很高,遇到空气迅速氧化和变形。眼看一件件国宝就要化作一堆朽木,胡老冷静对待,胸有成竹,用醇-醚-乳香胶脱水法攻克了这一世界级的难题,奇迹般地将竹筒长久地保存下来。

张文彬肯定地说:“这就是科技的魅力!”他又说,为了促进文物的科技保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向中国工程院推荐胡老为院士候选人。当然,能否当选,要按照院士的程序和要求审议评选,但至少可表达我们对文物科技保护和这方面有突出贡献专家的一种尊重和提倡。

张文彬说,新世纪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要实现从文物大国向文物保护先进国家跨越,任重而道远,要不断努力,在“十五”期间,争取步子迈得大一些。

张文彬对浙江金华的文物保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予以厚望和支持。他深有感触地说:“杭州和金华,都是经济发展到相当水平的城市,不失时机地两手抓,抓两手,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改善提高整个城市市民的素质,调动群众保护历史名城、保护文物的积极性,体现了一个城市领导者的水平,是十分重要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城市的血脉,更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特色与后劲。一个城市乡镇出了哪些名人、保存有哪些文物建筑,对一座城市、一个乡镇的文化氛围、文化品位,起着难以估计的重要作用,这种影响力、感染力非常深远,历久不衰,使后辈子孙永远不能忘怀。我们的名作家、名科学家,怀念故乡,怀念儿时,总沉浸在当地的风土人情、文物建筑、名人影响之中,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张文彬感叹地说:“历史无情,有些教训很值得我们永远

记取。像宁夏固原很有价值的古城墙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拆毁了。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两次新修县志时 ,都写到了拆城墙的教训。所以我们要以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 ,来看待名城和文物保护。实际上 ,名城的品位高了 ,就能带动精神文明建设 ,带动经济发展。可以说 ,最有深远影响的 ,往往不是拆房子、扩马路、盖高楼 ,而是文化设施和文物保护。”

张文彬笑着说 :“你们金华这五六年来坚持不懈地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证明市委、市政府班子 ,有相当的认识高度。我认为 ,将文物保护下来 ,将传统风貌保护下来 ,将历史文脉保护下来 ,比那种急功近利的大拆大建要好得多 ,人民会感谢你们的 ,历史会铭记住你们的 !”

与廖沫沙在一起的日子

在北京前门东大街一座高层建筑的二楼,我按下门铃,走过熟悉的过道,来到多次聆听廖沫沙教诲的书房。书桌、沙发和镜框里廖老苍劲的手迹依旧,只是难见廖老。廖老已在1990年12月27日猝然去世。想起第一次与廖老见面,以及一次次和他在一起的日子,他的一举一动、一语一言、一题一写、一忆一思,一种超然坦荡的胸襟,又一次猛烈冲击着我……

一、第一次与廖老见面

1984年夏天,故乡义乌要举办一次吴晗生平报告会,派我到北京请人。当时我获悉,北京正好在组织纪念吴晗的活动,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人都题了词。我灵机一动,向北京有关部门提出了将纪念活动延伸到义乌的意向,获得了首肯。我“得寸进尺”,又向他们要了“三家村”惟一幸存者廖沫沙的家址,打算作一次访问,最好能请他为即将落成的吴晗故居题词。

我到荣宝斋买了最好的宣纸,乘车来到前门,找到廖老的住处。进门后,走过穿廊向左一拐,便来到一间朝南的书房。

只见宽大的写字台前坐着一位老人，他将转椅一转便朝我微笑。他斯斯文文，戴一副普通的眼镜，一开口就是浓浓的湖南口音。当他知道我是从吴晗故乡来的之后，态度更为亲切了。

当廖老听说义乌正重新整修吴晗的故居时，频频点头，表示要争取参加揭幕仪式。我趁机取出宣纸，请廖老题词。他说：“以后不要带宣纸，你看，我这里宣纸虽没有你买的好，但可用！”廖老虽“批评”了我，但还是答应了我的请求，挥笔题了一幅“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兴致正浓，又写了一幅“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廖老亲手把题词晾在走廊上，让我注意不要让力透纸背的墨汁粘住地板，干了后再拿走。

等着字干，廖老谈起了吴晗，谈起了《三家村札记》。廖老说：“1969年吴晗在监所因被迫害受伤，得不到很好治疗而逝世，是一个悲剧。在此之前，我们经常一起被批斗。1967年夏秋间，我们一起被揪往京西煤矿一个矿区批斗。我们借开玩笑抒发长久郁积心头的愤懑。我写的《嘲吴晗并自嘲》就是那次批斗后，关在一间小房子里写的。”廖老说着，把那首诗背了出来：“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这是一首自嘲的诗，也是一首讽刺当时不正常社会现象的诗。第一句是写他们因《三家村札记》招来横祸，却说“自喜投文网”，真是妙极。第二句也是以轻松幽默口吻解嘲，说他们不得不被扭胳膊、弯腰俯首——折腰。这里却偏偏用了一个“爱”字。这样的风格，可谓是廖老杂文式的风格，反其道而写之，入木三分。廖老向我说了这些往事，口吻也是轻松自然的，但我从他的低缓语气中，感受到了他对吴晗老友深沉的怀念，对那一段血染岁月深刻的批判。

二、在吴晗故乡

1984年11月1日。下午。苦竹塘。

当廖老被吴晗故乡浙江义乌苦竹塘人扶坐在独轮车上，缓缓驶上吴晗故居前这段七拐八折的石子路时，廖老和苦竹塘人眼里含着同样的热泪。亲人！亲人！里三层外三层的男女老少，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廖老脸有点发红。作为一个把自己的一生和人民连在一起、又和刚正不阿的吴晗老弟同命运的老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和地点，倾听着人民对风雨岁月的回顾，对地下之灵的告慰和对今天生活的赞赏，怎能不激动呢！

呈现在他面前的吴晗故居，已经修葺一新。翻过了曾经是残缺凄凉的一页，在金色阳光的沐浴下，故居显得庄重而辉煌。镶嵌在大门上面的有国家副主席乌兰夫亲笔题字的青石碑，制作得十分精细。“吴晗同志故居”六个字镀了一层金粉，熠熠发亮。青石碑之上，还画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彩蝶和一朵亭亭玉立的荷花，象征着吴晗不泯的童心，正如廖老为吴晗题的诗云：“天真犹自笑盈盈。”

廖老伫立在故居前，沉浸在这一意境中。

他说：“我来迟了一步，没赶上故居揭幕仪式。”是的，廖老未能赶上前一天在苦竹塘村举行的吴晗故居揭幕仪式，是有些遗憾。但我知道，这位78岁的老人，这次亲临吴晗故乡已是十分的不容易了！他刚从西安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出席了北京市历史学会主办的纪念吴晗诞生75周年、逝世15周年的纪念会。接着，又与我们商量到义乌的事宜。他不顾

季节交替容易诱发肺气肿老毛病的危险,执意要去走一走吴晗走过的路,看一看吴晗故乡的新面貌。他的夫人——一位新四军的老文艺工作者,也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与廖老同行。没想到,由于火车票紧张,拿到的竟是硬卧票,临时再改已经是不可能了。可廖老和夫人说:“纪念吴晗是一定要去的,硬卧没有关系。”廖老一行于10月30日晚上乘45次特快抵达金华。预定次日上午先到义乌市招待所,稍息后再去剧院出席有1500人参加的吴晗生平事迹报告会。县领导安排了茶水和医护事项,在会议厅等候。廖老一听说报告会就要开始,就不肯休息,直接上了会场。

此刻,廖老跨进了吴晗故居,面对着吴晗故乡美术工作者创作的一幅吴晗的大幅油画像,不禁老泪纵横。在吴晗故居厢房,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音哽咽地怀念了吴晗同志。他说:“这不仅是对吴晗个人的纪念,更是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发扬吴晗的革命精神……你们义乌是一个出名人的地方,陈望道、冯雪峰……都出在义乌,希望义乌在新时代能出现更多的人才、更多的吴晗……”

廖老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吴晗青少年时代的书房,房中有吴晗在1949年以后的活动简表和毛主席、周总理、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与吴晗在一起的照片。我指着挂在吴晗油画两旁的一副木刻和挂在潘洁兹作的吴晗工笔画两旁的一副真迹,说:“里面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文章憎画达,魑魅喜人过’,就是你的亲笔题词。”他微笑着,风趣地说:“都让你们给用上了,太多了……”

就要离开吴晗故居了,我们在桌上摊开一卷宣纸,请廖老题词。我知道廖老是喜欢用大笔写字的。果然,廖老挥起大笔,疾

书起来。廖老挥笔在签名簿上题了“发奋治学 追求真理 爱国爱民 共产主义——吴晗故居揭幕纪念”一页浑厚苍劲的手迹。

廖老的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凑。义乌—金华—杭州，总共四五天时间，一站接一站的。廖老不愿放过短暂的空隙时间。在义乌，他抽出午饭前的半个多小时，悄悄到义乌中学察看了校舍，与校领导亲切交谈，还为义乌中学题了词。接着，又到绣湖旁的宋塔下，和县文化系统的领导谈了保护文物的意见。在金华，廖老到浙师院讲了话。廖老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教育是基础，而你们是为教育工作的，就是基础的基础……”廖老还就金华侍王府的壁画保护发表了意见，认为很有价值也很需要抢救，要请专家制定方案。20世纪50年代，吴晗和廖老分别是北京市文教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如今，廖老依然那么关心文教事业，真是壮心不已。

金华地委秘书长徐水根和我一直送廖老到杭州，下榻在西子湖畔的大华饭店。北京市政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高戈也同行。次日，高戈要乘长途公共汽车到芜湖，廖老则乘飞机回北京。省委常委、省政协主席王家扬代表省委、省政协设晚宴招待了他们。

不料，当夜高戈急性腹泻，我们和省有关部门同志都很着急，要安排小车送高戈。高戈执意不退公共汽车票，说吃了药，基本止住了。廖老听我说了此事，宽厚地笑了，说：“我们还有吴晗，都是这个脾气。”

三、与廖老的往来

以后，我几乎每年都在北京见到廖老。廖老每次都兴致致

勃勃地与我谈人生,谈杂文与历史,谈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廖老对吴晗故乡很关心,几乎每次都要问中国小商品城和吴晗故居。

1985年10月,我随武义县婺剧团进京演出,住在中纪委招待所。廖老特意在电话中再三强调,要我到他家吃一顿自己烧的饭。我去了,廖老家人做了家常菜招待我。他在《中国文化报》当编辑的儿子陈星,误将浓浓的山楂汁当酒倒给我喝。对我这不会喝酒的人来说,正好。廖老却拿过我的“酒杯”检验,发现了这一误会。大家都无拘无束地笑了起来,这时的廖老显得很纯正又很天真。

廖老还几次为我题词,其中“不为逆境而沉沦,不为顺境而骄傲”的一副对联,对我启迪尤深。廖老在半个多世纪为真理而奋斗的生涯中,无论受到委屈、误伤,还是贬斥、监禁,都保持了一个战士的铮铮铁骨。而在鲜花和荣誉向他簇拥而来的时候,他又那么谦虚和安详。无论对待逆境或顺境,廖老都以自己的风范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将此意概括后赠我,使我们晚辈尤感珍贵。

1990年,义乌有关部门编印了纪念吴晗文集《故乡的怀念》,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我作为该文集的副主编,穿梭于北京与金华、义乌之间。彭真同志欣然为文集题写了书名,廖老一直关心着文集的出版。经全国政协和金华、义乌市领导部门研究,商定年底在北京举行首发式及纪念吴晗座谈会。我们当然非常希望廖老能出席。我打电话给廖老夫人陈老师,表达了我们的恳切的要求。陈老师说:“你来了不要‘鼓动’,他若去了,天冷,万一肺气肿老毛病发了,就不好办了。”我即提出了折衷方案,如果廖老不能出席,请他写一个书面发

言。11月26日,我去廖老家,廖老仍坐在那张转椅上,沐浴着北京冬日的融融阳光,对书面发言逐字逐句作了推敲,并签上了他的名字。我建议:“书面发言是否请苏双碧同志代念。一来他是《吴晗传》作者,二来他是吴晗生前秘书。”廖老对这一人选十分满意。廖老还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纪念。看得出,廖老是想出席座谈会的,但我不能违约,所以没有“鼓动”,便告辞了。

12月6日,金华、义乌市委领导马际堂、郑尚金等拜访了廖老。廖老虽未出席12月4日在全国政协大厅举行的《故乡的怀念》首发式及座谈会,但收看了当晚的新闻联播,看了次日的《人民日报》,知道活动很成功。廖老那天兴致很高,幽默而辛辣地讽刺道:“是‘四人帮’把我们‘三家村’搞出名的,这一点还要‘感谢’他们呢!”临别时,马际堂同志代表吴晗故乡人民,邀请廖老及夫人在气候宜人之际再访吴晗故乡,看看金华的新面貌、义乌的小商品城。廖老欣然允诺。

四、最后时刻

就在那次廖老穿着宽大的蓝色制服,坚持把我们送到门口以后,仅仅过了21天,即1990年12月27日,廖老猝然去世。我是在12月29日,翻阅报纸中,突然发现新华社的这一消息。让人难以相信,却不得不相信。当即我赶到邮局发唁电,因为已经晚上八九点钟,电报小姐瞪了我一眼。但她一看到廖沫沙三字,立刻改变了态度,轻声问我:“是‘三家村’那个吗?”我点点头,她默默地忙了起来。

半年之后,我去北京,专门去看望了陈老师。她还没有从

悲痛中完全摆脱出来。她不愿意再回想那最后时刻,但她还是对我说了:“他身体一直很好,只是因为老毛病肺气肿,走路有些喘。12月27日上午,他稍感不适,后来请来了经常去的医院的医生。医生与医院联系,一时没有病床,连那张急救病床也躺着病人。当时也没有发现大的异常情况,便商定次日再住院。”

揪心的时刻是在下午7时左右,廖老就坐在那张简朴的沙发上,突然发病,急救中心的医生还没赶到,他就离我们而去。陈老师说到此,泣不成声。我也久久无语。

廖老走了。原来放满书籍的4个书柜,如今也显得有些空疏。遵照廖老的心愿,他的1500册藏书,还有生前使用过的文房四宝、放大镜、拐杖等已经捐献给故乡湖南长沙市图书馆。

廖老走了。1997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三家村”文库》,厚厚5卷《廖沫沙文集》。在此之前,由有识之士和邓拓儿子等创办的北京“三家村”文化实业有限公司资助出版的,以廖沫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黑帮”时的交代材料为主的奇书《瓮中杂俎》,引起不小的轰动。我是在接到赠书的当天,通宵读完这部30万字的奇书的。一个人在当“黑帮”时,还是那么从容、那么自信、那么坚持真理,真是感天动地!

廖老走了。我的眼前不禁又浮出1984年深秋,我们送廖老及夫人到杭州乘飞机回北京时的情景。廖老夫人陈老师在登机前对我说:“廖老从小爱读书,特别对岳飞的故事记忆很深,他从小敬佩岳飞的精忠报国!”是的,廖老不平凡的一生,铮铮铁骨,嫉恶如仇,宽厚坦荡,坚持真理,不是偶然的,不是片断式的表现,而是他大写人格的写照。

新发现吴晗有关文物的信件及其他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城市发展带来了日益突出的文物遗产保护问题。政务院在1950年5月24日发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和《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同年7月7日发布《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

过去,有人认为作为首都北京市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副市长吴晗,对文物保护,尤其是保护古都风貌不力,而拆城墙、牌楼、古建筑太积极。在国内较权威的《吴晗传》,美国学者写的《时代之子·吴晗》等传记中也基本上未提及这方面内容。

1999年盛夏,笔者从珍贵的档案资料中,有幸发现了1953年吴晗为拆除有倒塌危险的景德坊写给周总理、彭真等同志的亲笔信,为筹建北京市博物馆写给彭真、刘仁、张友渔同志的信,以及吴晗在1953年两次主持召开文物保护专家会的有关史料,从中可见吴晗在这些问题上所处的观点、态度和领导艺术,对澄清一些对吴晗的误会,提供了重要的实证。

一、吴晗的朴素表白

在吴晗主持下,北京于1951年发布了《北京市发现古迹古物暂行处理办法》,1952年成立了文物组。1953年8月20日,在北京市政府第一会议案,吴晗主持召开了“关于首都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郑振铎、梁思成、马衡、林徽因、俞同奎、罗哲文等著名专家出席。吴晗说:“近年来建筑任务逐年增加,各方面的工作突飞猛进,如下水道工程,1953年修了83公里,道路工程于1953年修筑了190公里,等于过去3年的总和。修建房屋也比过去几年增多。同时,人口增加,从解放到现在已增到260多万,交通情况与以前也不一样,现有车辆70多万辆。现在房屋很不够用,因此对许多古建筑就不得不加以使用,如国子监由职工学校和北京机器厂使用。由于上述情况,造成建筑部门和文物部门的矛盾。”

从吴晗这一番朴素无华、实实在在的表白中,至少可以体会到当年吴晗一方面对新北京建设的满腔热忱,另一方面对历史文化遗产、古都风貌持十分慎重态度,而且是在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最后确定之前,力求寻找最大限度地改善市容、交通、人居的状况,又最大限度地保护北京文物的办法,这是具有战略眼光的。

二、吴晗将古文物建筑分为三类

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无党派著名人士郑振铎曾一针见

血地说：“国民党时代文物整理委员会所编的《北京文物初评表》已经很旧了。”他认为：“保护文物部门与建筑部门只要大家认识一致，就不会有矛盾。”“从全国来讲，我们对古文物的调查工作刚刚开始，从调查报告看到山西发现很多古文物，其中有唐代建筑。北京市也有很多新发现，如韩家潭有李笠翁故居，房子虽已改建，但李笠翁亲自堆积的假山仍然在，院内一棵海棠树起码有300多年，现在还在开花。”郑振铎赞成吴晗关于对北京的古代建筑作一次调查的提议，吴晗说：“北京的古建筑应作一番彻底的调查，应该而必须保存的坚决保存，而且积极养护，使之在人民首都活起来。”郑振铎强调：“同时也要了解首都必须发展，古建筑完全不动也不可能，因此同意吴副市长所讲的各项原则处理。”

梁思成和林徽因除赞成对北京古建筑进行全面调查外，还发表了真知灼见。可惜他们关于在复兴门外建一座新北京，而老北京的古都风貌，包括城墙、街井格局、宫殿和民间店铺等等像一座大博物馆一样予以保护的意見，囿于当时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未能被中央、北京市决策层接受。梁思成在8月20日的座谈会上，引用了苏联莫斯科总建筑师布洛索夫的观点：“莫斯科建设中，遇到文物的处理原则，是尽可能保留，把它组织到新城市里来，使它丰富新城市的生活与面貌。”

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只是现代化表面的标志，而特色各异的历史文化、民族民间意义的建筑 and 传统，还有对山对水的和谐度，才能体现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个城市的特征。无疑，梁思成的“辟新区、保旧城”的思路是一种战略的思想，在1999年第20届

世界建筑师大会通过的《北京宪章》中可以寻找到这种倾听21世纪的声音。但在当时,连尽可能保留文物,将古建筑组织到新建筑格局中来的认识,也不能完全认同。甚至,梁思成作为首都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在审查重要建筑设计时,提出要
与古都风貌相协调的意见,如屋顶的民族化处理、减低楼层等,也屡屡受阻。

吴晗不可能像梁思成这样纯粹从一个杰出建筑师的角度来考虑城市建设,但他也不赞成“越拆越革命”的那种对历史文化的粗暴行为。他将文物建筑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艺术价值的应该保存;第二类是有艺术价值应该保存但必须迁移的;第三类是无历史价值的应该拆除。在应该保存的古文物建筑中,还应有区别,一种是修缮养护,不能使用;一种是可以使用不能更动;还有一种是可以使用也可以更动。根据上述原则处理,即应从有关方面抽调一些干部组成小组,进行深入重点的调查研究工作。

处于保护与拆除的矛盾漩涡之中的吴晗,提出上述三条原则,应该说是有效避免了许多珍贵文物遭到像“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四旧横扫的悲惨命运。特别是关于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再做决定的指示,至今仍对那些在无知盲目中大拆大建的人,有着警示作用。

三、决定拆除有倒塌危险的景德坊

吴晗为官谨慎,对北京文物更是慎之又慎。1953年12月24日上午,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吴晗与梁思成为了位于羊市大街女三中前的景德坊,即帝王庙前牌坊,面临倒塌危

险,予以拆除事宜,商议了一个上午。28日,吴晗召开了有薛子正、梁思成、郑振铎、侯仁之、马衡、王明之、罗哲文和著名作家萧军等参加的“关于首都古文物建筑处理问题座谈会”,景德坊的拆除成为大家一致的意见。

萧军在会上的发言显得很清醒,也很有文人个性:“关于牌楼问题和右安门问题,我认为首先考虑历史和艺术价值,然后再考虑位置对都市规划有无妨碍,如果有妨碍,就不管什么建筑,一切要为了人,就要设法使建筑不威胁人的生命。如东西四牌楼、帝王庙牌楼应该服从都市规划。”

尽管吴晗的意见在那次高层次专家会获得一致赞同,吴晗在会后,还是立即用毛笔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市委副书记刘仁,副市长张友渔,并转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座谈会情况,特别是对拆除景德坊、东西交民巷两个牌坊、右安门瓮城等的意见。吴晗写道:“为防止倒塌,保障人民安全,立即拆除羊市大街女三中前景德坊。拆除后它应迁地或就地保存,待都市规划确定后,再商讨提出意见,所拆材料应妥善保存。”

彭真同志看了此信后,十分慎重地批示:“总理:我们先把景德坊和东西交民巷两牌坊拆除,材料可暂保存。”周总理收阅此信,也迅速作出批示,表示同意。

吴晗对座谈会上的不同意见也作了如实汇报,他在信的最后写道:“和梁(梁思成)个人交换意见,他同意拆除右安门瓮城。意见仍分歧,不能取得一致的,是旧都市风格如东西四牌楼和首都建设的矛盾问题。梁俞(俞同奎)主张保存,并认为是可以和新都市规划结合。梁并表示如政府决定,派他拆除,他一定坚决执行,但仍保留并主张他的反对意见。”

可见,北京的文物、北京的传统建筑、一牌一楼、一庙一寺、一街一巷、一桥一梁,是如此牵动着当时中央、北京市决策层,也如此牵动着吴晗的心,吴晗的热忱细致和不隐瞒不回避矛盾的性格,梁思成对历史文化、北京文物的执著保护,都跃然纸上!

四、力主建博物馆和发掘定陵

1953年6月22日、7月12日,吴晗两次向彭真、刘仁、张友渔同志写信,建议建立北京市博物馆。吴晗写道:“五至七三个月,已经发掘了三座古墓,发现的器物非常多,非常有历史及艺术价值”,“今后建筑日多,盖房子挖窑挖沟等等,随时会发现古物古墓”,“北京市应有适当的机构和场合,来作调查发掘保管等各项工作”。吴晗还建议在1954年市财政文化事业费项下列历史文化费一项。

吴晗对北京市博物馆的选址,第一封信中建议放在陶然亭抱水堂附近,第二封信建议先在畅观楼筹备并举办陈列。吴晗还提议馆长人选为当时北京大学副教授侯仁之。

北京市博物馆最后定名为首都博物馆,建在现在孔庙之内。1997年金秋季节,首都博物馆馆长荣大为以一种虔诚的心情,代表首都博物馆向义乌苦竹塘的吴晗同志故居敬献了一块铜匾,他对我说:“吴晗同志可以说是我们首都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当年他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后来,首都博物馆几上几下,不管受到什么影响,吴晗同志一直为首都博物馆的立项与建设力争。”

吴晗对北京文物保护倾注巨大热情,不仅体现在建首都

博物馆,而且还促成了另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他和郭沫若、邓拓、范文澜等同志一起提出了发掘定陵的建议。不久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准。吴晗对定陵的考古发掘非常关心,不顾严寒,几次亲临现场指导,对其中地下宫殿、通道、停放朱翊钧和两后的棺槨,及其他随葬品了如指掌。1956年5月,吴晗组织民盟北京市委委员前往参观时,亲自担任讲解,连专职讲解员也听得津津有味。

后来,吴晗和郭沫若又联名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建议发掘长陵。周总理妙语“驳回”:好事不要做完了!吴晗一想,总理的意见很对,现在文物科学保护手段还不尽如人意,发掘的利弊确要再三斟酌。

五、永远的遗憾

当年参加吴晗主持召开的文物座谈会的专家、学者多已先后去世。至今惟一健在的只有曾任郑振铎的秘书、现任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的罗哲文,他常常深情回忆起吴晗与郑振铎的音容笑貌。他说吴晗与北京文物有缘,解放前在清华园就掩护过后来也担任过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同志,他让王冶秋同志穿上他的长褂,戴上墨镜化了装去了解放区。20世纪50年代又与郑振铎一起为保护北京古都风貌呕心沥血,不过也留下一个永远的遗憾。

原来在决定拆除城墙和一些牌楼后,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和吴晗一起研究,各派一名秘书具体操作,一一拍照、绘图和加以文字说明,留作珍贵文物档案。郑振铎派出的是罗哲文,吴晗派出的是闻一多之子闻一鹤。后来为由国家文物

局，还是北京市政府保存这批珍贵档案，吴晗与郑振铎发生了争执，吴晗的脾性就是这样，认准的东西不容易改变，他斩钉截铁地认为这是北京市的古牌楼档案，应归北京市。郑振铎毕竟是吴晗的老师，又是年长者，被吴晗对文物的挚爱感动，就同意将这一大批照片、绘图和文字说明给了北京市政府保管。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吴晗遭迫害，闻一鹤也被迫自杀，这些珍贵档案不知去向，成为一个永远的遗憾。

四

我心中的画家

艾青与画

一个阳刚的北京夏天 ,在艾青旧居的长青院子里 ,艾青的夫人高瑛又一次讲起了艾青的人品与诗品。由于我们向她征求家乡编辑一部画册的意见并征集艾青的书画作品 ,她讲起了艾青的画与画品。

一时间世界很静 ,那诗那画很动人。

高瑛伴随艾青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人生 ,她以亲密伴侣的坦然与感慨 ,幽默地说 :“ 风雨过去 ,我们留下了人 ,这是最宝贵的又是‘ 无价的东西 ’ ,而那些有价的红木家具、古董 ,尤其是字画 ,包括艾青自己作的画和收藏的作品 ,都被拿走了。”

我注意到高瑛的淡泊与超脱 ,讲到因“ 文化大革命 ”以及其他原因造成艾青不可估量的损失 ,只用了一个“ 拿 ”字。

一、因画入狱

艾青 ,原名蒋海澄 ,从小与绘画有缘。6 岁上蒙馆时 ,写字是他最喜欢的作业 ,课外活动最多的是画画、捏泥人。上小学时 ,他对故乡的两棵苍劲青翠的元代古樟 ,情有独钟 ,常常坐在田埂上 ,默默凝视 ,望情地写生。1928 年夏天 ,他 18 岁

时,考入了西子湖畔的杭州国立西湖艺术专科学校,即现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次年,校长、著名画家林风眠看了艾青的画,对他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到国外去吧。”于是,艾青就选择了赴法国巴黎学画。

为了促成这次生命之旅,也是艺术之旅,艾青千方百计争取到了父亲的理解和支持,得到了一千块鹰洋。他在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自传体长诗《我的父亲》中写道:“地主们都希望儿子能发财做官,他们要儿子念经济与法律,而我却用画笔蘸了颜色,去涂抹一张风景,和一个勤劳的农人。”“为了到一个远方的都市去,我曾用无数功利的话语,骗取我父亲的同情。”

在法国,艾青爱上了后期印象派画,常常到巴黎近郊写生,到蒙巴纳斯一家画室画素描。由于断了来自家里的财源,他曾到一家中国漆作坊打工。在法国,艾青读了不少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十月革命小说诗歌、欧洲象征主义流派诗歌,开始对诗感兴趣。

1932年日军侵占上海之际,艾青回到了上海,不久加入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与江丰等一起组织了同仁画会,即“春地美术研究所”,在上海八仙桥举办了“春地画展”。

6月26日,在画展开幕当天下午,鲁迅先生赶到展地看画展,与艾青亲切交谈,并询问了艾青送展的一幅抽象派画作的情况。鲁迅先生为“春地画展”先捐赠大洋20块,观看画展时又捐赠大洋5块。

7月12日晚,艾青和江丰、于海、李岫石、黄山定等13名美术青年一同在开展“春地美术研究所”教学活动时,遭法租界巡警袭击,被捕入狱。经过审讯,11名同学被释放,而艾青和另一个同学被继续关押。

艾青失去了自由,但他渴望自由的思想,他的诗情画意,他对故乡和母亲的挚爱,却从来没有这样不可抑止。他无法作画,就在狱中写诗。1933年1月14日早晨,他面对囚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一气呵成,写下了不朽之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探监的沈钧儒把手稿带了出来,这首诗发表在1933年第2期《春光》杂志上。

从此,用著名诗人徐刚的话说:“画家蒋海澄便成了诗人艾青。”

艾青不止一次幽默地说:那是我第一次用艾青笔名发表诗作。母鸡下了鸭蛋,或者说鸭子下了鸡蛋。总之是蛋,不是坏蛋!

据艾青侄子蒋鹏放回忆,艾青因画入狱、因画劫难还有一次。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位青年把自己画的“红太阳”习作给艾青看。朴素而正直的艾青对他说:“红太阳”的颜色太暗了,建议他早晨去观察太阳颜色才能画好。不料,就是这么一句“实话实说”,艾青被列入严重反革命行列。

二、与画“走亲戚”

虽然,因画入狱,因画波折,但艾青初衷不改,热情不减,对画别有一种割不断的爱。他说,他一生与画是“走亲戚”的关系。

1949年2月,艾青随军入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工作,出任中央美术学院前身的北平艺专军代表。艾青代表军管会慰问了齐白石、徐悲鸿等著名画家,还送去了大米、小米等粮食。

同年,艾青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出任国徽、国旗、

国歌评选组组长。毛泽东还特意邀请艾青和郭沫若、田汉、梁思成等一起到中南海座谈，讨论国都、国徽、国旗、国歌等问题。

艾青和许多画家有深厚的友谊。晚年他的客厅中挂着一幅黄永玉的力作，画面上双目炯炯的猫头鹰，寓意即使生活在黑暗之中，也不改对阴谋的警觉、对光明的渴盼。艾青对此画十分欣赏。1984年，《艾青短诗选》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收录的67首诗作，均由黄永玉配画。一诗一画，一诗二品，成为当代诗坛佳话。

齐白石是艾青的忘年之交。是艾青把齐白石介绍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在1953年1月30日的《文艺报》上，艾青发表了诗一般的散文《白石老人》。那年春天，艾青还到过春意浓郁的江南，一边写诗，一边在上海美术工作者政治讲习班作了“关于国画改造问题”的专题报告。

1973年秋天，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已恢复正师级待遇的艾青和夫人高瑛、儿子丹丹一起回到了故乡金华。艾青急切地走向那两棵大樟树，沉浸在无限感慨之中。他被故乡一位画家画的一幅两棵古樟的素描打动了，连连称赞。临别故乡时，特地送一盒木刻刀具给侄子鹏放，要他把古樟素描刻成木刻寄给他。不久，鹏放将精刻的故乡古樟木刻寄给还在新疆的艾青夫妇。艾青立即写来一封诗情洋溢的回信。

艾青在晚年仍诗心不灭、诗画交融。无论是《古罗马的大竞技场》，还是《光的赞歌》等名篇，都有一种强烈的美的追求、鲜明的画面，可以说也是他丰厚美术功底的一种体现。他在写诗的同时，为《方成漫画选》写了著名的序言《机智、聪明和幽默》，为卜镝画集《春天的消息》写了充满对未来期望的序言《我为儿童祝福》。

艾青始终认为“诗应当是文字的画，画应是彩色的诗”，诗与画是“走亲戚”，相辅相成而显示出魅力。他一针见血地说：“那些群众都说读不懂的朦胧诗、画，是没有生命力的。”

三、仅存的艾青画作

高瑛说：“1956年，艾青创作过一幅热情洋溢的作品，他画的故乡的大樟树，表达他爱故乡的拳拳之心。他把这幅大樟树，作为《艾青诗选》的封面。可是，这幅画被偷走了。一晃40多年过去了，这幅画一直没有露面。”

高瑛接着又说了一件艾青得意之作被丢失的憾事。“50年代中期，张仃要办一个美术同仁刊物，在创刊号上要发一组艾青画的专辑。我们就将10来幅艾青早年作品交给他，让他去选编。‘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回北京，与张仃见面，我曾问过张仃，艾青那些画的下落。张仃说，都被抄走了。”高瑛对这批画的丢失，十分惋惜。

高瑛说，艾青的画在家里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了，只有一幅30年代画的风景画《泼墨大写意》和一幅给我画的速写。

《泼墨大写意》笔力粗犷，意境开阔，在古建筑之中有两棵苍劲有力、伸开枝叶的大树。高瑛说：“关于这幅画还有一个故事。1979年，一位香港记者到北京采访，将这幅画拍了照，在香港杂志发表了。有一位香港诗人看后，做了一首诗，说这两棵树像两只拳头，是艾青向共产党要民主、要自由。后来，我们与那位香港诗人见面了，艾青就对他说：‘你发挥得太过分了。我画那幅画时，没有想到要民主、要自由，那是30

年代画的一幅风景画。’”

高瑛说：“艾青就是这样一个人，说老实话，一点也不会做假。不然，他可以说，那是向国民党要民主、要自由！”

这幅《泼墨大写意》幸运地保存下来，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57年，艾青被划成“右派”，被迫去新疆和北大荒。高瑛说：“原来在北京，我们住的是一个大四合院，与王府井东安市场很近，艾青常常到那里的旧货摊上去逛，在那里买了不少东西，包括齐白石的画，还有艺术瓷、青花瓷、宋瓷等等。我们北房客厅里有黄梨木、紫檀木的家具，字画有好几箱。到北大荒、新疆去了，只能轻装运行，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放在屋子里锁了起来。”

高瑛说：“当时我们挑了10多幅画带去新疆，有林风眠、李可染的精品，也有这幅《泼墨大写意》。结果，没有带去的家具、字画，都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没有征求我们同意的情况下，被运到农垦部库房里。红卫兵大串联开始后，库房被腾空，这些文物、字画就不知去向了。‘文化大革命’过后，我们只得到了几只空空的箱子。而《泼墨大写意》很幸运，意外地被保存下来。”

我知道，艾青与高瑛一往情深，以诗映心，而且艾青还给高瑛画过绝妙的速写。高瑛浮想联翩地回忆着这一情景：“那是1978年春天，我们住在史家胡同，一天在我午睡时，艾青画的速写。我醒来后，艾青将速写给我看，问我：‘这个像谁？’我随口答道：‘怎么像观音！’艾青要我再看，我才发现艾青画的是我。”

高瑛补充说：“1982年，艾青还画过我的速写。”这时，高瑛话锋一转，以诗人的幽默说：“现在可不行了，他这样就是

‘侵犯人权’了，怎么趁我睡着时，不经过我同意就画！”高瑛说着，在坦诚之中，充满了对艾青的敬重和怀念。

记鲁光“淘金”

50 万字的重量级散文集《写画人生》,如厚重的城砖。鲁光认真地签名后把它送给我时,我觉得他是一个凝重、厚实的作家。而鲁光不久前出版的 24 开本的弄墨丛书之一《半路出家》,从封面到末页,文中写画、画中文,彻头彻尾是一件别致灵秀的艺术品。我又觉得他是一个独具匠心的画家。

我是在 1984 年认识鲁光的。当时,他写的《中国姑娘》正是中国文学的亮点。日本客人送给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一部日文版的《中国姑娘》,邓颖超向荣高棠同志要中文版的《中国姑娘》,荣高棠就打电话给正在上海的鲁光,而鲁光只剩下两本《中国姑娘》。鲁光让夫人从北京先寄到上海,他签上“邓颖超主席惠正”之后再寄回北京,请荣高棠同志送中南海。

当时,我是一个既被中国女排姑娘拼搏所打动,又被鲁光《中国姑娘》的意境所打动的文学青年。一见到鲁光自然顾不得客套,就围绕着《中国姑娘》热烈交谈起来,后来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鲁光与他的〈中国姑娘〉》的特写。

这次我们同来浦江参加“2001 浦江第三届中国书画节暨首届中国水晶玻璃博览会”。很巧,在狂欢的大型露天晚会气氛中,我毗邻的竟是久违的鲁光夫妇。为了便于我们谈话,

鲁光夫人主动换了一个座位,让胖乎乎的穿火红上衣的鲁光像一个火红的“球”一样挤过来,与我坐在一起。

我们开始了无主题交谈。

虽然不时被台上歌星很卖力的演唱和台下歌迷们的热情响应而打断,但在鲁光的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片断中,我感受到了这位永康籍文坛、画坛“两栖人”的乐观和达观,尤其是他文物收藏之“淘金”的传奇与趣闻。

他说:现在一年时间中,一半居住在永康,一半居住在北京。不久前,在北京龙潭湖附近分到了宽敞的新居。他幽默地说:“我虽然很反对以官位排列分房次序,但毕竟这次由于我有半年副厅、13年正厅的‘官历’,列全部分房者第三,占便宜了!”

在北京时,每周必去潘家园“淘金”。

“沙里淘金,有收获吗?”我问。

鲁光肯定地说:“有!这次我淘到了20多种早年鲁迅著作的版本,包括日本出版的,每本以二三十元价格买下。回永康时都给了永康市旅游局局长,他是一个各种版本的鲁迅著作收藏者,已有200多种版本,但我淘来的20多种,他原来都没有。”

鲁光讲了两次激动人心的“淘金”。

那是一个初夏。鲁光徜徉在潘家园五光十色的古玩字画店铺和地摊上。他的目光突然被一份取意叶圣陶一个寓言的华君武漫画吸引了,而且漫画旁还附有《儿童文学》60年代初期的发稿单。作为一个有丰富编辑经验的画家,立即敏感到这很可能是从《儿童文学》杂志社流失出来的真迹。他就与卖家砍起了价钱,开价1500元。鲁光说:50元。那人说:80

元吧！鲁光说：一分也不加了。结果居然成交了。

鲁光拿着这幅漫画，特意登门拜访了华君武：“华老，我在潘家园用50元钱买了你的一幅画，请你鉴定一下，是不是你的真迹？”华老仔细地作了观看，对鲁光说：“看不出它不是真迹。”然而，华老的儿子做了一番品味后，认为是赝品。华老就对鲁光说：“我给这幅画上题个字吧，叫做有真真假更珍贵！”鲁光被华老的幽默打动了，但他婉言谢绝了华老的题字。

又有一次，鲁光一早来到潘家园，一个卖家有两幅手帕见方、画在毛边纸上的李苦禅花鸟小品。他十分激动，反复品味，因为李苦禅是他学画的第一恩师。他发现这画有苦禅师的神韵，纸质也对，折叠痕迹处已明显破损。鲁光先砍价到100元买下一幅。回家后，找出所有李苦禅的画册，又挂起苦禅师送他的《鹰》，对照其中的用笔、用墨、用章和神韵。第二天一早，鲁光又早早到潘家园，问也没问，掏出100元，买下了另一幅李苦禅的花鸟小品。

那几天，鲁光沉浸在淘到苦禅师作品的喜悦之中，沉浸在追思苦禅师的人品和画品之中，到半夜也睡不着觉。他突然发现了一个疑问，这两幅小品怎么会用笔有点软呢？次日，他赶到荣宝斋，找到了一个鉴定书画专家，请他作一鉴别。那位专家认认真真看了，对鲁光说：你淘到好东西了！这是李苦禅的真迹。“文化大革命”期间，李苦禅受到凶残的拷打，但他以坚强毅力，没有丢掉画笔，常常用毛边纸画这样的小品。

台上，游本昌正在很精彩地表演小品。但我们的交谈也时时妙趣横生。我突然觉得，在鲁光丰富多彩的人生中，他不仅是大作家、大画家，还是一个大“淘金”家。他说：“我很幸

运 ,至今已收藏了当代名家 200 多幅书画。”

鲁光说 :“ 最近 ,我打算写两部本。一部是《我的第一次》 ,如乒乓外交 ,我第一次到美国 ,当时 ,我是文字秘书 ,唐家璇是外交秘书 ;又如 1982 年采访中印战争史实 ,我第一次到印度 ,一个曾在北大留学过的印度女孩叫我鲁光 ,我不理她 ,我说我的护照上明明是徐世成 !她说 :‘ 别瞒了 ,你就是中国著名作家鲁光 !’ 于是 ,这个女孩和另一个也在北大留学过的印度女孩 ,成了我们访问团的英文翻译 ,一直跟着我们半个月 ,还有第一次当总编辑、第一次登珠穆朗玛峰 ,都有许多故事。” “ 另一部是与 ‘ 淘金 ’ 有关的书 ,我想将我的收藏品 ,连同一些 ‘ 淘金 ’ 、 ‘ 捡漏 ’ 的有趣故事 ,出一个图文并茂的集子 !”

我表示非常赞同。

与杜世禄对话： 城市建设与文化

杜世禄 男 ,1950 年出生于浙江东阳 ,现任中共浦江县委书记。他也是国内有一定名望的书画家。

浦江是文化部命名的全国书画之乡、工艺美术之乡。民间舞龙得全国金奖。水晶、衍缝被等工艺品外销海外。

抱着探求这块文化热土和这位领导美学观的心情 ,我慕名采访了他。

问 :你出任一个书画之乡的县委书记 ,对这块文化热土的感受如何 ?

答 :对我的感受是深刻的。书画是它的文脉 ,它的历史文化的积淀。为什么浦江的山水能滋养如宋濂、张书旂、吴萑之、方增先、吴山明等一代代文人墨客 ,如同义乌为什么清末就有摇着拨浪鼓 ,鸡毛换糖的商品意识一样 ,浦江文化具有内在发展规律的必然性。了解浦江、认识浦江、热爱浦江、发展浦江 ,就必然要注重文化的切入。而略懂一点书画的我 ,会多一些共同的语言 ,多一点亲切的沟通 ,也会多一点展开文化意识的发展思路。

问 :从这个意义上说 ,是否浦江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必

须考虑到它的文化特色,也就是文化力的作用?

答:是的。

问:广州市长林树森最近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曾幽默地说:“很多人到过世界各地,如纽约、巴黎,你们有谁能说出当地的国民生产总值呢?旅游者都是直奔卢浮宫和艾菲尔铁塔的。文物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广州有2000年建城史,是我们的幸运。”

作为多年来给人印象是一个商业城市的广州市长,说出以上的幽默话,似乎使人意外,联系到浦江,你认为如何?

答:这正是广州市委、市政府的高明之处。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化地位是永恒的。经济文化协调发展,才能又富又有味。

对浦江来说,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支撑浦江社会发展的基础,实现强县是永恒的真理。但其特色是它的文化,它的旅游,它的全国民间工艺之乡、中国书画之乡的文化特色,我们要充分继承、挖掘、发展这个优势,并且做大,使之成为全国的一个亮点,这是当代浦江人的责任。

有人认为发展经济与弘扬传统文化,包括保护古建筑和传统街区,是矛盾的。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两者是相互促进、连动的关系。城市化的推进,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促进工业的集聚和合理的布局,企业的群体发展要有文化渗透,这是就工业与文化发展而言。同时,一个城市要有品位,要有特色,生态和文态环境都应是一流的。这就需要构筑先进文化,而先进文化既是开放的、吸纳的,又是根植于民族性和地方性之中的。因此,弘扬地方文化、保护文物建筑与促进经济提升并不矛盾,而是提高一个城市品位的必由之路。

广州市于2000年投入10个亿,对整个南越王宫进行发

掘,建一个高水准的遗址博物馆。这样做短期看是投入,长远看是增强了广州的文化特色与魅力,增强了广州旅游的吸引力,是很值得肯定的远见之举。

问:你提到了城市建设的品位和生态、文态环境问题,在浦江的实践中,你认为一个决策者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答:首先我认为一个领导者,自己要不断加强学习,要有品位,要有生态、文态意识。重要在于学会用美学的眼光去审视一江一河、一山一坡、一街一景、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建设也是绘制一幅画,旧城改造如修改而不是重画一幅画,新区建设如精绘而不是粗制一幅画,不管是修改还是新画,都必须讲究构思、布局,注重错落有致、虚实相间,把美学的、艺术的、独特的亮点,带到我们的城市建设中去。当然这要依靠专家去完成,但是作为领导,具有一定的美学素质,可以判断某种方案的可取性和层次性,这无疑是决策者的素质之一。

美国纽约市中心建花园的提议是诗人们、艺术家们提出来的,当时有人骂他们是疯子。但法院的判决,接纳了他们的提议,拆除了原有的高楼大厦。现在看来,这个提议是一个很有远见,也是充满美学眼光、生态文态意识的提议。蓬皮杜提议建一个现代艺术中心,当时有争论,现在这个艺术中心已成为巴黎一颗璀璨的文化明珠。

我这次在奥地利参观了一个垃圾处理中心,仿佛进入了一个艺术宫殿,其设计构思和建筑质量都是高品位的。

毕加索是一个出色的建筑师,又是一个伟大的画家、一个伟大的思辨家,他善于以美学眼光去看待世界,从他的创造性和深沉的美学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启发和借鉴。

浦江城建的品位如何提高？我们提出了“显山、露水、披绿、去污”。我们不能躺在历史文化上自我陶醉，要创造性改变。我最近认真读了鲍世行先生发表在《东方视角》上的《钱学森与山水城市》这篇文章，受到启发。浦江有母亲河浦阳江，有风景名胜仙华山，有不少人工湖、自然湖，有建设生态山水城市的条件，要朝这方面努力。

要画好两幅“画”。一幅画是启动旧城改造，治理浦阳江，切割四个污染源，还其清澈见底。形成一条沿浦阳江展开的环带，珍珠般串起人民公园、塔山公园、书画一条街、新商贸中心和有文化品位的大观园。城郊的仙华山旅游建设要有“高峡出平湖”的意境。在山后构筑了一座蓄水大水库，达到减弱城内热岛效应、供水和景区开拓三大目的。在城郊蓄水量达6000万立方米、库内有10多个岛的通济湖景区，引资开发成为小千岛湖，加上全国闻名的江南第一家的挖掘、展示，形成浦江一幅自然优美的新图。

第二幅“画”是随着杭金衢高速公路浦江入道口的形成，在黄宅建设一个1平方公里的现代化工业小区。要吸纳上海、义乌等地企业家的资金，让他们到这里来大显身手，并以此小区拉动黄宅镇经济，影响浦江县经济。总之，要依托母亲河浦阳江，南北拓展，向东发展，两个小区逐渐连成一片，形成一条经济文化长廊。

在整个建设过程中，作为决策者，始终要有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头脑，真正为当代和后代浦江人着想。对美与丑、真与假、是与非、轻与重、远与近，有一种清醒的判断。有时，要拿出勇气，力排众议，坚持正义。如在生态环境上，不能短视，不能功利，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保作为

代价。旧城改造,也不是统统推倒重来,如我们保护了一座有文物价值的张家祠堂,两边设计了现代感强烈的建筑,共同构成了一个古代和现代文化交融的博物馆。

问:到过浦江的人都有一个印象,县城里文化氛围很浓。既有浦江籍作家洪汛涛作品《神笔马良》的塑像,又有张书旂、吴茀之、吴山明美术馆,还有书画一条街。这方面的新世纪新亮点是否已经在筹划?

答:要充分利用书画之乡文化载体,发展浦江和提升浦江。2001年要举办国家级的中国第三届书画节。上述的一些文化设施还是处于分散的,要总体构思,逐步串在一起。对城中著名的宋代古塔要进一步改善它的文态环境,提高塔山公园品位,希望像罗哲文、郑孝燮这样的大专家能亲临指导古塔的保护和利用,进行中国古塔文化的研讨,从而丰富书画之乡的内涵,让浦江走向全国和世界。

问:你已勾画了新浦江这幅“画”,据我了解,你也是一个勤奋的业余书画家,有时还写诗,出国也带笔墨。最近在创作上有什么收获?听说你捐赠给横店集团100幅书画精品?

答:我的创作只是爱好,由来已久。这与业余时间有人喜欢读书、下围棋,也有人喜欢旅游、品茗、打电脑是一样的。

我喜欢创作。把我平时对大自然的感受,以及在解决处理诸多矛盾的见解上升到美学的领悟,情绪化地在画面上再现,与其说这是一种宣泄,不如说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当然,这种感受是来自历年对各种艺术品味领会而产生的。水平不高,自娱自乐,送人谈笑而已。横店是我老家,徐文荣老总看得起我。我当个领导就不能讲什么钱一类的东西了,自然以捐赠才能反映我的心态,可说是我为家乡文化出一点力吧!